



2014年第1期（总第36期）

（季刊）

卷首语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

1099年立春，儋州已是一派浓烈的春景。春风轻抚着碧波荡漾的大海，依偎着绿色葱茏的大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多情的河流。娇艳的桃花、洁白的杨花也热闹地绽放开来。

在这醉人的春景里，一年一度的立春祭祀开始了。人们成群结队地走上街头、大路和田间，举着青色的春幡，戴着艳丽的春胜，围着笨拙的泥牛，挥舞着春杖，响亮地唱诵着迎春的祝词……

一位流落天涯的老人，没曾想这熟悉的场景竟真切地出现了。一样欢欣的脚步、一样灿烂的笑脸、一样动人的乡情！一缕乡思缓缓升起，醉眼朦胧的苏轼仿佛看到了儿时的自己拉着弟弟的小手追逐在迎春队伍后头的情景……

一阵春风唤醒了漂浮的思绪，不是天涯实是天涯，何时才能重归故土！姑且就让这份思念与惆怅，随着这漫天飞舞的杨花随风而逝吧。

又是阳春三月时，眉山的田野一派繁忙景象。人们犁地、插秧、施肥，用汗水播种新的期盼与梦想。是啊，“一年之计在于春”，朋友们，让我们也趁着这美好的春光开启新一年的希望吧！

蘇軾

2014年第1期（总第36期）

（季刊）

研究 SUSHI YANJIU



目 录

□编辑出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
《苏轼研究》编辑部
□委印单位：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主管单位：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
□主 编：张志烈
□执行主编：李 酣
□副 主 编：宋明刚 方永江
□编辑部主任：刘清泉
□编 辑：袁 丁
□编 务：唐雅兰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纪念馆三楼 308 室
邮编：620010 电话：(028) 38299092
网址：<http://www.3swh.cn>
邮箱：sushiyanjiu@163.com
准印证：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证第 03—006 号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眉山市雅彩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日期：2014 年 3 月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苏学论坛

- | | |
|------------------|--------|
| 苏东坡情怀人生初探 | 王影聪/4 |
| 苏轼葬郏已定论，霍山岂会有真冢 | 乔建功/10 |
| 东坡屡变归老地寻因 | 郑秉谦/14 |
| 风流二老对开关 | |
| ——武进横山乃苏东坡“怀居”之选 | 颜正源/21 |
| 我寄佛心与明月，普照世间不眠人 | |
| ——苏轼超然成仙秘密探究 | 赵 军/26 |
| 去乡三十年，风雨荒旧宅 | |
| ——眉山苏轼符号的特征 | 刘清泉/31 |
| 苏轼游历赣南时间考 | 李云彪/36 |
| 苏轼官职漫谈（下） | 赖正和/42 |
| 道眼妙观，游戏翰墨 | |
| ——苏轼诗境的禅学之维 | 赵德坤/50 |
| 苏辙寄寓佛禅的思想略探（上） | 达 亮/57 |

□顾问：李 静 宋朝华 王影聪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王水照 刘乃昌
刘尚荣 苏 灿 邱俊鹏
周先慎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永江 木 斋 王友胜
王希龙 王晋川 刘川眉
刘清泉 孙开中 李 酣
李景新 冷成金 张志烈
张忠全 杨胜宽 杨常沙
陈 弼 宋明刚 周成仕
周裕锴 祝 云 胡先酉
涂普生 康 震 韩国强
赖正和 蔡心华 潘殊闲

□诗文鉴赏

《龙川略志》译评

胡先酉/62

□景苏札记

苏东坡的政治人生(十五)

——苏东坡的“仕”途精神

雷金贵/76

□新书序评

激情澎湃，求实求真

——《漫话苏东坡》序

张志烈/70

□苏学动态

苏轼葬处不容置疑 苏学普及任重道远 小 编/79

捐赠600万元援建三苏纪念馆 刘 娟/79

《苏轼全集校注》获中国图书奖 袁 丁/80

眉山将举办“东坡文化进校园”

□苏学专家

苏学通两岸，东坡若比邻

李 新/73

课堂教学展评活动

一 流/80

□研究史话

日本苏轼研究述略(十) [日]池泽兹子/74

苏东坡情怀人生初探

——论苏轼情怀人生的八字真谛

王影聪

内容提要 本文从苏轼对名利、生死的超然心境，对人生苦难的洒脱，只有爱没有恨的慈悲心，笑对人生、乐对生命的态度四个方面探讨了苏轼情怀人生的“超然、自在、潇洒、快乐”八字真谛，并且指出苏轼的人生真谛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苏轼 超然 自在 潇洒 快乐

苏东坡一生辉煌在于他的可爱！他的可爱在于他的超然和可爱的情怀；什么都可为他所爱，正如他所言“不应有恨”、“多情应笑我”、“人间有味是清欢”、“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游于物外，不凝滞、不苛求，自然无往而不乐”，这就是苏东坡的可爱！

苏东坡的情怀人生之可爱在于他的“超然、自在、潇洒、快乐”这八字真谛，是常人所向往而难以做到更难以成就的。而可爱的苏东坡做到了，成就了他的情怀人生，故而他成为百姓所爱之人，文人所爱之圣贤！

超然的情怀

人生是为名和利所累，要超然、淡泊名利很难！苏东坡早年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京城一举成名后，他与弟弟子由（苏辙）曾有过约定，为朝廷尽忠之后择时归隐山林或回到家乡，过陶渊明一般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闲暇之余，把酒问盏，快哉乐悠！此后，苏东坡都没有兑现与子由的约定，他也因自己失约而甚感后悔，却没有办法：身不由己，朝命难违！他在《满江红·怀子由作》一词中特别提起这个约定：

清颍东流，愁来送、征鸿去翻。情乱处、青山白浪，万重千叠。孤负当年林下语，对床夜雨听萧瑟。恨此生、长向别离中，凋华发。一尊酒，黄河侧。无限事，从头说。相看恍如梦，许多年月。衣上旧痕余苦泪，

眉间喜气占黄色。便与君，池上觅残春，花如雪。①

这是苏东坡接到诰命，由颍州改知扬州在赴任前写的怀弟弟子由的词。之后在扬州任上半年后又赴京城担任兵部尚书，之后又升迁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兼礼部尚书，差点拜相了。而此时的东坡十分清醒，他对这样的升迁没有兴奋，却有些郁闷。专门留下《行香子》一词，表达他超然、欲归隐的心态：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②

这时的苏东坡已经是57岁左右的老资格朝臣了。他的这种“超然”心态早在42岁前后的密州太守任上就有过，当时他修复了一座残破的古楼台，其弟苏辙为之命名为“超然台”。苏轼便写了一篇《超然台记》，表明了自己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思想。苏轼写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苏轼的意思在于：凡是事物都有可供欣赏的地方，都可以寻找到使人快乐之感觉。如有观赏的地方，就有快乐，不一定是奇险伟丽的景色。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使人饱。以此类推，我到哪儿会不快乐呢？

所以，苏轼叹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也就是我之所以到哪儿都快乐的原因，在于我的心能超然世外，超出于事物之外啊！

苏东坡这么想，却在黄州流放之前做不到。他满腹“不合时宜”，与王安石唱“对台戏”，还写诗发牢骚，让人抓住把柄，酿成“乌台诗案”，即使后来在真州小憩时已获解禁也未脱名利之困。那年他在金山寺对岸修炼，写了一封信

给对岸金山寺的佛印和尚，说他修炼到了“八风吹不动”，也不贪婪功名利禄了，也不嫉妒了，也不生气了，什么都没有了。谁知佛印和尚要故意考验、考察他。便回了一封信说他“放屁”。苏东坡收到信后，一阅气得要死，立马跑到金山寺大骂佛印和尚。佛印见状哈哈大笑，也吟一句：“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这时，苏东坡才恍然大悟，自己也哈哈大笑，看来要做到超然是何等不易啊！

所以，苏东坡真正明白、真正懂得超然是在黄州后一直到惠州、儋州。否则他吟不出“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千古叹息，也不会有“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感悟。

“乌台诗案”时，苏轼吓得狠，甚至在牢中暗示灾祸降临用“菜”或“鱼”告知。可见那时的他尚未真正的脱胎换骨，尚在生死名利间徘徊。神宗皇帝关押了苏轼 100 天后，苏轼心态逐渐平静，心中坦然，可呼呼入睡。后神宗皇帝还专门安排一小太监假扮犯人与他同监过夜，打探苏轼是否坦然、安然，能够平静如常。苏东坡此时的超然，安稳入睡，鼾声雷动。神宗才放心苏轼没有反叛和怕死心态。最终赦免了他。他走出牢狱之后，如梦初醒，大彻大悟，以致在惠州、儋州再落难时，就没有了“乌台诗案”的状态，而是超然、轻松，置生死度外，视四海为家！才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吾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海南万里真吾乡”的超然心境！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超然心境，才有了在黄州及以后的文学创作黄金时期，写就了一大批惊世、传世之作。像诗《题西林壁》、《惠崇春江晚景二首》，词《洞仙歌·冰肌玉骨》、《念奴娇·赤壁怀古》、《临江仙·夜归临皋》、《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散文《赤壁赋》、《后赤壁赋》、《石钟山记》，以及书法《寒食帖》等等。这些佳作总体上讲，远胜于他在“乌台诗案”前的作品，尤其是在心境、意境和神境上高于此前的作品，没有这样的超然情怀、清欢情怀、轻松情怀，是难以成就这样的传世之作的。故而，“超然”对于作家是何等的重要心态啊！

自在的情怀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前后六十六年，在 20 岁成就功名以前可谓是在家乡学习，立志成才报效国家。20 岁到 43 岁这个期间，大多是效命朝廷，在朝为官，在各地履职。而在 43 岁这一年，他因“乌台诗案”进了监狱，也吓得半死。出狱后真正脱胎换骨，看破了红尘，到后来从黄州再到惠

州和儋州，从仕途上是屡遭贬谪（当然其间有几年得到升迁，差点拜相），然而生活中的苏东坡却愈发自在，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走就走，想醉就醉，这种自在的情怀是如何形成的，试想当年的夫人王闰之和侍妾王朝云又是如何应对的？历史无记载，但从苏东坡留下的诗词文中可以寻找到一些记载。

苏东坡在元丰三年出狱“责受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来到黄州，便写了一首《初到黄州》诗：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③

这时的东坡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但尚未自在生活，他在诗中还表现出一种委曲、无奈。表示今后只能作个“酒囊饭袋”之人了。不久他又作了一首《江城子》：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苏东坡在这首词中，把自己比作当年的陶渊明，觉得他就是当年的那个陶翁。并在这首词前专门留下了：

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④

由此可见，到黄州以后，苏东坡的心态平静了，生活也稳定了，自由自在地生活了。他的自在心态和情怀也展现在世人、家人面前。其实，他当时的生活是挺艰辛窘迫的。他在写给弟子秦观的信中就有过记载：

日用不得百五十，每月朔（初一）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⑤

他写这封信是已到黄州后不久，那时的苏东坡已和家眷们一起了。元丰三年二月来黄州时，是他一个人，住在定惠院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只是一天一顿素食，倒也简便。到五月，弟弟苏子由将家眷接到并护送到了黄州，日子便困窘起来。虽然有当地太守的照顾，全家在临皋亭居住，可由于他得不到薪俸，仅用过去的

积蓄难维持生活，精打细算过紧日子。最后无奈，在马正卿的帮助下，求得一块地（东坡）种粮种菜，并又在此建了一座房屋，唤作“东坡雪堂”，从此才真正安稳生活下来，苏东坡也才自在地过“陶渊明式”的日子。他的自在情怀其实就是一个字——“醉”！他爱喝酒，酒量不大，但一喝就醉。喜欢自己喝，更喜欢与朋友们喝，黄州太守也爱与他喝，有时自带酒来与他一起醉！他与酒与醉的作品实在太多：

他到黄州的《初到黄州》就有了“尚费官家压酒囊”的诗文后一发不可收拾。在《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一诗中有“朱唇得酒晕生脸”“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的诗句；在《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一诗中有“江城白酒三杯醉，野老苍颜一笑温”；在《定风波》中吟“与客携壶上翠微”、“酩酊但酬佳节了”；在《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中有“云间笑语，使君高会，佳人半醉”；在另一首《定风波》中有“料峭春风吹酒醒”；在《西江月·野照弥弥浅浪》中还专门有题记：“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在《江城子》中再记“梦中了了醉中醒”，更有《南歌子》中“带酒冲山雨，和衣睡晚晴”的记载。可见苏东坡是多么的自在！这首词这样写道：“带酒冲山雨，和衣睡晚晴。不知钟鼓报天明，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这一醉方休的自在感觉真好，宛如蝴蝶一般轻云飞翔！在《哨遍》一词中写道：“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又在《哨遍·春词》中写“醉乡路稳不妨行”；在《念奴娇·中秋》中记载“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更令人觉得他自在的一首《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⑥

从这首词中可了解到，深秋之夜，东坡在外喝酒，一醉再醉，到临皋家门口已是半夜三更。敲门无反应，家童已鼻鼾雷鸣。但东坡没有气急败坏，而是转身柱杖走向长江边，听听长江在夜里的独语，听听自己与长江的心声。传说他在酒兴涌起时，又在江边兴冲冲写下了最后两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第二天有人发现了苏东坡留下的诗句，赶紧上报太守，太守闻之惊惧不安，怕他有个三长两短会失职于朝廷，更何况苏东坡是个大名人，寻了短见也无法交待。于是派人四处寻找，甚至还在江中打捞。后来太守还亲自去临皋亭，进屋一看东坡安睡于家中，鼻鸣

鼾动，才放下心来！其实苏东坡饮酒不为消愁，不为逃避，而是在微醉中体会到真实的、自在的自我！东坡在他作的《和陶饮酒诗二十首》序云：“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所以他在词《满庭芳》写出了：“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正因为他的自在，因此其大作、惊世佳作都是在喝酒之时、醉醒之后所成就的，包括《念奴娇·赤壁怀古》、《寒食帖》、《赤壁赋》、《后赤壁赋》等都是苏东坡饮酒后的佳作，这在他的文章中已有记载。可见苏东坡的自在情怀，是饮酒时和饮酒醉后的自然真实的展现，是真正的“斗酒诗百篇”。这样的自在情怀，唯苏东坡才能才会展示，才会具有！

潇洒的情怀

苏东坡的超然、自在情怀，决定了他的人生必备“潇洒”之情怀！这种潇洒情怀是一般性情中人不都具备的。性情中人一般对所爱的人和事可以潇洒，对不爱的人和事就潇洒不起来！然而苏东坡的潇洒情怀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心中、眼中无一不是他所爱的人和事，他心中没有恨，只有爱，所以他活得轻松，他的情怀非常潇洒！

苏东坡在少年时，可以登上家乡的“连鳌山”，并用扫帚书写硕大过斗长短的崖上巨型“连鳌山”三个字；可以立志做忠臣“范滂”；可以改先生老师的诗文。到了18岁、19岁时，又有“唤鱼池”美满婚姻的佳话；此后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名震京师，受到仁宗皇帝、当朝重臣、文坛领袖器重。后到凤翔任签判，被当地百姓称为“苏贤良”，应当说这个时候，这段日子里的苏东坡可谓少年得志、春风得意。一路顺风的苏东坡，虽光耀，但不潇洒。而且还稍有“自傲、清高”之举。也爱用诗文谈吐讥讽他看不惯的举动与言行。否则就不会有“乌台诗案”的后事了！但如果没有“乌台诗案”这段让苏东坡“脱胎换骨”的经历，也许就难以成就“千古文宗”、“千古第一文人”的潇洒苏东坡了！

苏东坡在43岁之前，也就是在“乌台诗案”之前的为人处事和作品中，留下的抱负多，忧心忡忡，总想把自己的志向与国家强盛融为一体，锋芒显露，遭人嫉妒，授人以柄。最早看到他这一弱点的是他的老乡友、老上级凤翔太守陈希亮！陈希亮也刻意要给这位乡友晚生泼点冷水，打压一下他的傲气。可苏东坡却在《凌虚台记》中讥讽陈希亮。然而，太守陈希亮非但没有生气，反

而叫东坡将该文全刻于碑上，立于世间。苏东坡的夫人王弗看到了陈希亮的用意。后来苏东坡也清醒了，认识到陈太守的苦心。所以在陈希亮去世14年后苏轼为陈希亮写的《陈公弼传》中专门点到这个时期的事：“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这就是苏东坡当年的“气盛”，好争个高低。即使是外放任太守知州，也是壮怀激烈，也言之“老夫聊发少年狂……西北望，射天狼。”仍是雄心勃勃，立志建功于疆场。包括他在“乌台诗案”之前与弟弟苏辙的诗文信札中可以见其忠君报国的情怀、成就伟业的理念，也有调侃幽默的风趣。如在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东坡在杭州通判任上写给弟弟的《戏子由》诗文中可见一斑！

苏东坡在“乌台诗案”发生前到发生中，他仍是一个平凡人，他也怕死！苏东坡在入狱后与子相约，每日送饭菜只需菜和肉，如听到不利消息则送鱼。两月后其子外出有事，嘱咐亲戚代送饭菜，却忘了告之这个约定。亲戚一日恰好送了鱼。苏东坡一见大惊，吓个半死。遂作诗二首以诀别弟弟：《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在这里录下以观其意：

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⑦

时隔百日，风向又突变，朝廷守太祖“不杀士大夫”祖训和包括苏辙以所有官衔作保等，苏东坡终于免了死罪，贬至黄州。苏东坡经历了生死之难，脱胎换骨，也写了两首诗，其人的理念、精神和风格也变了，可谓走向潇洒。其诗名为《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

其一：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噪人。
却对酒杯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其二：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⑧

我以为，至此，苏东坡的“脱胎换骨”，实现了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也可以说是一个情怀质变。他开始“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初到黄州》），其所作所为，吟诗作赋，填词书札，都有了质的飞跃，开始潇洒自如，宛如仙境！从这儿以后，在苏东坡的作为中，包括在京师担任重臣、要职，外放各州太守，那种“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心豪气少了，更多的是务实，用实际行动来报国爱民。在登州五日，上书朝廷放开盐禁以富民，整顿军务，训练水军乡勇以固防，还为登州写了一首诗——《登州海市》，至今登州人视苏东坡为“九仙”，誉为“五日登州府，千载苏东坡”，并立祠至今。在杭州，疏浚西湖，建造六井，惠民百姓。在定州整顿边防，上书朝廷安民抚边等等。但在诗文中没有了豪言壮语。从“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的潇洒在诗文中往往是以与神仙、古人的对话，勾通心灵见著于世。而且是与政敌唱和，化干戈为玉帛，如同神仙一般！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苏东坡与友人在船上或长江边喝醉后，与三国时周瑜的交心谈心之作！十分大气，非常潇洒，近千年以来为世人称之为豪放潇洒之佳作，无人比拟！再有前后《赤壁赋》也充分展示他的潇洒情怀！在这里，我再析他的词作《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⑨

从这词中，看到了苏东坡对庄子思想领悟的升华。庄子的思想精华“唯道集虚”（《庄子·人间世》），也就是“虚静”的审美感悟，“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庄子·庚桑楚》）。苏东坡则发扬：“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送参寥师》）。他的《定风波》中“莫听穿林打叶声”，雨中不听雨，那要听什么，苏东坡不说。“何妨吟啸且徐行”，前方的路通向哪里，他不说。“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平生是悲是喜、是聚是散，苏东坡还是不说，只是“任”之。“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微冷是清凉多一点，还是寒冷多一点，苏东坡也不说。“山头斜照却相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更强调无限好还是更强调近黄昏，他还是不说。“归去”，归去田园，还是归去朝堂，苏东坡仍不说。最后是“也是风雨也无晴”，好一个虚静、空无

的潇洒境界！

再后来苏东坡的许多作品都与酒和醉、醒等相连。可以想象苏东坡的醉态，醒来又醉，挥手书毫，投笔吟诗，柱杖蹚泥，江山徐行的潇洒之状态；可以想象苏东坡与亲友畅饮和韵吟唱，赠诗换词的风采又是何等的欢快潇洒。在惠州，他可以潇洒地“日啖荔枝三百颗”，可以潇洒地

“报道先生春睡美”，是常人能有的吗？即使到海南儋州的荒蛮之地，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苦难日子，他仍以陶渊明再世自诩，和陶诗自娱自乐，潇洒过了好几年，还培养了海南第一位进士！他在《纵笔三首》（其一）中自我打趣，写道：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⑩

在苏东坡潇洒的后半生中，其才华也不仅是出众，而且是潇洒出奇！例《洞仙歌》，苏东坡在作词前有一序言：

余七岁时，见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岁，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诃池上，作一词。朱俱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

然后苏东坡写下了这首《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⑪

这是苏东坡写的、补的、填的词，我查了一下当年后蜀主孟昶写的《玉楼春》（亦有人称为《花木兰》或《玉堂春》）原诗词，发现与苏东坡的《洞仙歌》惊人的相近，可见苏东坡的潇洒和奇妙！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帘开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

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

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试想，没有潇洒的情怀，潇洒的奇特才艺，能够有如此的杰作吗？

快乐的情怀

林语堂评价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我以为他就是一个有快乐情怀的人，一个快乐之人。

苏东坡的快乐一是在为百姓做事，做成事后他很快乐；二是饱偿美食佳肴后很快乐，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嘛；三是游历大好河山之后很快乐；

四是与友交往吟唱时很快乐；五是喝酒欢快醉醒后很快乐，尤其似醉非醉间；六是与家人兄弟妻妾在一起时很快乐。

苏东坡在黄州写过《快哉此风赋》，还写有《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词，其弟苏辙也专门写了《黄州快哉亭记》。可见那个时期的苏东坡是何等的快乐！他的快乐情怀是何等的满胸怀！他在赋中写道：“贤者之乐，快哉此风。”他在词中有点睛之笔：“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苏东坡给世人、给后人一种深邃的启迪：人只要自得、坦然，只要一身正气、清欢，人就是快乐的，眼中就是美好的事物，行为就是自在的，无处不是快哉亭，无处没有快哉风！

苏东坡早年就是一个有快乐情怀之青年，他在《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时，就写下“士方其未得，惟以不得忧。”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人就没有忧愁，只有快乐了！到了四十岁时，他又在《超然台记》中写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⑫在他心中，眼中和生活中，之所以以快乐为怀，就在于我的心超然处世，心能超出事物之外啊！

所以，苏东坡在人生过程中，几乎都是快乐地生活，即使有忧有困惑有痛苦，大约也只在三分钟，至多不过一个时辰。否则那些“自笑平生为口忙”，“日啖荔枝三百颗”和“报道先生春睡美”、“一笑那知是酒红”等诗句名言如何随口而出？他在黄州、惠州、儋州时，想喝就喝，想醉就醉，想走就走，想卧就卧，随处杖行，随处而卧，随处而饮，随处而题，随遇而安就难成现实！

不过在这里，也许有人会问：苏东坡一生快乐，难道他就没有忧愁、痛苦！如果不谈及这一点，也就不是历史唯物论者。我认为，苏东坡有忧愁，有痛苦，他也是凡人、俗人一个。但是，苏东坡最大的优点是他的痛苦、他的忧愁不仅有，而且大于、多于、难于常人。可他拿得起、放得下，敢于正视，敢于放弃，敢于笑对人生，敢于面对艰难，敢于笑对忧愁和痛苦。因为他的情怀就在于快乐，就在于心中、眼中都是美好的世间、美好的人和事，所以他的人生就是快乐的！

在密州太守任上，他的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他在密州写了《后杞菊赋》⑬：

天随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因作赋以自广。始余尝疑之，以为士不遇，穷约可也，至于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然后知天随生之言，可信不缪。作《后杞菊赋》以自嘲，且解之云。^⑭

这段文字说的是，苏东坡从富庶的杭州调知密州，这是一个很穷的地方，加上自己不善理财，朝廷又削减了官员的薪水，所以一家老小到密州后，吃不饱肚子。苏东坡每日与同僚一道去古城墙边荒废的园圃里找杞菊吃，边吃边相对苦笑。于是写下《后杞菊赋》自嘲。他对这个日子很忧愁。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写了《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也就是著名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悼亡妻的千古词章。这是典型的家贫思贤妻。可也是在这个时期，苏东坡又写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西北望，射天狼”，好一个英姿勃发、意气豪放的“饿着肚子”的苏东坡！你能看出他是饿肚子，吃杞菊的太守吗？同时在此还写了《超然台记》，这是饿着肚子、吃杞菊的密州第一行政长官吗？这就是他的快乐情怀！

在黄州的日子里，起初在寺庙里每日与僧侣吃一餐斋饭。当家眷来黄州后，生活拮据，每日盘算过日子，在朋友帮助下才得以“东坡”的薄地，耕种度日，可谓艰辛。而他却在这个时期愈发快乐、超然，自诩东坡居士，过得潇洒快乐，并写下了许多千古名篇。这个时候的苏东坡真正是把忧把愁当作一种生活中的佐料，笑对付，快乐异常。在惠州的日子里，同样生活艰辛，后又朝云辞世，让他悲痛不已。而他仍然是迅速摆脱、放弃，把忧愁放在身后，快乐地生活，快乐地走向海南。并在海南与陶诗和韵吟唱，把苦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一笑那知是酒红”、“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在苏东坡奉诏北迁，吟《郁孤台》：“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赣石三百里，寒江尺五流。”从雷州到虔州，即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到江苏一路走来，半年多的时间里，一路上有人拜见、接风，都要他赠题诗联文赋等，他都快乐地接受，逐一满足。可见有快乐情怀的苏东坡的心情好、朋友多。他在《乞数珠赠南禅湜老》中吟：“从君觅数珠，老境仗消遣。未能转千佛，且从千佛转……”又在《再用数珠韵赠沔湜老》吟：“嗣宗虽不言，叔宝犹理遣。东坡但熟睡，一

夕一展转……”又在《南禅长老和诗不已，故作〈六虫篇〉答之》中吟：“凤凰览德辉，远引不待遣。鶗鴂恋庭宇，倏忽来千转……”此后他又有《明日，南禅和诗不到，故重赋数珠篇以督之，二首》中写：“未来不可招，已过那容遣。中间见在心，一一风轮转……”其二又写：“朝来取饭化，乃是维摩遣。全锋虽未露，半藏已曾转……”苏东坡用同一韵吟诗6次、6首，这不是快乐情怀之人谁又能如此吟？在他临终前几日，他还作《答径山琳长老》诗：“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可见苏东坡先生在临终前都是快乐的，笑对人生，快乐面对生命的起始终了，这样的情怀很让后辈敬仰效仿！

从上述苏东坡情怀人生初探中，是否可以让我们领悟到做人做事、珍视人生的一些真谛，陶冶我们的性情，让我们的情怀超然、自在、潇洒、快乐呢？我认为是有益可效仿学习的！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59、642、344、409、351、420页。

⑦⑧⑨⑩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32、998页、1005~1006、2327页。

⑪⑫⑬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36页《答秦太虚七首·四》、第351页、第4页。

⑭ 唐代陆龟蒙曾作《杞菊赋》，苏东坡感而继作，故名《后杞菊赋》。

（王影聪，四川省眉山市政协主席，眉山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

苏轼葬郏已定论，霍山岂会有真冢

乔建功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逐层剖析了霍山苏东坡坟墓并非真墓，继而以文献资料为依据，着重介绍了苏东坡葬郏的来龙去脉，以驳斥安徽《扬子晚报》关于东坡墓地的不实报道，从而证实苏轼葬郏无疑。

关键词 霍山 疑冢 苏轼 葬郏 无疑

河南郏县三苏园是宋代文豪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长眠之地，长期以来举世公认，闻名遐迩。然而，2013年4月18日《扬子晚报》发表《苏东坡坟墓就在安徽霍山》，文中指出：

“记者日前从安徽霍山档案局获悉，苏东坡墓不在河南，有‘苏氏宗谱’证明，苏东坡墓就在霍山。”一时间舆论哗然，继而网上也炒得沸沸扬扬，接着中华苏姓文化研究会和有关苏轼研究组织也纷纷致电询问。鉴于此，郏县苏轼研究会有关领导一行六人于2013年11月13日驱车前往安徽霍山考察。笔者有幸忝列其中。

在安徽霍山，我们受到霍山县人大、县政府及档案局领导的热情接待。档案局局长苏昌清同志向我们介绍了霍山县的东坡墓、三苏祠和小赤壁三处有关苏东坡的遗迹。当谈到东坡墓时他说，霍山的这支苏姓是苏辙后裔，他是第28代孙。苏东坡葬在那里的原因，文献没有记载，世代相传推测是，当时朝廷政治局势险恶，苏家害怕掘坟鞭尸，就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把苏东坡的真坟埋在那里。

一、难以支撑的论据

在这里既有消息报道和东坡墓冢，又有族谱记载和推测的丧葬原因，乍听好像也有道理，但稍一品味，便觉得疑窦丛生。霍山东坡墓地既然世代保密，害怕掘坟鞭尸，却又立下“文忠公苏东坡之墓”的墓碑，岂不是自相矛盾？霍山苏姓自称为苏辙后裔，缘何该地不葬嫡祖苏辙墓冢？却只有长祖苏东坡墓冢？凡此种种，怎能自圆其说？返郏后，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笔者觉得更有商榷、研讨的必要。

报道苏东坡真墓在霍山的主要依据是，清道光十九年（1840）霍山苏氏族人所编《苏氏宗谱》中有“（苏轼）次年六月葬于泸州府霍山钧台乡上瑞里，葬处张家湾双山苏家岩甲山庚向”的记载。但是这个记载明显存在问题。第一，与宋史记载不符。《宋史》卷三百三十八的《苏轼本传》附《苏过传》载：“苏轼卒于常州，过葬轼汝州郏城小峨眉山。”^①第二，与金史记载不符。《金史》卷一百三十一《列女传·白氏》载：“东坡、颖滨、叔党俱葬郏城之小峨眉山。”^②第三，与墓志铭不符。苏辙撰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载：“明年闰六月癸酉，葬于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③第四，与宋人编撰的苏东坡年谱不符。南宋施宿（1164～1222）字武子，长兴人。绍熙四年（1193）进士，曾为翰林学士。施宿的《东坡先生年谱》记载：“以七月二十八日，公薨于常州城中，葬于汝州郏城县。”^④第五，与今人编写的苏东坡年谱不符。现代苏学大家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载：“闰六月癸酉（二十日），葬于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⑤第六，与地方志不符。嘉靖十八年霍山三苏祠重修，《重修三苏祠堂碑记》中载：“考老泉公墓在蜀，文忠公、文定公墓在郏县。”^⑥很明显，明朝嘉靖年间霍山父老还知道苏轼和苏辙的坟墓在郏县。道光十九年的《苏氏宗谱》所指的东坡墓，在万历《六安州志》^⑦、同治《六安州志》^⑧、嘉庆《霍山县志》^⑨、光绪《霍山县志》^⑩中，均记为“苏氏遗冢”。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主要依据的《苏氏宗谱》所记载苏东坡的葬地与六种历史文献均不相符，除了把安葬地点“汝州郏城”偷梁换柱为“泸州府霍山”外，仓促之下把“钧台乡上瑞里”误记成了“钧台乡上瑞里”，把安葬时间“闰六月”，也误记成了“六月”。特别是，明朝嘉靖年间霍山还承认苏轼、苏辙葬在郏县，怎么到清朝的道光年间就说是葬在霍山呢？很明显，所谓霍山有东坡墓的说法，是明朝嘉靖以后的事情。尤其是所谓的东坡真墓，只不过是“苏氏遗冢”的嬗变罢了。那

么，是什么人能够改变这种说法？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这种嬗变呢？不难看出，此人的身份应该是清代的饱学之士，且有一定权势和影响力的苏姓后裔。如再进一步推理，道光十九年《苏氏宗谱》的主笔，应该就是变“苏氏遗冢”为“苏轼真墓”的创造者。当然，他们的本意也许是尊崇先祖苏东坡，激励后人弘扬三苏文化，只不过不经意布下了云遮雾绕的历史烟云。

正史、方志和家谱是我国历史文献资料的三大支柱。但是家谱往往具有丰富多彩却又泥沙俱下、淳朴翔实却又诡异百出的双重性。尤其是清代的家谱攀附假托、隐恶扬善的现象更屡见不鲜。近年有人声称其家谱中载有苏辙墓志铭，有人说其家谱记载苏迈葬在某地等，都属这种情况。因此引用家谱的资料应十分谨慎，认真加以鉴别。考证一件历史事实，往往需要将正史、方志和家谱三者相互印证，有时还需旁证、引证，甚至发掘考古予以证实。苏东坡的丧葬，从墓地的选择到安葬过程涉及他们兄弟二人来往的三封书信和九篇祭文，并伴随苏家大量的人事活动踪迹，是一个丰富而又完整的故事情节链。如果仅据《苏氏宗谱》一纸记载，就说东坡真墓在霍山，不免有管窥之弊。像《苏氏宗谱》关于东坡墓地的记载，充其量不过是个孤证而已，而在历史研究中孤证是不立的。

至于推测，固然是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但是该文在推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埋葬方法时，没有把苏氏兄弟当时的人生处境以及他们家族的人事活动轨迹联系起来考虑，更忽视了他们兄弟二人“对床夜语”终生不渝的手足情谊，特别是没有丝毫史料作支撑，因而，这种推测显得空洞无力，经不起推敲，不乏臆断之嫌。在涉及苏轼安葬过程的三封书信、九篇祭文中根本看不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设置疑冢的蛛丝马迹。因此，这种推测充其量是个没有证据的推测，而在历史研究中无证是不信的。

《扬子晚报》为了扩大报道的影响力，还借托“考古知名人士”、“副教授”之口说，“苏东坡葬在霍山是有可能的”。其理由有三：一是水路运输可到沛河；二是苏东坡在扬州任职期间为兴修水利多次到过霍山（当时安徽属扬州管辖），据考证潜台寺岩壁上的小赤壁三个字是苏东坡的手书；三是苏东坡在安徽舒州工作过。查谭其骧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北宋时期，扬州属于淮南东路，而霍山县当时叫霍丘，是属于寿州管辖的淮南西路。风马牛不相及的霍山，怎会属于扬州管辖，苏

东坡又怎会视察水利多次到过霍山？嘉庆《霍山县志·重修潜台寺碑记》明确记载“廉泉李公尝题其亭曰‘观澜’，镌其崖曰‘赤壁’。盖以崖之西山为苏氏遗冢，而双眉有似于眉山，且苏氏之遗派存焉。亦好古之盛心也。”①这里明说，李廉泉看到此处不但有苏氏遗冢，两道山梁好像眉山，并且还有苏姓后裔在当地居住，出于好古之心题下了“赤壁”崖刻，怎能说是苏东坡的手书呢？查《苏轼年谱》，苏东坡于元符三年从海南北归，八月行至廉州（广西合浦）时，授命舒州团练副使，移永州安置。十一月行至英州（广东英德），就奉敕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在外军州任便居住。满打满算，苏轼曾挂衔三个月，且根本就没有兑现永州安置的舒州团练副使，就说在舒州工作过，未免过于牵强。即便如此，对远在寿州的霍丘又有多大影响，恐怕只有冷暖自知了！凡此种种明显的纰漏差错，硬说是出在专家、教授之口，岂不是有辱斯文吗？

《扬子晚报》如此有悖历史事实的报道，误导了社会舆论，对传承民族文化建设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对弘扬三苏文化也带来不必要的误区，有必要予以澄清，以正视听。苏轼葬郑无疑，历史不能戏说，鱼目难以混珠。近年，笔者会同众多苏学爱好者通过不懈努力，从历史文献中查线索，从二苏留下的文字资料中找依据，把涉及苏轼葬郑的人和物放到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和家庭小环境中去考察甄别、分析研究，终于厘清了苏轼葬郑的来龙去脉，再现了苏轼丧葬的历史真相。藉此为澄清某些媒体关于苏轼坟墓不实报道所造成的影响略尽绵薄之力。

二、苏轼葬郑的原因

北宋后期，围绕王安石变法的兴废跌宕，朝廷政局出现一波又一波冤冤相报的党祸纷争。苏东坡和弟弟苏辙就生活在这险恶的政治漩涡中。熙宁年间，苏东坡因不满新法推行中的一些过激行为和扰民现象，被人陷害酿成“乌台诗案”，被发配到黄州，度过五年的流放生涯。苏辙则为兄赎罪贬谪筠州。支持变法的神宗驾崩后，十岁的哲宗即位，由其祖母高太后听政，改年号为“元祐”，起用司马光等不同政见者，尽废神宗时期的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当时，苏轼不尽同意这种做法，曾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及杭州太守等要职。苏辙则官居参知政事（副相）。八年后，高太后驾崩，十八岁的哲宗皇帝怀着长期被太

后压制、被大臣冷落的报复心理，在新党势力的怂恿下，“绍述”神宗时期的新法，改元“绍圣”，大规模迫害元祐党人。在这次党祸纷争中，苏东坡先从河北定州贬至岭南惠州，又被流放到海南儋州。同时，苏辙也先贬汝州，又迁筠州，再徙雷州，后至循州（广东龙川）。苏辙从汝州南下时，为解后顾之忧，把长房和次房留居许昌，置田两顷以安家，只带幼子苏远夫妇随行服侍自己。不幸的是，到达循州的第二年，儿媳黄氏（大排行为八郎妇）身染瘴毒不治而亡。对于八郎妇黄氏的死，苏辙深感悲痛，专为其撰写《祭八新妇黄氏文》。文中对儿媳为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颠沛千里备尝艰辛，以致不幸身亡的愧疚心情充满字里行间，并表示“犹冀灾厄有尽，天造有复。全柩北返，归安故土。”^⑩决心对儿媳有个好的交代。

继而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权同听政，朝廷局势出现一线转机，大批元祐党人纷纷内迁。苏辙携带着八郎妇黄氏灵柩于元符三年（1100）岁末先期回到许昌，翌年（建中靖国元年 1101 年）二月致信兄长劝其来许昌比邻而居，并提出准备安葬两年前死于广东循州的八郎妇黄氏，有人推荐一地风水甚好，但要价千缗。拟先葬八郎妇于汝州郏城嵩山脚下的自家田里。待经济宽裕，如不能归蜀，就买下该地作为兄弟二人的百年归宿之地。三月，族侄苏千之归蜀，苏辙写下《北归祭东茔文》，让其带回。文曰：“兄轼来自海南，道远未至，皆以困踬之余，思归未获。如人病蹙，心不忘起。瞻望涕泗，不知所言。”^⑪很明显，经过长达七年的贬谪流放，兄弟二人早已心力交瘁，彻底沦为垮台的罪官，贫穷的异乡人。苏辙在这里祭告先人，自己和哥哥十分渴望回归故里，像腿脚有病的人，心想站起就走，但经济窘迫却无能为力，遥望家乡只有老泪纵横，无言以对。这就是当时苏家兄弟的真实窘况。

苏东坡五月接到弟弟书信时，经过一年的跋涉刚来到真州（镇江）。在同表兄程德孺及友人钱世雄游金山寺时，听到向太后驾崩，朝廷局势改变的消息，他立即警觉起来，马上写信告诉弟弟不再北上赴许，决计留住常州。

《与子由十首》（其八）中谈到葬地时说“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可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千缗买地，何如？留作葬事，千万勿循俗也。”^⑫苏东坡本不重视身后葬地这类俗事，就这样一言遂决，遗言就使用自家已有的田地，为日后葬郑埋下了关键性的伏笔。天有不测风云，苏轼五月复信，六月就病倒，病危时，又“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

子为我铭’”（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⑬这仍是以上信中心疼弟弟，嘱咐不要另买葬地主题的重申。临终前，告诫诸子“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⑭苏东坡生性坦率，自信平生没做坏事，问心无愧，死后不会下地狱，请家人不要过于悲伤哭泣。就这样，于七月二十八日在常州溘然而逝。

三、苏轼葬郊的过程

九月初，苏辙得到苏轼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于九月五日写下了《祭亡兄端明文》曰“丧来自东，病不克迎。卜葬嵩阳，既有治命。”^⑮遣三子苏远携祭文前往常州吊唁，帮助料理丧事。

来年（崇宁元年 1102 年）春天，为了遵循把东坡同闰之夫人同穴安葬的遗命，苏迈先期赴汴京惠济道院迁移闰之夫人的灵柩，同时还把一块存放的迨妇欧阳氏的灵柩也运了过来。四月二十三日灵柩途径许昌时，苏辙率领全家路祭。在《再祭亡嫂王氏文》中说“迈往告迁，及迨初妇，灵輶（灵车）是升”^⑯，讲的就是此事。

同时，诸子扶其父灵柩从常州舣舟亭上船，经运河的润州（今镇江）、扬州、楚州（淮阴），过淮水（楚州至泗州段），入汴水，沿泗州（泗县）、宿州、南京（商丘）至汴梁，入惠民河（汴梁至许昌段）到许昌。然后，走旱路，沿许洛古道，于五月一日来到郏城上瑞里。苏辙在《再祭亡兄端明文》中说，“地虽郏廓，山曰峨嵋。天实命之，岂人也哉……卜告孟秋，归于其阡。”^⑰可见，苏东坡安葬郏城小峨眉实为顺其自然，偶然巧合，并非人为刻意安排。下葬的日期选择在孟秋七月。崇宁元年是闰六月，因此，东坡的灵柩在莹兆旁边的广庆寺停放 80 天待葬。至闰六月二十日，苏轼和闰之夫人合葬于同一墓穴。安葬时，其墓壁砖上皆印有洛人王寿卿篆刻的“东坡”二字。米芾送给他的紫金砚也入棺随葬。圹前三尺埋下墓志铭。《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写道：“明年闰六月癸酉，葬于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⑱迨妇欧阳氏另有所葬。

苏辙直到把东坡安葬后，才把八郎妇黄氏也安葬于此。苏辙在《再祭八新妇黄氏文》中说：“嗟哉吾兄，没于毗陵，返葬郏山。兆域宽深，举棺从之，土厚且坚。”^⑲明白地介绍了安葬黄氏的过程。

因此，所谓苏轼葬郏，实际安葬的是四个亡灵，出现的是三个坟冢。苏轼葬郏伊始，这里就是以苏家族墓的形式出现的。

四、葬郏之后的余音

东坡葬郏之后，苏过偕 16 岁的侄子苏符在这里结茅为庐，凿墙为牖，守墓三个年头，写下了诸多诗文，记录服孝期间的所见所闻。他写的《送参寥道人南归叙》说：“壬午岁（崇宁元年岁在壬午即 1102 年）秋八月，来自香山，见余上瑞里。”^⑩在《送参寥师归钱塘》诗中写道：“我昨南来自炎州，师亦方解钟仪囚。握手流涕古汴沟，生死骨肉我未瘳。众人见弃谁相休，累然独处空山幽。忽闻剥啄师唤我，洒扫茅堂三日留。”^⑪从中得知，大诗僧道潜曾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前往运河同苏东坡的丧舟洒泪而别，并于东坡安葬两个月后赶到郏城上瑞里为东坡扫墓，成为凭吊苏坟第一人。

道潜，浙江于潜人，宋代名僧，法号妙总法师，自号参（cān）寥子。他自幼出家，刚直敢言，能文章，喜作诗，素有诗僧之称，传世著作有《参寥子》十二卷。元丰初，苏轼在徐州领导抗洪胜利后，经秦观介绍二人得识。相聚期间，他们每每吟咏唱酬，十分投缘，声气相通，相见恨晚。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他前往陪伴，躬耕东坡，吟诗江畔，寓居雪堂一年有余。苏轼奉诏量移汝州，才一同离开黄州。途中二人同游庐山，苏轼写下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传世佳作。

后来，苏轼被贬广东惠州，又发配海南儋州。参寥忧心如焚，去信说准备带领徒弟颖沙弥度岭过海前去探望。苏轼急忙复信劝阻。就在参寥准备动身前往海南时，被人挟嫌举报，被判令还俗，编管兗州。此时的参寥子刚解脱监管生活。在众人纷纷避嫌谁也不敢接触苏家的情况下，不但前去运河送丧，又来郏城墓地凭吊，完全有理由知道丧葬的内幕。参寥子此次不远千里前来郏城凭吊，侧面可证苏东坡确实葬郏。

安葬东坡后的第二年，即崇宁三年（1104）八月，苏辙派次子苏适回蜀祭祖扫墓。在苏辙的《遣适归祭东茔文》中说：“兄轼已没，遗言葬汝。辙与妇史，夙约归祔。常指庚穴，以敕诸子……”^⑫此处苏辙告知其先祖，自己和夫人史氏死后也要随兄长归葬郏城上瑞里，墓穴为甲山庚向。

苏辙于政和二年（1112）十月去世。十一月，朝廷“追复端明殿学士，特赐宣奉大夫，赠少保”。^⑬此时，朝廷党禁已松动。政和七年，其“夫人史氏卒，同葬汝州郏城县上瑞里”。^⑭

宣和年间，苏家子辈 6 人中的 5 人以及孙辈数人也都相继安葬在这里。所谓郏县三苏坟，实际是苏家流寓在外的苏氏族茔。千百年来，苏姓后裔纷纷前来认祖归宗，祭扫祖茔。

政和年间，朝廷追复苏轼龙图阁待制。南宋建炎二年（1128），朝廷“追复端明殿学士，尽还合得恩数”。^⑮苏东坡逝世 27 年后，完全恢复名誉。

绍兴元年（1131），朝廷以时任蜀州知州苏符言苏轼复官未尽之请，于“八月庚申（十六日），特赠资政殿学士、朝奉大夫”。^⑯

绍兴九年（1139），应时任礼部侍郎苏符的奏请，朝廷于“九月丙申（十九日），诏汝州郏城县故资政殿学士苏轼坟寺，以旌贤广惠为名”。^⑰时年苏符 53 岁。苏符是苏轼长房苏迈的次子，37 年前，他年方十六，陪同叔叔苏过在郏城上瑞里为爷爷苏轼守墓三个年头，应该是苏轼丧葬过程的见证人。在他的奏请下，朝廷对郏城县苏轼坟寺颁赐命名，固然是对苏轼的褒扬，同时也是朝廷对苏轼葬郏真实性的确认。

五、考古和历史的验证

以上所述，为历史文献记载苏东坡葬郏前前后后的事实资料。除此之外，坟院大门外东侧那个坟墓的考古发掘，还为苏轼葬郏提供了重要的物证。这个墓是 1969 年当地农民浇麦时因灌水不止被发现的。1972 年省文物部门发掘出的墓志铭及其他文物，证实这是苏辙次子苏适（kuò）和夫人黄氏的合葬墓。其墓志铭显示，苏适夫妇“以（宣和）五年十月晦日，合葬于汝州郏城上瑞里先茔之东南巽隅”。^⑱考古发掘的墓志铭进一步验证了文献资料记载的真实性。2002 年 5 月，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高级顾问郑孝燮，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长、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等一行在郏县三苏园看到苏适和夫人黄氏的墓志铭时，感慨无限，连说“苏轼葬郏，铁证如山”。（下转第 20 页）

东坡屡变归老地寻因

郑秉谦

内容提要 东坡自儋州遇赦北上途中，曾屡变归老之地，本文梳理其变化的历程，探究其原因及思想背景。

关键词 归老 七州 七次变化

变化的历程

东坡一生灾难不断，但也吉星高照。他的吉星中，有三位北宋皇后：仁宗后曹氏、英宗后高氏和神宗后向氏。乌台诗案，东坡下狱，当时的太皇太后曹氏向孙子神宗说：“仁宗初得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相’，今据至于诗，冤滥甚矣！”后来她生病，神宗欲赦天下，她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①到哲宗朝，帝年幼，元祐期间由太皇太后高氏长期听政，东坡得以走上仕宦高峰和文坛领袖地位。及徽宗初立，由其母、皇太后向氏权同处理军国事半年，数十位前朝贬窜的忠直臣子，除已卒于贬地的外，均被召回朝廷或量移近地，其中包括贬逐得最远的苏轼。

东坡放逐于惠、儋两州，先后七年。元符三年，他65岁时，接到首道赦书：仍前琼州别驾，量移廉州安置。他当即于六月启行，七月四日抵廉，路上曾给编管雷州的秦观写信：“廉州若得安居，取小子一房来，终焉可也。”^②意欲就在这“合浦珠还”之地，与三子苏过一房偕老。

抵廉不久，又接到第二道赦令：以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他复于八月二十九日启程向梧州进发，想取道贺江北去永州。但到了梧州，贺江水浅不能行船，改道广州。途中，他曾打算：“更一赦，或许归农……本意专欲归蜀，不知能遂此计否？蜀若不归，即以杭州为佳。”^③

这时，从惠州来的长子苏迈，和从阳羡远道赶来的次子苏迨，领了大房、三房眷属在广州等候。十月，全家会合北上，十一月抵英州。在英得“更一赦”即三赦的诰令：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军州任便居住。宋时提举宫观本就是致仕的过渡，因此“任便居住”便可自由选择归老之地。他在事先即从友人信中得知此诰，当时复友人：“蒙录示近报，若果然得免湖外（洞庭湖外的永州）之行……此去，不住许下，则归阳羡。”^④

十二月，他舟抵韶州。听从新交友人李公寅劝，突然决定去李的家乡舒州归老。

次年（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下旬，全家抵虔州（今赣州）。初时仍说“住计龙舒为多”，到后期则变为“居处非舒则常”，最后则“决定往常州居住”。

他在虔州已得苏辙（子由）回抵颍昌庄园的消息，船到庐山下复得子由信，便又改变了去常州的决定，自称：“某初欲就食宜兴，今得子由书，苦劝归颍昌，已决意从之矣。”^⑤时为四月上旬。从此时到五月下旬的四、五十天间，他去颍昌之志一直未变。

只是到了“金山之会”，他才变了主意，致书子由云：“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⑥这成了他的最后选择。

从前一年六月离儋州贬地，到本年六月抵达常州，一年中，归老之地竟达七变，共涉及七个州，依次是：廉州——眉州或杭州——颍昌或常州——舒州——常州（或舒州、真州）——颍昌——常州。其中廉州属不得已（当时尚为“安置”处理，不得自由行动），真州属随口一说（至今未发现有归老真州的文字留下），眉、杭、舒、许、常五州则是他自己的选择。

变化如此频繁，除了与时事发展有关外，更同他“随缘自适”的思想背景有密切联系。

我们知道，东坡虽是儒家子弟，但他曾广涉释老，接受出世学说，在惠儋两州还曾身体力行。但他不像宗教徒那样，想“出生死，超三乘”，而只是期于恬淡达观，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与创造诗的境界，既使自己活得平安快乐，又使文学创作如万斛源泉夺地而出，而不为贫困、痛苦、屈辱的流放生涯所累。他任性逍遥，身不离世俗而心超然物外。这是一种思想开悟，也是一种生存智慧。这令他安度七年贬逐，并在创作上取得丰收。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他在遇赦北上途中，频繁地更换自己的归老地。他在离廉时，即认定“然外物不可必，当更临时随宜”，“水到渠成，亦不须预虑也”。^⑦在虔州则以为：“余生未知所归宿，且一切信任，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⑧金山之会后，则说：“士君子作事，但只于省力处行，此行（兄弟）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⑨这些说法，归结起来，也许即可略为“临时随宜”、“省力避害”八个字。他是在这八个大字的作用下，一路进行归老地的选择与舍弃的。

眉州的取舍

眉山、眉州、蜀中，都指苏轼的家乡。他一生66年中，约有三分之一时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对家乡的深情，常自然流露笔端。“吾家蜀江上，江水清如蓝”，^⑩赞蜀中山水也。“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⑪，赞蜀中物产也。致堂兄子安信云：“此书到日，相次岁猪鸣矣。老兄嫂围坐火炉头，环列儿女，坟墓咫尺，亲眷满目，便是人间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羡。”^⑫致妻弟王箴信云：“但犹有少望，或圣恩许归田里，得款段一仆，与子众丈杨宗文之流，往来瑞草桥，夜还何村，与君对坐庄门吃瓜子炒豆，不知当复有此日否？”^⑬均赞蜀中温馨的平常生活也。稍稍读去，川蜀泥土气息扑面而来，而东坡乡情缠绵如见。他曾在诗文中一再表示：“万里家山一梦中”，^⑭“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⑮；他甚至仕宦前期即做好归老家乡的打算：“卜田向何许，

石佛山南路。下有尔家川，千亩种秔稌。”^⑯

在他仕宦后期，贬谪岭海时，欲归老蜀中的文字也时时可见。甚至在得到第二道赦令（永州安置）后，他在复郑嘉会（靖老）书中仍说：“更一赦，或许归农，则带月之锄，可以对秉也。本意专欲归蜀，不知能遂此计否？”^⑰这位靖老，是他贬谪岭海后所交的友人，曾以“海舶”二次载书到儋，帮助东坡完成《书传》的写作。他大概是宦游广南的蜀人，或甚至就是眉山人，同东坡曾有溪山之约。但奇怪的是，在此后东坡有关归老的文字中，“故家”二字便消失了，原因何在，令后人不得其解。

但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大一些，也许可在《朱子语录》（一百三十三卷）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较东坡晚出百年的朱熹说：“蜀中有赵教授者，因二苏斥逐，以此动摇人心，遂反。当时也自（有人）响应。但未几哲宗上仙（去世），事体皆变了（指“小元祐”时二苏北还）……”^⑲与朱熹同时的陆游入蜀后也曾记载：“邛州僧寺中版（板）壁有赵撝题字，字既凡恶，语亦浅拙，不知当时中第何以如此之高？盖希时力诋元祐，故有司不复计其文之工拙也。”^⑳从这两段文字中，我们能对赵撝其人其事有个大概印象：他在哲宗亲政后应举，投时所好，力诋“元祐之政”，得以较高名次考中进士，授官蜀中某州教授，但随即发现蜀中民间颇崇“元祐之政”的两大骨干东坡兄弟，又打着反对放逐二苏的旗号造反了，时间约在哲宗去世前不久，响应者不少。当时东坡尚在海外与廉州，未知此事，以至贸然向友人表示想归耕蜀中。到了交通便利、信息灵通的广州，他大概才获知底细。而封建时代，“谋反”是灭九族的大罪，谁都忌讳，东坡哪敢惹火烧身，再提归老蜀中呢？

杭州的取舍

杭州与东坡素有渊源，因此便成为他的第二选择。东坡一生宦游四十年有零（包括三州十多年贬谪），但曾两次为官的地方，则除了汴京，只有杭州。他曾先后任杭州通判和知州合共五年。他酷爱杭州西湖的自然风光与人文积淀，写了许多赞美西湖山水与南方风物的诗。他与一般诗人一样，喜用自然诸物来形容人；

不同的是，他更爱用来形容自然诸物。第一次来杭时，他写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第二次来杭，又写了“戏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茗似佳人”。^②意为西湖美如西子，茗茶韵胜佳人。这出自不同诗篇、相隔二十年的诗句，无意中却成了“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的绝对，至今还挂在西湖龙井寺中。他的这种爱护人、尊重人的特点，反映在政治上便是“以民为本”。他尽力为百姓驱除苛政，为他们创造温饱的幸福的生活。《宋史·本传》说他“公二十年间，再莅此州，有德于其人，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③

当他因在杭作《山村五绝》等政治讽刺诗而陷入“乌台诗案”。贬谪黄州时，杭州的友人如王复、张弼、辩才、无择等毫不避嫌，大家集资，“一年两仆夫，千里问无恙。相期结书社，未怕供诗账”。^④当他十余年后贬往更远的惠州时，杭州诗僧参寥和他的徒孙，竟欲乘海船到儋州看他，后经他力辞才作罢。

杭州想念东坡，东坡更想念杭州。他在贬黄时，曾说他“轼亦一岁率常四五梦至西湖上”。^⑤

元祐末年，太皇太后高氏去世，东坡想到归老，作诗道：“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⑥这次北上途中，他还很自然地想到，若不能归耕故山，就不妨回归杭州，并说：“朱邑有言：‘子孙奉祀我，不如桐乡之民。’不肖亦云。”^⑦对杭州人民能尊崇故太守、善待自己，充满了自信。

但他却为什么终于未归老杭州？并且这次之后，始终未再提起杭州？有论者认为是因杭州物价太高，但不知何据？我则以为，主要原因，一则是他没有田庄产业与子弟亲戚在杭；二则是他的杭州老友星消云散，如王复、辩才等早已物故，参寥亦得罪流充（直到次年四月四日他在鄱阳湖上始知参寥遇赦）。

此外，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元祐期间是他仕宦高峰，深得太皇太后信任，在知杭州任上，曾大刀阔斧兴利除害，有惠于民而得罪了豪强。后者人数不多，但能量巨大。如欺行霸市的盐商颜巽父子，以假盐钞坑害百姓，东坡拟法外刺配。但这时他朝中对头颇多，有御史竟论此举不法，颜巽得以“放自便”。以后东坡流放岭

海，继任官员每欲按治此事，颜巽父子便上下叫屈，指斥官员为“元祐奸党、苏某亲旧”。这使继任官员不得不退避三舍，直到东坡卒后五、六年的大观年间，颜巽父子始被一位干员“黥窜”岭外。^⑧

在临时随宜、省力避害思想的作用下，东坡后来还是舍弃了杭州。

舒州的取舍

舒州又名龙舒，南宋又称安庆郡。它不像眉、杭、常诸州，同东坡并无很深的渊源。东坡突然想归老龙舒，实出偶然。元符四年十二月初，东坡全家舟抵韶州。韶州通判李公寅（亮工），是东坡一向推重的画家李公麟（字伯时）的弟弟。李氏一家，公麟、公寅和还有一位，三人同时登进士第，号称“龙眠三李”，有名于时。这些因素，使东坡与公寅一见如故。当公寅得知他一路为寻找归老地而费心劳神，便劝他居到舒州去。东坡一向重视友情，更富于诗情，顿时心动，并马上写诗答允：“青山只在古城隅，万里归来卜筑初。会见四山朝鹤驾，更看三李骑鲸鱼。”^⑨把自己与三李都当成了神仙中人，竟说卜居舒州，可见四方山峦朝他的仙驾，而他也可随三李骑鲸作汗漫之游。这真是天晓得，其时李公麟正因中风辞官，瘫痪在床呢！他还在公寅安排下，写信托公寅的舒州亲友代购田产：“偶得生还，平生爱龙舒风土，欲卜居为终老之计。”^⑩同时还致书友人苏坚：“龙舒闻有一官庄可买，已托人问之。若遂，则一生足食杜门（归隐）矣。”^⑪

龙舒之名来自距城40里的龙舒山，此山又称龙眠山，李公麟的别号就叫龙眠居士。元祐期间，东坡与公麟在汴京交往甚密，曾跋他的《卜居图》云：“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虽为擢绅，奉养犹农夫，……士大夫逢时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归田古今难事也”。^⑫但不料他现在却反过来，突然以为随公麟归田易如反掌。他这次在韶州，还为《李伯时画其弟亮工旧隐居图》题诗：“近闻陶令开三径，应许扬雄寄一区。”^⑬一心想与公麟结伴归隐。甚至在他离韶后还写信给公寅：“意决往龙舒，遂见伯时为善也。”^⑭

下一年（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下旬，东坡全家到达虔州（今赣州）；因赣江水浅，在此一等就是两个月。⑬在虔期间，可能是后期，他的选择开始变化，在致老友苏坚信中已说“居处非舒则常”，在舒州之外多出常州。再后来则只说常州不说舒州，或只将舒州作为后备了，如致老友李之仪信中，说：“即往淮浙间居，度多在毗陵也。”⑭致常州老友钱世雄信中，并托以在常买宅事：“此行决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僦可典买者否？如无可居，即欲往真州、舒州，皆可。”⑮

东坡在虔州后期，决定舍舒归常，如果不是出于后世不知的其他原因，那么很可能就是他离开李公寅后，觉察自己欲归老龙舒的决定，主要来自浪漫主义诗情与一时心血来潮。当时，舒州并无苏家亲旧能为他们承担置田购屋的琐事，而他所依靠的李氏兄弟，一个还在岭外做官，一个早已瘫在床上。何况公麟其人，在“眼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东坡眼里，固然仙风道骨，但在他三个儿子眼里，却也是普通的大俗人。据笔记记载，“元祐党祸，烈于炽火，小人交扇其焰，傍观之君子，深畏其酷，惟恐党人之尘点污之也。”⑯“苏公坐谪时，有在都城见叔党（苏过）而障面者。”⑰这种人中就有公麟，他时遇苏家小辈曾以扇遮面。儿子们不能不顾虑，如果时事再变，他们一家在舒便举目无亲无友了。因此，突然出现的归老舒州之议，在东坡北上历程中，只能是一个偶然性的插曲，不具有可操作性。当然，东坡的一时心血来潮，也出自他的临时随宜思想，其来有自。

颍昌的取舍

东坡一路上注意“北方事”。北方消息，有好有坏。好的如向太后开启“小元祐”时代，韩忠彦当国，文彦博、司马光33人追复原官，活着的范纯仁受到特别尊崇，陈瓘、张庭坚等忠直敢言之士位居台谏；如章惇、安惇、蔡卞、蔡京、林希等人被贬窜或一度被贬窜。但坏的也不是没有，如元符时代知枢密院事曾布，迅速受到徽宗信任，起为宰相。拜相日，曾布即以两面投机夸耀于人。他表面说要“调和”元祐、绍圣元符之政，但背地却建言徽宗“绍述”

父兄之志。昙花一现的“小元祐”时期，随着向太后的归政徽宗，很快便过去了。

至于对东坡关系特大的两个消息，他则是在虔州、真州停留后期得知的。虔州后期，曾在杭州同他唱和的江公著（晦叔），新来虔任知州。很可能就是他带来的朝中消息，促使东坡写下“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的诗句。⑯学术界很重视这两句诗，认为这是东坡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开始。但具体是指朝中哪一件事，则史无明文。按照时间来看，此时是三月下旬，在约四个月前，右正言张庭坚上表，称司马光、吕公著之贤，言二苏可用。曾布很恼火。张庭坚被宣布“忤旨”，降级外放。东坡当时听说的，是否就是这件事呢？这可说是他北上途中受到的第一个打击。

在虔州时，他已知子由回到颍昌。颍昌即是许州、许下，是子由田庄所在地。东坡三月离开虔州后，四月上旬系舟庐山下，时已收到子由信，“苦劝”他归许州兄弟相聚，他便又推翻归老常州的打算。他对人说：“居常之计，本已定矣，为子由书来，苦劝归许，以此胸中殊未定……”⑰又说：“某初欲就食宜兴，今得子由书，苦劝归颍昌，已决意从之矣。”⑱奇怪的是，不仅东坡自己，连平素谨慎的子由，此时也没想到“浮云时事变”并不宜东坡归老颍昌。相反，从此时开始到金山之会的一个多月间，东坡全家一直积极在做赴许弃常的准备：系舟瓜洲（东海亭下），令儿子回宜兴“取行李”，并“刮刷变转”（将不动产变现）；拟定六月上旬解缆北上，出汴后至陈留出陆，七月到达颍昌。他自己则还托程德孺要到了北上所乘的船，托黄寔要到了驾船的人，向王幼安借到了许州的“大第”（大屋）。可是，与程德孺、钱世雄等金山一会，他便把这些准备工作都停下了。他给子由写信说：“兄近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行有日矣。适值程德孺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皆在座。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信中还同时有个解释：“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北行渐近，决不静耳。”⑲原来如此！这是东坡北上途中，受到的第二个打击。

东坡在真州大约逗留了个把月。真州扼江淮、汴泗交通要道，是几个转运司驻节之地，

行旅辐聚，信息灵通。这期间他曾从章惇之子、他的门生章援给他的信中，见到这样的说法：

“然而旬数之间，尚书（称东坡）奉尺一（诏版），还朝廷，登廊庙，地亲责重……”^②也曾听到真州知州傅质带来的同类消息，他曾复信傅太守云：“见谕，某何敢当，徐思之，当不尔。”^③本来，遇赦归来，能够大用（当宰相）是件好事——东坡即使这样想望，也是很自然的。但东坡有经验，愈传大用就忌者愈多。正好程德孺带来了“相忌安排攻击者众”的消息，这令他十分不安，知道贸然北上至为危险。他无法忘记在贬惠之际，佛印和尚（一说守钦和尚）曾致书云：“子瞻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放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④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东坡哪敢再去四辅之地颍昌呀！

东坡对位于汴京近处的颍昌，早就望而生畏，并不自今始。在贬黄州时期，范镇归老许下，约他购屋将来同居，他就曾作《书范蜀公约邻》一文调侃，曰：“范蜀公呼我卜邻许下。许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箬笠放浪于东坡之上，岂复能事公卿哉！”^⑤现在他在子由力劝下答允去颍昌居住，只为兄弟情深。《宋史》说二苏兄弟在“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世罕见”，^⑥是有大量事实可证的。

子由曾说：“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宦游四方，读韦苏州诗，至‘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侧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⑦乌台诗案，东坡下狱自度将死，曾赠诗子由，云：“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⑧子由则上表朝廷要求以自己的官职赎东坡死罪。绍圣初，哲宗亲政，东坡自定州南贬过汝州，正值子由“岁更三黜”，但子由仍分俸七千缗，让东坡的长子苏迈带领家属就食宜兴。子由还一直说东坡“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而东坡也极推重子由：“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还向张耒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⑨当然子由对东坡更五体投地，在《墓志铭》中说他“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⑩平时也常对人说：“子瞻之文奇，吾但稳耳。”

这样的兄弟不归老团聚，除客观因素外，

只有“临时随宜”、“省力避害”的思考才能解释。

终于归老常州

常州，又称毗陵，是东坡的归老与逝世之地。所属宜兴县，又称阳羡，则有他家的田庄，也是子孙居地。在一年的北上旅程中，东坡曾三选常州：第一次是在人告他将得“任便居住”的赦令之后。第二次是留虔后期，他经考虑后放弃舒州，独取常州。第三次则在金山之会后，断念颍昌，决去毗陵。这是东坡以“临时随宜”的态度，在政治上避害，在经济上省力的结果。

东坡与毗陵有深远的渊源。据当代学者统计，他一生曾 13 次过常或到常，其中留有文字者 5 次。他在常州有同年胡完夫、蒋颖叔，有亲戚胡仁修，有世交钱世雄等人。他在常州有田庄，也置过房子。元丰末期，他还因此要求朝廷，将“汝州团练副使，汝州居住”，改为常州居住，朝廷很快批准了他的要求，他得以在此过了一、二个月田园生活。他极爱毗陵阳羡，笔赞这里的风光曰“山秀芙蓉，溪名罨画”，^⑪曰“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⑫曰：

“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慨平生之欲。誓将归老，殆是前缘”。^⑬他笔赞这里的物产，曰：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⑭他更笔赞这里的人物，曰：“独裴回而不去兮，眷此帮之多君子”。^⑮“浮云时事改”的当口，“多君子”的毗陵远比“多公卿”的许下安全。

同时，不北上而径在常州住下，还有个省钱省力的好处。东坡一家，道上一年，其中自广至真期间，据他自称，舟中“长幼卧病，幸而皆愈合；仆卒死者六人，可骇”！^⑯另据颜宗其《苏东坡年表》，截至上年末为止，东坡“流窜岭海，前后七年，契阔死生，丧亡九口”。^⑰他自己则在给黄庭信中哀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愍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复入汴出洛”。^⑱更为狼狈的是，经过一年道路，他已“币装罄尽”，^⑲也只好就近去他原就想去的常州了。

但悲哀的是，他归老毗陵原是想得到晚年的安静，但上天留给他的时间却不多了。六月，他舟发真润时已卧病，到常后，不到一个半月，

更就遽尔去世了——带着对子由无尽的思念：“恨不得老兄弟相聚，（今不能），此天也，吾其如天何！”⑩也带着对家乡的眷恋：“剑关西望七千里，乘兴真为玉局游”，⑪“玉局西南天一角，万人沙苑看孤飞”。⑫现在只有他的一缕诗魂，能飞到那儿去了。

并不只为归老

东坡在得以“外军州任便居住”后，北上一路选择住地，他自称归老或归耕。我在本文中也径称之为选择归老地，并认定他这样做的思想背景，是临时随宜、省力避害的出世意识。这是否会引起一种误会：此时积极入世的意识在他身上已不起作用了。

东坡放逐于岭外海外，已积七年。越到后来，生活越困难。元符三年正月，在他得首道赦令前几个月，曾作诗：“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终未赦虞翻。典衣剩买河源米，屈指新刍作上元。”⑬他这时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之外，⑭新加了“炊无米”，须当掉衣服去买米。但他仍关心朝廷举措，冀幸朝廷在事实证明他当年议论的正确性后再用他，不要让他在贬地终老。而现在，朝廷已对他“岁更三赦”，他当然更雄心勃勃，希望东山再起了。

本来具有欲望、思有作为，是人的本性。顺此而行才叫自然，“去欲无为”反倒是不自然。何况东坡本就是儒家子弟，积极用世的思想早已浸透了他的灵魂。他思想的两面性，陪伴他过了七年贬窜生涯的三子苏过应是最了解的。北上途中，东坡在韶州过他 65 岁生日，当时他刚接到第三赦“提举成都玉局观，外军州任便居住”的诰令不久，他欲在政治上实现自我的用世思想正在抬头。苏过这时曾作贺寿诗，其中有云：“四海澄清待今日，五湖光辅属何人。天欲斯人跻仁寿，卧龙宁许久谋身？”⁶³诗中明言东坡期待“大用”。不是最了解他的三儿子，不敢这样写；不是得到他的首肯，三儿子也不敢保存此诗（后收入《斜川集》）。当然，东坡的这种思想，在虔州受到第一次打击，以致作诗“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⁶⁴表示此心耿耿，安于归老；并在此时致自己的老友、旧部

李之仪与苏坚信内，讲了洩气话：“老病以退为上策”，也讲了负气话：“某蒙恩复旧，秩领真祠，世间美事宁复有过此乎！”⑥到了（润州）金山，他受到第二次打击，知道“时事”不允许他被大用，这时诗也不作了，便急急忙忙中止许州之行，而到常州去归老了。

由此可见，东坡北上途中，临时随宜、省力避害是摆在桌面的思想线索，积极用世、东山再起是摆在桌面下的思想线索。他北上选择居住地，其实不仅为归老，也为自己的出宦，尤其是子孙的出宦。古代文人，即使自己不再用世，但对儿孙的仕途都持比较现实的态度。如黄宗羲不与清廷合作，但仍令其子应举。东坡亦不能免俗，他所选择的归老地往往都在水运便捷之地。如他贬黄时心灰意冷，但仍劝堂兄苏不疑离蜀“谋江淮一住处”，“试思之，他日子孙应举宦游，皆便也”，并称“弟亦欲如是”。⑩我这种看法，不是唐突东坡，而是重现东坡。但两次严酷的“北方”现实，将他这种思想砸得粉碎。他的高明之处，是能在亲友与土著人士的帮助下，临时随宜、省力避害地找到适宜的归宿地，把不自然的事很自然地办成了。但这仍然只是一种无奈，而非一种选择。也许，只有这样看，我们才能看见一个前后一致、表里兼顾的完整的东坡，一个“人间不可无一不能有二”的世界文化大师！

注释

① ㊱ ㊲ ㊳ ㊴ ㊵ 转引自《苏东坡轶事汇编》，岳麓书社 1984 年版，第 59 页《吹剑录》、《耆旧续闻》，第 176 页《老学庵笔记》，第 216 页《梁溪漫录》，第 222 页《雪楼诗跋》，第 239 页，第 205 页《宋稗类抄》，第 427 页。

首·十二》，第1807页《答王幼安三首·二》，第1837页《与子由弟十首·八》，第1749页《与傅质一首》，第2259页《书范蜀公约邻》，第2578页《楚颂帖》，第1964页《钱君倚哀词》，第1741页《答苏伯固四首·二》，第1742页《与黄师是五首·一》，第1543页《答李端叔十首·十》，第1837页《与子由弟十首·八》，第1628页《与程秀才三首·一》，第1741页《答苏伯固四首·二》，第1541页《答李端叔十首·五》，第1832页《与子明兄》。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2页《凤翔八观·东湖》，第1665页《寄蔡子华》，第412页《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第308页《游金山寺》，第938页《罢徐州往南，寄子由五首·五》，第1696页《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第2825页，第1091页《杭州故人到齐安》，第1960页《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第2411页《次韵韶倅李通直二首·二》，第2413页《李伯时画其弟亮工旧隐居图》，第2445页《次韵江晦叔二首·二》，转引自第746页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引》，第998页《予以事系狱……以遗子由，二首》，第1427页《答张文潜县丞书》，第2813、2814页《苏轼墓志铭》，第555页《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五》，第2426页《过岭二首·一》，第2455页《次韵郭功甫观予画雀，有感二首·二》，第2341页《庚辰岁人日作，时闻黄河已复北流，老臣旧数论此，今斯言乃验，二首·一》。

⑭ 《朱子语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51页。

⑮ 《老学庵笔记》，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

⑯⑰ ⑯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82页，转引自第1369页《大人生日》。

⑰ 见《宋史·苏辙传》。

⑱⑲ ⑱《东坡词编年笺证》，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页《踏莎行》，第474页《菩萨蛮》。

(郑秉谦，浙江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上接第13页)

千百年来，地以人贵，无数达官显贵、文人志士前来郏城墓地缅怀先贤，壮怀述古。文字记载最早的是，金朝末年司农少卿苑中凭吊苏坟的“苑中碑”，距苏轼葬郏仅130余年。又65年后，元初元贞元年（1295）元好问之子汝州知州元叔仪为二苏修坟树碑，对苏坟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整修，留下《二苏先生墓碑记》。至顺元年（1330）朝廷树立元代名儒虞集手书的《两苏先生神道碑》。元末至正十二年（1352）县尹杨允修苏洵衣冠冢，建三苏祠。自此，方称“三苏坟”，时距苏轼葬郏250年。此后，明、清时代前来祭扫凭吊者，更是络绎不绝，影响

- 20 -

深远。

既然苏轼葬郏无疑，为何霍山又出现关于东坡墓地的不同声音呢？其实，不同观点的研讨、争论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也是学术进步必不可少的动力。这正反映传承民族文化号召深入人心的巨大动力，是人们热爱、敬仰苏东坡的具体表现。东坡墓地仅是一个文化符号，更重要的是弘扬三苏文化的精神内涵。正像《扬子晚报》报道中六安市文物管理局胡局长说的那样，霍山东坡墓“即使不是苏东坡真墓是衣冠冢，也有非常大的保护价值”。该县业已成立三苏文化研究协会筹备组，我们应当携起手来，同心协力为弘扬、传承三苏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真诚地欢迎安徽霍山的同志们前来参观指导、切磋交流。一孔之见，舛误难免，聊作引玉之砖，敬请方家师长指正。

注释

①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650页。

② 脱脱《金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77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高秀芳、陈宏天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26、1098、1099、1117、1126、1100、1100、1101、1126、1101、1103页。

④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711页。

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33、1438、1439、1439页。

⑥⑦ 万历《六安州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33、647页。

⑧⑨ 同治《六安州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407页。

⑩ 嘉庆《霍山县志》，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407页。

⑪ 光绪《霍山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37页。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舒大刚、蒋宗许、李家生、李良生《斜川集校注》，巴蜀出版社1996年版，第529、119页。

⑭⑮⑯⑰⑱⑲⑳孔凡礼《苏辙年谱》，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67、668页。

⑯ 郏县档案馆《三苏坟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乔建功，河南省郏县财政局退休干部)

风流二老对开关

——武进横山乃苏东坡“怀居”之选

颜正源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苏轼与胡宗愈的一组酬唱诗中隐藏东坡“卜居毗陵”的“庐里之约”。东坡的“怀居”之选乃有武进横山。

关键词 苏东坡 胡完夫 怀居之兴 庐里之约 武进横山

苏东坡中晚年“卜居阳羡”，其“别业”（或田庄）之所在，根据专家学者的研究，主要有五处，即南星说、闸口说、丁蜀说、芙蓉说、湖滏说。其中有东坡亲自购买的，有东坡委托儿辈购买的，有儿孙辈经东坡同意后出手购买的，还有仅有动议而未能实现的。本文作者爬梳史料文献，发现苏东坡“卜居毗陵”，其动议中有武进横山，乃其“怀居”之选也。后在东坡北归常州时竟未能如愿，此乃千古恨事也。

一、对一组酬唱诗的新理解

据《续通鉴长编》，北宋元丰八年（1087）末，苏东坡被召还朝廷，任起居舍人。而此时，胡宗愈也在汴京，任中书舍人。再加上中书舍人钱勰等，同在翰林院，因而有诗歌酬唱之事，共有十首左右。

首唱乃胡宗愈。题曰《宗愈闻子瞻舍人有怀居之兴，为短诗戏呈》：

苏公五十鬓鬢斑，云衲青袍入汉关。
贾谊谪归犹太傅，谢安投老负东山。
黄冈泉石红尘外，阳羡牛羊返照间。
知有竹林高兴在，欲闲谁肯放君闲。

“怀居”即是怀想隐居生活。“兴”乃“竹林高兴”也，指东坡欲仿效西晋“竹林七贤”，

退出仕途，悠闲林下，隐逸避世，颐养天年。但是，此乃朝廷用人之时，“欲闲谁肯放君闲”呢？

东坡乃和诗，题曰《次韵胡完夫》：
青衫别泪尚斓斑，十载江湖困抱关。
老去上书还北阙，朝来拄笏看西山。
相从杯酒形骸外，笑说平生醉梦间。
万事会须咨伯始，白头容我占清闲。

“青衫别泪”隐含告别阳羡退居生活，而颈联乃写其闲居之情态也。伯始，人名。据《后汉书》：“胡广，字伯始，练达事体，明解朝章。京师语曰：‘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隐含“胡公”，借指胡宗愈胜任朝政，而我已“白头”，“苏公五十鬓鬢斑”了，可以“容我占清闲”了。

胡宗愈的“再赠之什”，文献缺失，但从东坡的再“次韵完夫”诗中可以推出必有“庐里之约”、“卜居毗陵”的内容。

《次韵完夫再赠之什，某已卜居毗陵，与完夫有庐里之约云》：

柳絮飞时笋箨斑，风流二老对开关。
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
竹簾凉风眠昼永，玉堂制草落人间。
应容缓急烦闾里，桑柘聊同十亩闲。

“某已卜居毗陵”，指元丰八年（1085）五月举家迁居阳羡之事，但现在又与胡宗愈达成“庐里之约”，希望一起“致仕”，过上“二老对开关”（庐里，即做邻居；对开关，即苏、胡两家门对门，相互来往，进出开开、关关，很方便、随意，很亲近、友好。）的晚年生活。东坡想象，购得十亩桑柘之地，过上清闲生活。

或用惠山泉烹阳羡茶，或在夏日凉风里，睡在竹簟上。这种生活太安宁悠闲了。

这首诗与《次韵蒋颖叔》有别。

月明惊鹊未安枝，一棹飘然影自随。

江上秋风无限浪，枕中春梦不多时。

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

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

——《次韵蒋颖叔》

第一，创作时间不同。

《次韵蒋颖叔》作于元丰七年（1084），东坡如“未安枝”之“惊鹊”，“飘然影自随”之“一棹”，从黄州出来，未找到隐居之地。而《次韵完夫再赠之什……》作于元丰八年（1085），东坡“青衫别泪”，离开隐居数月之阳羡，回到汴京朝廷当官，却有“怀居之兴”。

第二，考中进士时间不同。

《次韵蒋颖叔》“琼林花草闻前语”，东坡自注：“蒋诗记及第时琼林苑宴坐中所言，且约同卜居阳羡。”苏东坡进士及第在嘉祐二年（1057），同榜之常州人有蒋颖叔与单锡。“闻前语”乃回忆27年前“坐中所言，且约同卜居阳羡”，仅限于“为鸡黍约”。鸡黍之典，出之《论语》、《桃花源记》。唐代孟浩然《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乃指邀请到农家宴叙，并无扎根隐居之意。

而据《咸淳毗陵志》卷一七载：（胡宗愈）“仁宗嘉祐四年进士。”即1059年，且高中榜眼（第二名）。比东坡中进士晚两年。在嘉祐二年，胡宗愈未考取，但结识了东坡。

第三，苏、胡之“庐里之约”与苏、蒋之“鸡黍之约”不同。

“鸡黍之约”仅是蒋颖叔、单锡邀请苏轼来阳羡作客而已，而“庐里之约”乃指胡宗愈与苏东坡一起约定，到“致仕”时，来毗陵过“风流二老对开关，桑柘聊同十亩闲”的退隐林下的晚年岁月。

第四，“卜居阳羡”与“庐里之约”不同。

东坡“卜居阳羡”由于蒋颖叔的帮助，在元丰七年五月，已迁居黄土村别业或田庄，而东坡“庐里之约”，仅是与胡宗愈的君子协定，准备将来在毗陵实施也。

那么，胡宗愈的“庐里之约”将会选择毗陵的何块宝地呢？

二、胡氏家族在常州的府邸与别墅

（一）胡氏家族的府邸位于常州城内的翰林坊

据《宋史》卷一百五十四《舆服六》载：“私居：执政、亲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六品以上宅舍，许作为头门。父祖舍宅有者，子孙许仍之。”由此可见，胡氏家族中，胡宿任枢密副使，胡宗愈任吏部尚书，皆为北宋朝廷之执政，其家可称“府”也。

据《咸淳毗陵志·坊市》载：“翰林坊在光孝寺南，以胡文恭家世掌丝纶，故名。”又据《咸淳毗陵志·诸庙》载：“感慈寺，本名显庆寺，一名报恩寺……宋元祐三年胡右丞宗愈请为坟刹……胡文恭祠在报恩寺。”报恩寺，即今日之清凉寺。胡宗愈是为其伯父胡宿尽孝心才建祠祭祀的。

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今天的劳动路基上，出土胡宗愈墓址并《胡宗愈墓志》，青石板上，篆盖有“宋故资政殿学士赠右银青光禄大夫胡公墓志铭”20个篆书大字。今藏市博物馆。

可知，胡氏家族之府邸在翰林坊，而墓地及坟刹却在城南郊。

胡宿《文恭集》卷三载诗云：

信马斗城外，芳郊秋物多。

丹枫惊岁晏，华黍嘉时和。

野老醉相话，牧童闲自歌。

牛羊稍觉晚，一一下层坡。

——《近郊》

家在清溪上，乘间一棹歌。

夕凉天有月，秋回水无波。

鸥鸟机心断，鮀鱼香味多。

吾缨犹未濯，终是负渔蓑。

——《清溪泛舟》

十日春风隔翠岑，只应繁朵自成阴。

樽前可要人颓玉，树底遥知地侧金。

花界三千春渺渺，铜槃十二夜沉沉。

雕鞶分寥何由得，空作西州拥鼻吟。

——《忆荐福寺牡丹》

这三首从不同侧面说明胡宿是住在毗陵里的。“家在清溪上”，即点明胡家靠近清溪（白云溪）；“信马斗城外”，明显是骑马从城里来到

毗陵“斗城外”——“近郊”；“荐福寺”即今之红梅公园内红梅阁——文笔塔一带，原在毗陵东城。

（二）胡氏家族的别墅在城东远郊之横山

据《咸淳毗陵志·人物（二）》载：“胡宿，以太子少师致仕，谥文恭。”胡宿《卜居》诗云：

“自致青云有壮图，且寻詹尹卜幽居。一杯谁置元王醴，三尺休弹上客鱼。足下已穿东郭履，胸中犹有茂陵书。汉皇夜御金銮殿，岂便无人荐子虚。”胡宿一面于汴京当高官，“自致青云有壮图”，一面又准备退休，逍遥林泉之下，“且寻詹尹卜幽居”。后三联乃其想像致仕后的老年生活。

胡宿《文恭集》卷三载诗云：

几日归心托暮云，半掩窗下久生尘。
水天雨气霏霏断，竹阁山花点点新。
小苑莺声偏破梦，大堤花艳欲迷人。
岂无蹀躞青丝骑，不敢偷看城里春。

——《城东别墅寄怀天锡》

小池连曲圃，幽可涤烦襟。
露菊凝秋艳，风荷结晚阴。
碧芦巢鸟重，青藻宅鱼深。
自是轮蹄外，嚣尘岂易侵。

——《别墅园池》

小阁闭春风，疏帘隔几重。
柳绵收未往，酒病太无惊。
带眼偏知瘦，棋图最信慵。
隆中一觉睡，日影过高春。

——《小阁》

老矣求田鱼稻乡，儿孙常要在余旁。
提篮买菜须灵照，举案齐眉只孟光。
医国有方三折臂，扣关无路九回肠。
紫芝白发秋风里，怅望商山绮与黄。

——《山居》

此地横青嶂，当年耸紫氛。
碧花岩下柰，玉叶岭边云。
宝势三神秀，灵风百草薰。
将军精爽在，可解勒移文。

——《横山》（又名“芳茂山”）

小湖香艳战芙蓉，碧叶田田拥钓蓬。
岚气欲飞山隔岸，秋光不定水摇空。
翩翩雪鸟争投浦，拨刺霜鳞斗掷风。
正是沧浪濯缨日，一竿多谢紫溪翁。

——《芙蓉湖泛舟》

五粒青松护翠苔，石门岑寂断纤埃。
水浮花片知仙路，风递莺声认啸台。
桐井晓寒千乳敛，茗园春嫩一旗开。
驰烟未勒山亭字，可是英灵许再来。

——《冲虚观》

就胡宿七首诗歌所提供的内容，可概括如下六点：

第一，山居名称：城东别墅。

第二，地理方位：城东，即毗陵（常州）城的东面。“不敢偷看城里春”，也知胡宿本人身在城外。山居之山，即横山（又名芳茂山）。山下有芙蓉湖。

第三，山居建筑概况：有小苑，园里有小池、曲圃、竹阁。苑外有耕田。

第四，退居生活：老妻如孟光“举案齐眉”，儿孙常在身旁。“提篮买菜”，应较方便。退居乃休息养生，“小苑莺声偏破梦”、“隆中一觉睡，日影过高春”，“酒病太无惊”，“棋图最信慵”、“芙蓉湖泛舟”、“桐井晓寒千乳敛，茗园春嫩一旗开”、“一竿多谢紫溪翁”等诗句勾勒出了胡宿日常生活的面貌。

第五，周围山川人文环境：横山——“此地横青嶂，当年耸紫氛。碧花岩下柰，玉叶岭边云”、“五粒青松护翠苔，石门岑寂断纤埃”，横山青嶂横立，山岩石岭幽深，碧花玉叶，青松翠苔，水浮花片，风递莺声。芙蓉湖——小湖香艳，碧叶田田，岚气欲飞，秋水摇空，翩翩雪鸟，拨刺霜鳞，一派水乡风情。横山有晋代曹横将军墓祠，冲虚观等名胜古迹。

第六，农村水乡：盛产“鱼稻”，开辟“茗园”。

胡宿于北宋治平四年（1067）去逝。子承父（伯父）业，胡宗愈成了胡氏家族的继承人。清代褚邦庆《常州赋》云：“胡宗愈归老筑堂，依恋横山岩侧。”（胡氏山堂在安丰南乡。宋胡宗愈归老，作堂横山，名曰“横山堂”。）胡宗愈因为站在苏轼一边，被打成“元祐党人”，著作被毁，甚为可惜。但从宋代孙觌《鸿庆居士集》中可以找到旁证。孙觌乃毗陵人，又生活在北宋之过渡时期，曾被误认是苏轼的私生子。他对胡家的了解应是真实的。

波间指点见青红，雪积峻嶒倚半空。

幻出生绡三四幅，游人浑在画图中。
苍云千亩荫平宽，露叶风枝绕舍寒。
莫遣先生赋归去，且令小吏报平安。
溜雨苍皮四十围，年来又见子孙枝。
龙钟白首门前客，待看成荫合抱时。

——孙觌《题横山堂》（三首七绝）

第一首，由远及近，“波间”，指作为“游人”的孙觌从芙蓉湖乘舟而来，“雪积岭嶒倚半空”，远见横山高耸半空。第二首，走近“横山堂”，“苍云千亩”指横山树林之广密，“横山堂”之寒舍被“露叶风枝”环绕，似乎“先生”还未“归去”。第三首，借用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赞扬“横山堂”历史悠久，代有传人。子孙枝繁，必能成荫合抱。孙觌的诗歌，说明了，胡宗愈“归去”来，退居山间，改“城东别墅”为“横山堂”。其次，教育后代，繁盛家族。据史料记载，胡宗愈一代，有宗回、宗炎、宗哲、宗师、宗原，下一代有端修、文修等。胡宗愈也有两首七律，可能与芙蓉湖有关：

平湖拍岸海潮通，亭在平湖杳霭中。
庄艳含春云岛晚，波光夜玉壶空。
动摇人影两桥月，洗涤尘襟四面风。
野老半酣亭下笑，渔樵今日与民同。
平芜十顷绿含烟，胜事兴衰已百年。
岛榭漫随民意乐，溪山应喜主人贤。
点妆野趣滩边鹭，仿佛妖容水上莲。
日日流风转谣俗，棹歌长在钓鱼船。

——《寄题钱公辅众乐亭》

说“平湖”乃横山下的芙蓉湖，主要是：首先，此湖与“海潮通”。常州江阴一带在唐宋时处于入海口。如唐代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就写出了常州江阴一带处于东海与长江的交汇处，那时的海潮可以直达南京以上。在东坡的名诗《游金山寺》开头有：“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也写到北宋年间仍是江海相连、潮水上溯的特点。而横山下的芙蓉湖，乃北通长江，直连大海也。其次，此湖面积“平芜十顷”与胡宿指“芙蓉湖”为“小湖”是一致的。再次，此湖上有“妖容水上莲”，与胡宿“小湖香艳”“碧叶田田”也相似。第四，芙蓉湖边有横山，此湖边上也有“溪

山”，也有共同处。

三、苏东坡“怀居”之选应在武进横山

从苏东坡于北宋元丰八年（1085）五月曾归隐阳羡黄土村的经历中大概可以窥测到北宋元祐初年他选择武进横山作为致仕退隐之地的原因。原因主要有：政治上对官场的厌倦与畏惧，经济上对常州“薄田”的需要与依赖，文化上对范蠡“五湖心”的倾慕与向往，人际上对常州“君子”的信任与眷恋，民风上对常州百姓的深情与坚信，地理上对常州山水的欣赏与喜爱。

（一）胡宗愈的道德人格与学识品行使苏东坡从政治上、文化思想上、家庭传统上产生亲近感与知己感

胡宗愈为人正直，有正义感与责任感。据《宋史》三一八卷记载：“宋神宗擢同知谏院。王安石执政，用李定为御史，苏、李、宋三舍人，皆不草制，坐绌。完夫曰：‘御史须官博士员外郎，用学士及丞杂荐。今定以幕职，不因荐得之，是一出执政意，即大臣不法，谁复言之。’安石怒，出通判真州，入为吏部右司郎中。元祐初，擢左史西掖夕郎中执法。哲宗问朋党之弊。对曰：‘君子指小人为奸，则小人指君子为党，陛下能择中立之士而用之，则党祸息矣。’明日具《君子无党论》以进。拜右丞，以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徙成都，召入为礼部、吏部尚书。”胡宗愈反对王安石私用亲信，主张君子无党，显然站在苏轼一边。

苏轼曾起草五篇关于胡宗愈请辞不允之诏文，看好其人其德：“雅望在人，既非一日之积；历试而用，亦自群言之公。”“卿雅望在人，纯忠许国，既以汇进，胡为力辞。”“人用之难，古今所病。忠厚者多乏于用，强济者或凉于德。有德适用，如卿几人。方观卿谋国之良，以成朕知人之美。”

胡宗愈母亲早逝，苏东坡获知，写有《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词》：“柏舟高节冠乡邻，绛帐清风耸缙绅。岂以凡人但慈母，能令孝子作忠臣。当年织履随方进，晚节称觞见伯仁。回首悲凉便陈迹，凯风吹尽棘成薪。”首联，引《诗经·柏舟》与《晋书·列女传》，赞扬胡母以寡

母抚育宗愈兄弟。颔联，引用《礼记》与《后汉书》，赞扬胡母慈而宗愈孝，能作大宋之忠臣。颈联，引用《汉书》，赞扬胡母含辛茹苦，晚节称觞。尾联，引用《诗经·凯风》，赞扬胡母的伟大的母爱精神。

（二）武进横山地区的农耕生产水准能使苏东坡及全家族顺利获得经济上安身立命的田庄（或“别业”）

在科举制度的笼罩下，胡家、苏家走的都是耕读并举的生活道路。胡家在武进横山地区能这样做，苏家也一定能在胡宗愈的大力帮助下，建立耕读并举的生活基地——有田有屋的“别业”。这与在蒋颖叔的支持下于阳羡置田购房是相仿的。

根据东坡与完夫的“庐里之约”，胡完夫可通过购房、造屋等途径在“横山堂”对面安顿苏家，称之为“别业、别墅、田庄”皆可（据《咸淳毗陵志》载“苏东坡别业在县北滆湖塘头……其孙岘因家焉。”）以成“对开关”之约定。

横山地区的农村，农桑鱼稻发达、丰盛。稻田、水田、山地，皆能提供丰富的物产。东坡能和完夫与老一辈胡宿一样，过上安宁、丰衣足食的缙绅生活，儿孙辈衣食无忧，用功读书，博取功名，光宗耀祖，指日可待，诚如孙觌诗中所言：“溜雨苍皮四十围，年来又见子孙枝。龙钟白首门前客，待看成荫合抱时。”胡、苏两家都会如愿。

（三）武进横山地区的人文山川之名能让过上致仕退隐生活的苏东坡欣赏与喜爱

吸引苏东坡来横山隐居，应该还有胡宗愈为之推介的该地区的人文山川之名胜。

据《咸淳毗陵志·山水》载：

横山在县东北三十五里，南唐徐锴碑云：旧名芳茂山。晋时常有紫气。右将军曹横葬此，易今名……《风土记》云：有大横岘以承众流，今东南有芙蓉湖，山横其间，今运河北岸有横林，去县而十七里，与山遥望，昔有树林，故亦以名。南麓有龙井。

《仙释·梁》载：

王八百隐于横山修炼，岁久，白日飞升，后为立登仙观，今冲虚观是已，丹井尚存。

（北宋）高绅早岁寓横山冲虚观，味泉极甘，谓可比惠山，惜不入陆渐鸿之品第。太平兴国中以太常少卿，出宰故里，章圣时命其子夷直为尉，俾就养焉。首访是泉，废已久，至是，复腾涌。郡别驾董黄中，作诗序其事，名“高家父子泉”。

唐代诗人刘长卿《过横山顾山人草堂》：只见山相掩，谁言路尚通。

人来千嶂外，犬吠百花中。

细草香飘雨，垂杨闲卧风。

却寻樵径去，惆怅绿溪东。

芙蓉湖在县东五十五里，南北八十里，南入无锡县，北入江阴，东南入平江府，北入扬子江。《南徐记》云：“横山北曰上湖，南曰芙蓉湖。”

在胡宿《横山》、《芙蓉湖泛舟》、《冲虚观》诗中都有过详尽的描述。东坡定会翻阅，定会留下向往与喜慕之情的。

东坡《次韵完夫再赠之什……》诗云：“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就可以完全落实了：阳羡有东坡别业，有子孙在焉，当然可以求来阳羡紫笋茶。横山有水路通向无锡惠山（芙蓉湖南入无锡县），自能取来“二泉”之水。退一步说，“桐井晓寒千乳敛，茗园春嫩一旗开”的横山甘泉与茗园旗枪也是著名的。

北宋绍圣（1094）以后，高太后辞世，哲宗亲政，以绍述为志，打击旧党，如苏轼一派即惨遭迫害。元祐党人纷纷远谪，《元祐党人碑》两次刻石示众，元祐党人子弟不得在京任职，元祐学术被禁，著作查没。胡宗愈虽然已隐退，并于1094年病逝，但朝廷还是未放过他，把他打入“元祐党人碑”。胡宗愈著作被毁、无存，苏、胡两家断绝了来往。等到东坡解禁，海外北归，落脚常州时，而完夫早逝，“庐里之约”已不能履行，但东坡似同常州季子挂剑于徐国君王之墓树一样，如约而至，却无法与完夫以惠山泉烹阳羡茶，在武进横山过退隐岩穴林下的晚岁生活了。此乃一段凄美之恨事也。惜哉，惜哉。

（颜正源，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

我寄佛心与明月，普照世间不眠人

——苏轼超然成仙秘密探究

赵军

内容提要 苏轼深受儒道释思想影响，终至成为坡仙，成为千百年来世界级英雄，原因何在？面对今天物质越来越丰富，精神却越来越贫乏的人们，又有何启发意义呢？

关键词 苏轼 成仙 秘密 探究

苏轼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文坛领袖，是党魁，是坡仙，众说纷纭。然而对这位伟人的真正认识，却在他去世后，才不断清晰起来。他去世5年后，党人碑被推到，25年后，北宋灭亡，南宋高宗皇帝，为追念苏轼，把他的一个孙子苏符赐封高官，孝宗乾道六年，赐他谥号文忠，又赐太师官阶。直到今天，各种版本的苏文忠公全集上，都印有皇帝的圣旨和皇帝钦赐的序言。2000年法国《世界报》曾系列推介公元1000~2000年间12位东西方英雄，其中唯一的中国人是苏轼。看来一个人确实可以永垂不朽，用中国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得道成仙了，因此常用“坡仙”来称之。

成神成仙，是每一个人的向往。然而，苏轼何以从“东坡居士”修炼成“坡仙”的呢？都说苏轼受儒道释思想的影响，深得儒、道、释三教之真味，熔三教于一炉，才达到“圆融”之境。那么他又是怎样熔炼的呢？三者之间是平均用力，还是有主次之分？是先从道开始，还是先从儒开始？在苏轼的境界里，是儒的成份多一点，还是佛的成份多一点呢？面对今天物质越来越丰富，精神却越来越贫乏的人们，又有何启发意义呢？笔者试图从苏轼熔炼的过程，方法上加以探究。

一、把酒问月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这是宋神宗熙宁七年，苏轼在从杭州赴密州的途中，《沁园春》（孤馆灯青）^①的下阙。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长安，代指宋都汴京。二陆，指西晋诗人陆机、陆云

兄弟。用来比自己和弟弟苏辙。当年，他们兄弟俩俱有远大抱负，决心像伊尹那样，“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孟子》）；像杜甫那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以实现其“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苏轼《上神宗皇帝书》）的政治理想。而且，他们兄弟俩“笔头千字，胸中万卷”，对于“致君尧舜”这一伟大功业，充满着信心和希望。抚今追昔，作者深感他们兄弟俩在现实社会中都碰了壁。为了相互宽慰，作者将《论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孔子家语》“优哉游哉，聊以卒岁”，以及牛僧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尊前见在身”诗句，化入词中，并加以改造、发挥，以自开解。结尾数句，作者表示自己怀才不遇的境况下，要避开政治斗争的漩涡，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姑且保全身体，饮酒作乐，悠闲度日。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已明显地显示出生命的主动意识，即“奋厉有当世志”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同时又做好道家“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的准备。一种“超然物外”的思想也由此萌芽。

因此，他在任密州知州做的第一首词就是《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
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
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②

这首词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接下去的四句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气概：词人左手牵黄犬，右臂驾苍鹰，好一副出猎的雄姿！随从武士个个也是“锦帽貂裘”，打猎装束。千骑奔驰，腾空越野，好一幅壮观的出猎场面！为报全城士民盛意，词人也要像当年孙权射虎一样，一显身手。作者以少年英主孙权自比，更是显出东坡“狂”劲和豪兴来。表达出了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以及积极用事的儒家思想。

然而在第二年，这种积极用事的儒家思想就逐步让位于道家思想。这一年，他修复了一

座残破的楼台，请他的弟弟苏辙为这座台起名叫“超然”。自己写了《超然台记》，以表明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思想。“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我们欲望的东西却是有限的。如果美好和丑恶的区别在胸中激荡，选取和舍弃的选择在眼前交织，那么能使人快活的东西就很少了，而令人悲哀的事就很多。“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事物本无大小之别，如果人拘于从它内部来看待它，那么没有一物不是高大的。它以高大的形象横在我们面前，那么我常常会眼花缭乱反复不定了。“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③我之所以到哪儿都快乐的原因，大概就是在于我的心能超乎事物之外啊！

在密州任第三年，中秋。苏轼写下了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④

调知密州，虽说出于自愿，实质上仍是处于外放冷遇的地位。尽管当时“面貌加丰”，颇有一些旷达表现，也难以遮掩深藏内心的郁闷。这首中秋词，正是此种宦途险恶体验的升华与总结。把酒问天这一细节与屈原的《天问》和李白的《把酒问月》有相似之处。其问之痴迷、想之逸尘，确实是有一种类似的精、气、神贯注在里面。既有对朝廷政局的强烈关注，又有期望重返汴京的复杂心情。把酒问月，月亮这一意象集中了人类无限美好的憧憬与理想。当他抬头遥望中秋明月时，其思想情感犹如长上了翅膀，天上人间自由翱翔。当理想与现实的二维空间矛盾时，苏轼终于找到了三维空间——文学的境界空间。超脱了这一矛盾，进入了一种豪放洒脱的超然境界。

把酒问月，是苏轼在仕途的得与失、在精神的放与收、在手足之情的合与离的矛盾冲突中的一次思考、一次突围。是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三教的第一次矛盾与冲突。虽然有预先的思想准备，但现实中仍不能放下，不能交融，“欢饮达旦，大醉”的痛苦只能跟弟弟子由说，只能对明月说。

然而，可能恐怕就连苏轼自己也没有想到，

这轮明月正是他融儒道释精华打造的独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信仰，自己心中的佛，这轮明月的佛光会照耀他的一生。

二、对月题诗

苏东坡，真正的生活是由四十岁才开始。过去在杭州，他始终充任辅佐官员，在密州虽然身为太守，但是地方贫穷而偏远，也无由一展其行政才能。后来，他在被迫之下，曾暂时退隐，在政坛上韬光养晦，直到徐州任上，一个充实、完满、练达、活跃、忠贞的苏东坡才出现。他以徐州太守所表现的政绩，已经证明了苏东坡作为行政官员，也是个干练之才。苏东坡到任三个月之后，洪水到了徐州。苏东坡奋不顾身，抢救城池。有几十天不回家过夜，住在城墙上的棚子里，监督加强外圈的城墙，终于战胜洪水。

不仅如此，徐州有着上等花岗岩、煤、铁，苏东坡了解后，积极主张开采，发展经济。因此徐州也以产刀剑著称。

这时，儒家“奋厉有当世志”的思想又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他改革吏治，关心人民，不惧天灾人祸，造福一方。这一年，阳春亭改建完工后，应好友李邦直之邀，苏轼等人一起登城赏玩，挥毫创作《快哉此风赋》，李邦直也因此把阳春亭易名为快哉亭。

贤者之乐，快哉此风。虽庶民之不共，眷佳客以攸同。穆如其来，既偃小人之德；飒然而至，岂独大王之雄。若夫鷁退宋都之上，云飞泗水之湄。寥寥南郭，怒号于万窍；飒飒东海，鼓舞于四维。固以陋晋人一快之小，笑玉川两腋之卑。野马相吹，抟羽毛于汗漫；应龙作处，作鳞甲以参差。^⑤

登亭临风，苏轼感受到的是“千里快哉风”。临风称快之时，苏轼总会想起战国时宋玉《风赋》中雄风、雌风的典故。他认为，快哉风是贤者之乐、贤者之风。一种得意超然豪迈之情溢于言表。是的，此时的苏轼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一位“贤者”，不仅政绩卓然，而且欧阳修去世之后，文坛盟主之名也降到他的头上。文人儒生皆以“夫子”呼之。秦观远道而来拜在他的门下，秦观见苏东坡时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他还把苏轼比做“天上麒麟”，又向苏轼说：“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以南能几人？”

然而，一个逐渐成熟的人，也是一个会居安思危，得意而不忘形的人。这期间，他频频

登上云龙山，拜访云龙山人张天骥，享受放鹤、招鹤的隐趣，写下著名的《放鹤亭记》。

元丰元年十月的一个夜晚，苏轼宿于燕子楼，一个旖旎缠绵的梦境，让他顿悟人生的真谛。“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⑥他的灵魂从梦境中得到了净化和升华。醒来后十分感慨，写下一首别具意境的佳作。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永遇乐》（明月如霜）

上片以倒叙笔法写惊梦游园，描写了燕子楼小园的无限清幽之景。下片抒写凭吊燕子楼，登高远眺，直抒感慨。这首词深沉的人生感慨包含了古与今、倦客与佳人、梦幻与现实的绵绵情事，传达了一种禅意玄思的人生空幻、淡漠感，隐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

按道家的观点，人体内像宇宙一样也有“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小宇宙，相生相克，只有互相和谐，人才会通达圆融。苏轼深谙此道，在奋力出世之时，不忘佛、道的相抑、相补。不忘心中的那一轮月亮。

那年中秋后，写下《中秋见月和子由》诗：

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万丈生白毫。
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
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明河千斛水。
遂令冷看世间人，照我湛然心不起。
西南火星如弹丸，角尾奕奕苍龙蟠。
今宵注眼看不见，更许萤火争清寒。
何人舣舟临古汴，千灯夜作鱼龙变。
曲折无心逐浪花，低昂赴节随歌板。
青荧灭没转山前，浪飐风回岂复坚。
明月易低人易散，归来呼酒更重看。
堂前月色愈清好，咽咽寒螿鸣露草。
卷帘推户寂无人，窗下咿哑惟楚老。
南都从事莫羞贫，对月题诗有几人。
明朝人事随日出，恍然一梦瑶台客。⑧

好一个“对月题诗有几人”，使我们油然想到他的恩师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想到“醉能同其乐，醒能述其文”的名句，尽管“明朝人事随日出”，但能保持如此清醒的有几人？能看出“千灯夜作鱼龙变”又有几人？是什么能让苏轼在滚滚红尘中能有几分清醒，几分超脱？还是那轮明月。痛苦时明月能慰藉，痛快时明月能提醒，对月，就是面对自己，就是面

对自己内心真实的世界，就会卸下面具，回归自然的人生，就会找到他寄托人生的另一维空间——诗意的空间。这轮中秋之月，再次拂拭着苏轼菩提之心。

三、酒酌江月

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衣食无着，借宿寺院、驿站（临皋亭），不得签署公事，闭门思过，苏轼这一次跌得很惨，几乎可以说从恐龙一下子变成了壁虎。然而，对苏轼这样的人来说，上帝给他关上了一扇门，他却又能打开一扇窗。

元丰三年寓居定慧院，结识僧首继连，十一月冬至，谢客入天庆观，面壁燕坐修炼四十九天。元丰四年寓居临皋亭，参与打井，五月，躬耕东坡。元丰五年二月，在东坡修筑雪堂，五月，四川绵竹道士杨世昌来访。七月十六日，陪游赤壁泛舟；十月十五日，再陪游赤壁。元丰六年，参寥禅师自杭州来访，住有一年多，做苏轼两个儿子的塾师。十月十二日夜游承天寺。元丰七年四月宴请邻里于雪堂，告别安国寺。罗列这些是为了寻觅从苏轼到苏东坡，从罪人农夫到成神成仙的修炼过程。看看他自己打开“仙”窗飞升的心理路线图。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初到黄州，苏轼折戟沉沙，但意有未平。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寂寞后，他有了更多参禅悟道的时间，有了更多与禅师道人探讨交流的机会。特别是“东坡”这块 50 亩的土地，让他真正地接到了地气，土地使他认识到“活得越简单，离神就越近”的道家简单生活的真谛。这段时间是苏轼在儒道佛方面真正融通的时间，特别是元丰五年，可以说是从苏轼到坡仙的标志性时间。

七月十六日，在四川绵竹道士杨世陪同下，苏轼游赤壁山北面的矶窝湖，写下前《赤壁赋》。“‘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既有儒家像曹操建功立业的渴望，又有着“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佛家对人生的否定、幻灭，最后通过“水”与“月”的思辨，达到天人合一的道家境界。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美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

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⑨

这次赤壁之游，这次思辨，也只是从理论上进一步完善了苏轼三教相融的思想基础，而真正的实践过程中，还会出现反复，还会出现波折与痛苦。于是就有了八月的游赤壁山南矶头（即今“东坡赤壁”矶头）的举动，写下千古豪放词《念奴娇·赤壁怀古》。“遥想公瑾当年……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仍不忘儒家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对英雄的追慕。“人间如梦”同样有四大皆空佛家对现实人生的否定。更为重要的是，也是最大不同的是“一尊还酹江月”，道法自然，“江月”是道家的象征。然而这个月亮又是苏轼融入了佛家儒家思想的月亮，因此，这轮月亮已是苏轼的信仰之佛，是融通了儒道释精神要义而产生的新的信仰的象征，甚至可以说就是苏轼自己。

这次赤壁之游，在前一次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终于形成了独特的信仰——三教融通的月亮。这轮月亮正如释迦牟尼的“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使染尘埃，因此，要“一尊还酹江月”。这此后的岁月里，不论走到哪，苏轼都会祭奠这轮明月，都会超然游于物外，都会旷达豪迈，都会随缘自适。

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似如来佛般的拈花一笑。

八月十五日，苏轼见月写下的《念奴娇·中秋》（凭高眺远）可以说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姊妹篇。

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
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
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⑩

这里苏轼不再恐“高处”寒，不用“骑鹤”，不用“骑鹏翼”，便飞上月宫仙境，达到超然物外的逍遙游。并且在“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运用典故，表达自己的得意和极高的音乐艺术。读过庄子《逍遙游》的人，一下子就理解了此时的苏轼已经达到了庄子的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神人境界，已经无所待、无所凭。

十月十五日，再游赤壁，可以说是苏轼在这一特殊信仰下的，一次全方位的践行。这次苏东坡写了一篇《后赤壁赋》。还是月明之夜，

苏东坡和两个朋友自雪堂漫步走向临皋亭。路上经过黄泥坂。地有白霜，树无青叶。人影在地，明月在天。“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见到明月，就如同见到自己的心佛，只有和几个朋友携着酒和鱼，泛舟夜游去了。然而这次不同的是，苏东坡要攀登到赤壁之上：“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一种奋然向上的苏轼呼之欲出，二客不能从焉，那是48岁的年龄。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儒生的形象历历在目。然而“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这不又是他仕途的象征吗？不正是佛家入世的象征吗？

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顾笑，予亦惊悟。⑪

“入世”不行只有归回道家，不论是孤鹤，还是道士就一定会出现的。这个孤鹤也许是徐州云龙山所放之鹤，这个道士也许是陪自己游历的四川绵竹的杨世昌。

这篇赋虽然结尾带有某种神秘主义的色彩，但是它终于使苏轼明白：在不同的处境，在不同的阶段该做怎样的事情，该有怎样的思想指导；在时过境迁之后，该怎样决定自己的自然的合理的走向。更让他明白的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和心灵，把命照看好，把心安顿好，人生即是圆满。只有在心中这轮三教交融的明月指引下，在这轮明月的光辉中，自己才不会迷失人生的方向，才能超然快乐。

“一尊还酹江月”吧，不断祭奠的过程中，你就会与明月合二为一，会实现“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理想。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明。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记承天夜游》⑫

这篇小品极短，但确是瞬息间快乐动人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痴迷的苏东坡、浪漫的苏东坡，也理解了坡仙在明月下飞仙的情怀。同

时也是他自然圆通后的一次成功践行。

在此后的岁月里，苏轼对体现自己这一思想的作品极为珍视。元丰六年好友傅钦之使人求“近文”，苏轼在临皋亭书写了前《赤壁赋》，并附有题跋式书简：“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又有《后赤壁赋》，笔倦未能写，当俟后信。轼白。”苏轼不止一次地修改、自荐、书写两赋一词，所以才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元丰七年，苏轼告别黄州时，又应邀书写给潘大临兄弟。后来，再次遭贬，别的诗文无法随从，唯独标志着他思想信仰的两赋紧贴于身，从海外北归时仍不忘。途经庐山时，一次饭后，苏轼解衣仰卧，忽记而使人诵赤壁两赋“亦足以一笑也”。在儋州也常依床听儿子诵读，抑扬顿挫清脆悦耳的声音，在苏轼看来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千江水月共一色，水动千江不动月。”人的一生修炼成一轮明月，这是多大的修为啊！

宋神宗曾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在宋代三教并行，三教合一的大环境下，苏轼的融通是其最高境界。从其思想轨迹来看，苏东坡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由儒而道、由道至释，苏轼深得儒、道、释三教之真味，熔三教于一炉，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旷达人格，在出仕、入仕间构建了自由行走的精神法则。他曾经对弟子说：“天下之理，戒然后能慧，盖慧性圆通，必从戒慎中入。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也。”在苏东坡看来，人在能获得内心的宁静之前，必须克服恐惧、恼怒、忧愁等心理障碍。心灵经过适当的修炼，必然会超脱身体的羁绊和物欲的诱惑，从而进入豁达的境界。他在《与子由弟十首》（其三）中谈到：“任性逍遙，隨緣放旷，但凡尽心，別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故祖师教人，到此便住。”^⑩正像如来佛主，会意于心，拈花一笑。

四、浩然正气才有正能量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苏轼以儒家为根本，具有积极的用世之志，有志改革朝政，而且立身刚正，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态度，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关心民瘼，勤于政事，表现了儒家的坚毅、执着、舍生取义的精神，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又能像道家那样超越生死贵贱、像释家那样以平常心对待世上风云，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生活范式，他虽然身处苦难之中，却能蔑视苦难。虽然身处逆境之中，却能超越逆境。他的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

作活力从来没有因为处于逆境而泯灭，因为他还有常人没有开发，没有到达的“仙”境。

因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能做道学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故也不能为醉汉。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也对生活太珍惜，自然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他爱自然，爱人生，爱芸芸众生，在他眼里天底下无一个不是好人。这是什么境界？这就是佛的境界。在历史的星空中，苏轼就是那一轮守望人间的月亮，如来般拈花微笑，普照着每一个不眠之人，每一个痛苦之人，每一个幸福之人。如今，在我们仰望星空时，沐浴着这轮千古的光辉，一切都是那么温馨，那么超然，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般。

然而，这一切修炼的根本，我认为还是苏轼具有的浩然之气。正像他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对浩然之气的描述：“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⑪南宋孝宗钦赐的序言也写道：“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爰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觌，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赐帝师之宠。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贊？”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季羡林先生说，苏轼的这几句诗，正是他毕生的座右铭。“大化”——一种无从阻遏也无从更改的自然巨变，一种既造就了人类，又不理会人类的生死过程，一种丝毫未曾留意任何辉煌、低劣、咆哮、哀叹的无情天规，一种足以裹卷一切收罗一切的飓风和烈焰，一种抚摩一切又放弃一切的从容。一切依顺自然，因此所有的喜悦、恐惧、顾虑都被洗涤得干干净净。而浩然之气的正能量才能使我们“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这也许就是今天我们研究学习苏轼超然成仙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②④⑥⑦⑩}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136、161、642、222、402页。

^{③⑤⑨⑩⑪} 孔凡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1、30、6、8、2260、1834、508页。

^⑧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62页。

（赵军，江苏省武进高级中学教师，中国苏轼研究会会员）

去乡三十年，风雨荒旧宅

——眉山苏轼符号的特征

刘清泉

内容提要 眉山苏轼遗迹大多湮没于历史的风尘，眉山苏轼遗址比较重要的有纱縠行故居、天庆观乡校和老翁山坟茔，它们超越时空、衍生发展，并在符号化的过程中演变成眉山苏轼符号的标志，眉山苏轼符号具有苏轼潜意识主体的特征，象征苏轼孕奇蓄秀的精神特质和苏轼文化之根，因此，潜意识乃苏轼的文字之根、仁政之根、灵魂之根。

关键词 眉山 苏轼符号 标志 特征

在我们心中，的确存在自己无法察觉的一部分意识。或许有那么一个契机，在不经意间我们发现自己未知的一面。自己心里连自己都不知道的部分，就叫潜意识。眉山苏轼符号具有苏轼潜意识主体的特征，意思是故乡对苏轼心理成长的影响，除童年记忆外，潜意识的主体源自眉山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和教育熏陶等。

眉山苏轼符号有着与雷州苏轼符号、密州苏轼符号相区别的本质特征。雷州苏轼符号的标志是“舟”，可联想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象征苏轼义无返顾的精神特质。密州苏轼符号的标志是“月”，可联想到“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象征苏轼遗世独立的精神特质。眉山苏轼符号的标志是“宅”，可联想到“去乡三十年，风雨荒旧宅”，象征苏轼孕奇蓄秀的精神特质。在潜意识中纠结的故乡之根，实乃文字之根、仁政之根和灵魂之根也。

一、文字之根

苏轼说“平生文字为吾累”^①，文字让苏轼受到拖累，文字也让苏轼名扬天下，乃至名垂千古。他的文字之根在那里呢？在眉山市，在纱縠行，在天石砚，正如苏洵所言，天石砚

“是文字之祥也”。父亲苏洵在《上张侍郎第一书》中称其二子“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者”^②，而苏轼亦以此自称。

苏轼《天石砚铭并序》云：

轼年十二时，于所居纱縠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如鱼，肤温莹，作浅碧色，表里皆细银星，扣之铿然。试以为砚，甚发墨，顾无贮水处。先君曰：“是天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赐轼，曰：“是文字之祥也。”轼宝而用之，且为铭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于德，或全于形。均是二者，顾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丰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狱，家属流离，书籍散乱。明年至黄州，求砚不复得，以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当涂，发书笥，忽复见之。甚喜，以付迨、过。其匣虽不工，乃先君手刻其受砚处，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③

苏轼在序中首先叙述了发现天石砚的经过“轼年十二时，于所居纱縠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说他十二岁的时候，在所住的纱縠行故居的空地里，和一群少年作掘地的游戏，得到一块奇异的石头。然后描写了天砚的外貌“如鱼，肤温莹，作浅碧色，表里皆细银星，扣之铿然。试以为砚，甚发墨，顾无贮水处”，形状像鱼，外表温润晶莹，为浅绿色，外表和里层都点缀着细小的银星，击打它就发出铿锵的声音。试着拿它当砚使用，很能发墨，只是缺少贮水的地方。这是上天赐给苏轼的宝贝，与之相关的文字、文辞、文书、文思、文采、文章、文事，皆在其中濡染、孕蓄而灵气四溢。所以，天石砚乃文字之根也。

此文跋曰：“元丰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狱，家属流离，书籍散乱。明年至黄州，求砚

不复得，以为失之矣。”叙述了“元丰二年秋七月，我获罪入狱，家属流离失所，书籍也丢失散乱。次年来到黄州，寻找那方天石砚，却怎么也找不到，以为把它丢失了”的事情。天石砚在哪里丢失了呢？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是因为它藏在大脑中某个部位，这里说的某个部位就是潜意识。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中的部分东西，会以三种变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失误、梦和神经症。他把日常生活的错误称为“错误行为”，认为往往有心理的原因。苏轼的“错误行为”，有何心理原因呢？

序的最后说“先君曰：‘是天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赐轼，曰：‘是文字之祥也。’轼宝而用之”，父亲把天石砚还给我，我十分珍惜地使用它，是因为父亲说：“这是你作文章发达的祥瑞之兆。”可是，因“乌台诗案”文字狱，苏轼在潜意识里似乎对天石砚不满了。天石砚有文字祥瑞之兆受到怀疑，在他看来，是凶非吉啊！不愿意记起天石砚放在何处，显然是在回避，在内心的某个地方有意避开，从而导致不需要天石砚的心理，因此不愿意见到它。这恐怕是忘记了天石砚放在哪里的原因吧！

给自己带来盛名的文字，现在却给自己带来了灾难。对文字的畏惧，在贬谪黄州之初，甚至达到“不敢作文字”的地步，苏轼在《答李端叔书》所说：“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④这还是苏轼吗？这已经不是“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⑤的苏轼了。苏轼天石砚铭曰：“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于德，或全于形。均是二者，顾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大意是：一旦接受了上天的造就，就永远不再改变初衷。或以品德为高，或要保全形体。如果两者都有，那我取法什么？仰人鼻息跪人脚下，这样的人世上多有。从铭文来看，在苏轼笔下，天石砚就是他自己的象征。已经失去了自我的苏轼，就像遁形而去的天石砚一样。由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红楼梦》中“通灵宝玉”的隐遁与复归，有人甚至认为，贾宝玉有苏轼的影子。

此文跋又曰：“（元丰）七年七月，舟行至当涂，发书笥，忽复见之。甚喜，以付迨、过。其匣虽不工，乃先君手刻其受砚处，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其中叙述了元丰七年七月，乘船到当涂，打开书箱，忽然又见到了它。非常高兴，于是把它交给儿子苏迨和苏过。装砚的匣子虽然不十分精致，却是先父亲手在得到此砚的地方刻的，并命匠人按砚的形状做的，不能更换。这是苏轼从黄州量移汝

州途中发生的事情，此诏命透露的政治信息、人生转机，消除了苏轼潜意识中压抑信息的魔板，因此，乘船到当涂，打开书箱，忽然又见到了它，似乎远遁的天石砚，又自己回来了似的。苏轼找到了天石砚，仿佛也找回了自己。

总之，无论哪种错误行为，都与潜意识密切相关。也就是说，错误行为是由潜意识中心理上的东西变了个形式所反映出来的东西。在纱縠行这方沃土中发掘的天石砚，可以看作是苏轼故土的物质符号，苏轼濡墨于此的文字熠熠生辉。它伴随着苏轼宦海沉浮，把它看作苏轼文字之根、文学之根，我以为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由与天石砚相关的潜意识，可知与纱縠行故居的密切关系。

二、仁政之根

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礼部考试的应试文章《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有一处笔误，即把“舜”误作“尧”。众多的苏轼文本均已指出其错误。张志烈等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在注释中说：“皋陶：亦作咎繇。舜时为司刑之官。《书·舜典》：‘帝曰：“皋陶，……汝作士，五刑有服。”’苏轼误作尧之时。”^⑥此书也仅仅指出其“误作”而已。

彭林泉先生在《〈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省刑慎罚观》中亦指出了苏轼的这一处笔误，并简要谈了自己看法，他说：

士是狱官，皋陶本是虞舜任用的法官，后来曾被大禹举荐为继承人，在苏轼的笔下，却成了唐尧的执法官。按照《礼记·王制》的记载：“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后制刑。”宥指赦免、宽恕。三次宽宥然后处刑，当是周代的制度，史籍未载尧舜时如此。这个例子有误，是苏轼记错了，在考试后，他也没有修改，也许是出于自信或保留原文的缘故。^⑦

“这个例子有误”，这个例子有什么错误呢？它不仅把“舜”误作“尧”，而且还杜撰了“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的故事，作为事实论据来论证他仁政的论点。此文虽是应试之文，但却阐明了他平生遵循的以仁政治国，以“君子长者之道”风化天下的思想，语言质朴，无所藻饰，有孟子、西汉文风，符合古文革新的要求，深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正如南宋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说：

欧阳公作省试知举，得东坡之文，惊

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其是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欧问坡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公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赠其子丕。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然予尝思之，《礼记》云：“狱成，有司告于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王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坡虽用孔融意，然亦用《礼记》故事。其称王、谓王三皆然，安知此典故不出于尧？（转引自《苏轼全集校注》注释）⑧

应该说，论据虚假，则论点不立。但是，为什么欧阳修却大加赞赏呢？虚假的论据，其实并不虚假，因为它有类比的合理因素。意其如此的类比虚构，合乎常情，类乎常理，所以欧阳修赞扬苏轼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苏轼此论的成名，前人早就看到了它的地位、意义和影响。南宋陈善说：“唐文章三变，宋朝文章亦三变矣。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门户，不相蹈袭。”⑨叶适也说“以文为论，自苏氏始”⑩，而科举促使其论的写作一发不可收拾。

“是苏轼记错了”的结论武断了一些，以苏轼的天才全能，他怎么会记错呢？

据说，苏轼能将整本《汉书》从头至尾背下来，甚至随便在哪一页提示三五字，他均可将接续下去的文字背诵出来。这得益于抄读，据说他曾把《汉书》抄了三遍。苏轼在《与王定国四十一首》（十一）中说：“幸更著鞭多读书史，仍手自抄为妙。”⑪可以为证。王定国：王巩，字定国，山东莘县人，苏轼之友。在他的《甲申杂记》（转引自江澄格《探索湖州风暴与儋耳海啸的远因原由》）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足可见苏轼惊人的记忆力。文曰：

天下之公论，虽仇怨不能夺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尝谓余曰：“昨在从班，李定资深鞠子瞻狱，虽同列不敢辄启问。一日，资深于崇政殿门忽谓诸人曰：‘苏轼奇才也！’众莫敢对。已而曰：‘虽三十年前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奇才也！’叹息不已。”⑫就连政敌李定也不得不佩服苏轼超强的记

忆力，称赞他的确是天下奇才。既然不是记错了，那么此处笔误有何深意呢？

这种错误类型常常表现为说错话、写错字、听错话、读错字等。弗洛伊德认为它是窥视潜意识的重要途径，是内在某种力量所导致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导致苏轼之误呢？我以为是深入骨髓的儒家思想。

眉山古朴的民风，符合儒家倡导的社会理想。苏轼《眉州远景楼记》说：“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⑬意思是我家乡眉州的风俗，有三种是接近古风的：那里的士大夫看重学习经术并重视宗族亲戚，那里的民众尊重官府而惧怕犯法，那里的农夫合作耕种以互相帮助。这些都是三代、汉、唐时的朴厚遗风，其他各郡都比不上。

苏轼母亲程夫人的“性仁”（苏轼《记先夫人不残鸟雀》）、“行廉”（苏轼《记先夫人不发宿藏》）的品德教育，八岁入小学，以后入州学，后来其父苏洵亲授以书，都以儒家思想教育为主，且十分严厉。苏轼《夜梦》诗云：“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怛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我生纷纷婴百缘，气固多习独此偏。”⑭写到达儋州十余日，梦见小时读书的情景：写自己贪玩耽误了背书，听说父亲要检查，吓得把书都掉到地上了，因为按照安排应当背完《春秋》，而现在刚背到桓公、庄公之时，所以心里忐忑不安，像吃了挂钩的鱼一样。

乡风民俗、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让苏轼在内心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仁爱的力量。无论是自己可以意识到的部分，还是无法意识到的部分，都被这种力量所控制。彭林泉先生说：“三次宽宥然后处刑，当是周代的制度，史籍未载尧舜时如此。”但是，在紧张的考场上，苏轼根据《三国志·孔融传》裴松之注，联想到唐尧以行仁政而深受后人尊崇，既然行仁政，当然不会随便使用重刑。对于那种可用重刑亦可用一般刑的情况，他肯定不会选择使用重刑。所以就杜撰了那个典故。皋陶本是虞舜的法官，在潜意识里，苏轼认为他应该是唐尧的法官才对。这也是为虚构论据作掩饰。这个迷魂阵，让一代宗师欧阳修也云里雾里不知典出何处了，听了苏轼的解释，退而大惊，赞赏有加。

由此可见，故乡眉山的风俗、家庭和学校的熏陶、感化和教育，让仁政深植于苏轼的血液和灵魂。苏轼为实现仁政的政治理想，所做的不懈努力，所表现出来的品德，足以使他永

垂不朽。正如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所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⑩仁政可以看作是苏轼故土的精神符号，故土是苏轼的理想之根、仁政之根。由与仁政相关的潜意识，可知与故乡眉山的密切关系。

三、灵魂之根

灵魂，迷信的人认为附在人的躯体上作为主宰的一种非物质的东西，灵魂离开躯体后人即死亡。剥去迷信的外衣，灵魂实际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心理现象，是人脑的机能。心理现象的消失，意味着人的死亡。无可讳言，人们魂牵梦绕的东西，往往是儿时记忆中故乡的山水、草木、人家等等，因此，故乡是灵魂之根。可是，苏轼为了实现仁政的理想，背井离乡，“身行万里半天下”，他为官异地，特别是贬谪异乡之时，似乎忘记了他的故乡呢！请看下列诗文：

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苏轼《与赵晦之四首》（其三）⑪

譬如原是惠州人，累举不第，虽欲不老于此邦，岂可得哉！——苏轼《与程正辅三首》（其一）⑫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苏轼《别海南黎民表》⑬

贬谪黄州时，他说自己是黄州人；贬谪惠州时，他说自己是惠州人；贬谪儋州时，他说自己是海南民。他对故乡眉山真的无所挂念了吗？其实不然，以上诗文实际上是潜意识中被压抑乡思的变形。

在苏轼的诗词中，含“梦”字的有352首之多，其中思念家乡的亦不在少数，譬如：

万里家山一梦中——《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⑭

梦归时到锦江桥——《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二首，其二》⑮

君已思归梦巴峡——《陈州与文郎逸民饮别，携手河堤上，作此诗》⑯

梦回相对两凄然——《喜王定国北归第五桥》⑰

不美三刀梦蜀都——《送吕昌朝知嘉州》⑱

梦中却到龙泓口——《送张嘉州》⑲

我梦入小学——《和陶饮酒二十首并叙，其十二》⑳

只疑归梦西南去——《留题显圣寺》㉑
但觉秋来归梦好——《河满子》（见说岷峨凄怆）㉒

故山空复梦松楸——《浣溪沙》（倾盖相逢胜白头）㉓

蝴蝶梦中家万里、须著人间比梦间——《南乡子》（何处倚阑干）㉔

从以上例句不难看出，故乡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时时萦绕在他的梦中。弗洛伊德认为“梦是通往潜意识的康庄大道”，对梦境的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诗词外，涉梦之文亦不少，甚至还有白日梦，如苏轼《梦南轩》。其文曰：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将朝，尚早，假寐，梦归穀行宅，遍历蔬园中。已而坐于南轩，见庄客数人，方运土塞小池。土中得两芦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笔作一篇文，有数句云：“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既觉，惘然怀思久之。南轩，先君名之曰“来风”者也。㉕

意思是：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将上朝，时间还早，靠在几上打瞌睡，梦中回到穀行宅，走遍菜园。一会儿又坐在南轩，几个庄客正在运土填塞小池。土中找到两根芦菔根，庄客高兴地吃了。我取笔写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是：“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醒后，惆怅地想念家乡许久。南轩，就是先父命名为“来风”的地方。

元祐八年八月一日，苏轼妻子王闰之卒；八月十一日，将朝尚早假寐（即不脱衣服小睡、打瞌睡）之时做了一个梦，此梦类似我们常说的白日梦，即在清醒状态下的空想。在潜意识里那些“被压抑的东西”，经过简缩、转移、综合等工序，被整理成了一个带情节的故事。但我们可以从“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角度来分析。

“已而坐于南轩，见庄客数人，方运土塞小池”，“南轩”象征故乡，“小池”象征墓穴，“运土塞”象征埋葬，此处有将王闰之归葬眉山之意。

“予取笔作一篇文，有数句云：‘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取笔作一篇文”象征草拟诏书，“修竹数百，野鸟数千”象征黎民百姓，此处有大展宏图、致君尧舜之意。

“梦归穀行宅，遍历蔬园中”逼真地表现了他对故乡的思念，“既觉，惘然怀思久之”直接表现他对故乡的思念。

是辞官返乡，处江湖之远；还是固守京师，居庙堂之高呢？选择前者，则半途而废，前功

尽弃；选择后者，则可施展才干，以实现理想。当时，苏轼正处于官运亨通的顶峰，也隐约地预感到朝政的重大转折即将到来（九月十三日，太皇太后高氏病逝，苏轼即出知定州）。这一个白日梦反映了苏轼在妻子王闰之逝世不久的心理矛盾。

在苏轼诗文中还大量出现峨眉、瑞草桥等地名。我们推想，他一定常常在梦里回到纱縠行故居、回到天庆观乡校、回到老翁山坟莹吧！苏轼这棵文化大树，离开了故乡眉山的土壤，它文化的根就不会深，而根不深则干不壮、枝不展、叶难茂。文化有根，灵魂也有根，在潜意识中被压抑的乡思就是苏轼灵魂之根。梦幻可以看作是苏轼故土的灵魂符号。由与梦幻相关的潜意识，可知与故乡眉山的密切关系。

眉山三苏祠飨殿有一幅对联，是光绪十九年癸巳中秋滇西后学杨庆远敬题的：“官迹渺难寻，只博得三杰一门，前无古，后无今，器识文章，浩若江河行大地；天心原有属，任凭他千磨百炼，扬不清，沉不浊，父子兄弟，依然风雨共名山。”上联颂扬“三苏”的器识文章。

“器”，用具之意，引申为才干、器量；“识”，见识之意。“器识”是指一个人处理事物、认识事物的能力。秦观说苏轼“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即说他见识远器量大。下联赞美“三苏”的人格节操。“扬不清，沉不浊”化用《世说新语·德行》：“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三苏父子就像名山大川一样，褒扬、赞美不能增添他一点光彩，贬斥、批判也难损他一根毫毛，他们具有名山大川一样的永恒价值。苏轼的器识文章、人格节操，其源皆出于眉山，因此，眉山苏轼符号象征苏轼文化之根。

注释

① ⑪ ⑫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8、4856、5119页。

② 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六册），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③ ④ ⑥ ⑧ ⑪ ⑬ ⑯ ⑰ ⑲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9、5344、158、158、5673、1112、6283、8610、8136页。

⑤ ⑦ ⑯ ⑰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168、478、771页。

⑦ ⑯ 《苏轼研究》2013年第1期、2012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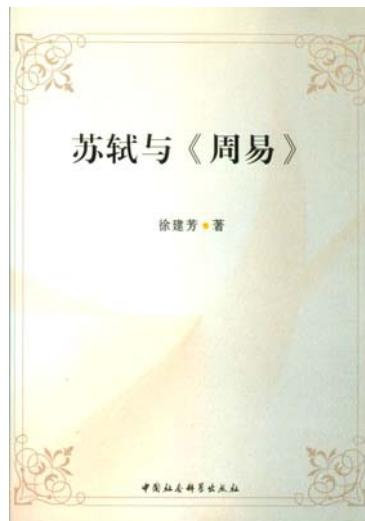
⑨ [宋]陈善《扪虱新话》卷五，续修《四库全书》本。

⑩ [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五〇，《皇朝文鉴》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44页。

⑪ 转引自王国维著，黄霖、周兴陆导读《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⑫ ⑯ ⑰ ⑱ ⑲ ⑳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12、450、1017、1180、1640、1709、1881、2427页。

（刘清泉，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书名：苏轼与《周易》
作者：徐建芳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8月第1版
开本：32开
页数：368页
定价：35元

苏轼游历赣南时间考

李云彪

内容提要 今天的赣南，涵盖了宋代的虔州（绍兴二十三年改赣州）和南安军，在行政区划上即为今天的江西省赣州市。苏轼一生曾两次途经赣南，第一次是在绍圣元年（1094），第二次是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第一次游历赣南，是从八月十日至九月初，时间为二十几天。苏轼第二次游历赣南，是从一月四日至三月末，时间为二个多月。总之，苏轼两次游历赣南的时间总共为三个多月。虽然时间短暂，但苏轼在赣南题诗寄慨，留存38首诗。

关键词 宋代 苏轼 虔州 南安军

苏轼一生曾两次途经赣南，第一次是在绍圣元年（1094）。这年因“所作词令，以为讥斥先朝”，苏轼被“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①赴贬所途中，苏轼坐船溯赣江而上至虔州，后经南安军过大庾岭，第一次途经赣南。第二次是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新立大赦天下，苏轼“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复朝奉郎”。^②建中靖国元年一月，苏轼北返时过南安军至虔州，第二次途经赣南。关于苏轼两次逗留赣南的时间，有以下几种观点。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一书中提出：“在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苏东坡穿越大庾岭，在山北赣县停留了七十天。”^③林语堂一书中提到的“赣县”，应为宋代虔州的郡治所在地虔州城。据史料记载，东晋永和五年（349），南康太守高珪（有的史书称高琰^④）建虔州城，“置郡城于章、贡二水间”。之后，赣南郡城所在地略有变迁，“（东晋）义熙七年（411），徙于赣（县）水东。梁承圣元年（552），复于章贡间，即今城是也。”^⑤梁承圣元年之后，虔州

城作为郡治所在地确定并沿用下来。1936年，将虔州城城区设城东、城西、城南、城北、东郊五镇。1943年，五镇合并，名赣州镇。^⑥

1988年出版的《江西省赣州市地名志》“苏轼”条记载道：“绍圣元年（1094）以端明殿侍读学士落职，谪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过虔留月余……元符三年（1100）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次年正月至虔南四十余日，寓居水南。”^⑦这里提到的“虔南”，不是指宋时的虔南县，也不是指今天的龙南县，而是指虔州城南部的“水南”。据《春渚纪闻》记载：“（东坡）先生自海外还至赣上，寓居水南。”^⑧

林晓平在《苏东坡与赣南客家文化》一文中提出：“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官惠州，途经赣南，并在此逗留一个半月；1101年，苏轼由儋耳（海南岛）北归，再度翻越大庾岭，在赣南复留连四十余日。”^⑨林晓平一文中提到的“赣南”，应为今天的江西省赣州市，后面有详细的介绍，在此不赘述。

高萱兰在《苏东坡漫游虔州留珍迹》一文中提出：“苏东坡曾两次经过赣州，第一次是在北宋绍圣元年（1094）八月，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触怒朝廷，被贬谪到岭南的惠州，在赣州逗留了一个多月；第二次是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即过了七年奉调回朝，两过赣州，又滞留了四十余日。两次先后在赣州居住了两个多月。”^⑩高萱兰一文中提到的“赣州”，也应为宋时的虔州城。据《赣州市况》记载，1949年8月15日，将赣州镇从赣县划出设市，并成立赣州市人民政府。^⑪

可见，关于苏轼在赣南逗留的时间，林语堂、《江西省赣州市地名志》、林晓平和高萱兰所述不同。由于存在争议，故本文试图在前辈

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重新探讨苏轼游历赣南的时间。

一、赣南在宋代的地域范围

由于立论的角度不同，以上学者分别使用了“赣县”、“虔州”、“虔南”、“赣南”、“赣州”等地名词，这容易混淆苏轼游历赣南的地理范围。缘于此，在探讨苏轼游历赣南的时间之前，必须先介绍“赣南”在宋代的地域范围及名称的变化。

今天的赣南，涵盖了宋代的虔州（绍兴二十三年改赣州）和南安军，在行政上即为今天的江西省赣州市。北宋开宝八年（975），宋太祖平南唐，得虔州（治所在虔州城）。据《宋史·地理志》记载，虔州隶江南西路，下辖赣县、虔化（绍兴二十三年改宁都）、兴国、信丰、雩都、会昌、瑞金、石城、安远、龙南（宣和三年改虔南，绍兴二十三年复改龙南）、大庾、南康和上犹（嘉定四年改南安）等13个县。宋太宗淳化元年（990），“以海盐盗入岭北，民犯者众”^⑩为由，从虔州析分出大庾、南康和上犹3县，别置为南安军（治所在大庾县城），隶江南西路。^⑪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秋七月，虔州军卒齐述杀殿前司统制吴进和江西同统领马晟，据虔州叛。八月，宋高宗遣鄂州都统制田师中发兵同江西安抚使张澄、殿前司游奕军统制李耕讨伐。十一月，李耕尽诛叛兵。齐述兵变后，虔州改名为赣州。据《宋史·高宗传》记载：绍兴二十三年（1153）二月，“庚午，裔虔州军贼黄明等八人于都市。辛未，改虔州为赣州。”^⑫改名的原因，是时人认为“虔”非佳名，“应杀虔之义”，“取章、贡二水合流之义”，改虔州为赣州。对此，《宋会要辑稿》有详细的记载：

绍兴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秘书省校书郎董德元言：“江西虔州，士大夫谓之虎头城，非佳名也。《左氏传》曰：‘女用贽以告虔。’释云：‘虔，钦也。’又曰：‘虔，刘我边陲。’释云：‘虔，杀也。’今虔之风俗，固有儒良美秀之家，以应虔钦之义；而椎埋盗夺之习为多，又应杀虔之义。州

有十县，地广人稠，大抵嗜勇而好斗，轻生而敢死。今天下之民举安矣，独此郡间有小警，臣意其各有以兆之。欲乞去其不令之名，赐以美称，则不令之实自此而销。属县有虔化，乞并更之。”中书后省言：“虔州本汉赣县，有贡水出自新乐山，至县郭东北与章水合流，名曰赣江。《太平寰宇记》云：‘晋永和五年，太守高珪置郡城于二水间，即今城是也。’今拟改虔州为赣州。虔化县，据隋地理志旧曰宁都，仍欲复旧名。”从之。^⑬

虔化和虔南也因同样的理由，分别改名为宁都和龙南。

“江西虔州，士大夫谓之虎头城。”宋人说虔州是“虎头城”，是因为“虔”字为“虎”字头。其实，虔州是“虎头城”的看法在宋代比较普遍。北宋赵抃《同周敦颐游马祖岩诗》曰：“虎头城里人烟阔，马祖岩前气象豪。”^⑭苏轼《用前韵再和霍大夫》曰：“行看凤尾诏，却下虎头州。君意已吴越，我行无去留。”^⑮南宋崔与之《柴秘书分符章贡，同舍饯别，用蔡君谟“世间万事皆尘土，留取功名久远看”之句，分韵赋诗得“世”字》曰：“有山郁而孤，雄踞虎头势。”^⑯李昴英《重九游郁孤台和座客韵》曰：“壮哉千尺台，虎踞樵之西。枰中十万家，一目城市低。”^⑰聂子述《重建郁孤台上梁文》曰：“入境见图画，台观尤盛于郁孤。踞龟首之穹窿，映虎城之突兀。崆峒对耸，章贡交流。”^⑱文天祥《合江楼》曰：“天上名鹑尾，人间说虎头。”^⑲《虎头山》曰：“虎头山下路，挥泪忆虔州。”^⑳

董德元说虔州是“虎头城”，这是宋人的普遍看法，但他说虔州“非佳名”、“应杀虔之义”，则有失偏颇。据史料记载，赣南在西汉时属豫章郡，东汉时属庐陵郡，三国吴时才在当地设置了独立的行政机构庐陵南部都尉。西晋太康三年（282），改庐陵南部都尉为南康郡。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改南康郡为虔州。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改名的原因是“盖取虔化水为名也”。^㉑《太平寰宇记》考证得更为详细：“隋平陈，罢南康郡为虔州，而改县为虔化，以虔化水为名……虔化水源出吟山楼，抚州崇仁县北。在县北二百四十里，本名雩都水，入

雩都县界。”^②《鸡肋编》记载道：“虔州本汉赣县，属豫章郡。高祖六年（前201）置，使灌婴屯兵以扼尉它（指赵佗）。隋开皇九年，始曰虔州，以虔化水为名。”^③《方舆胜览》也说：“隋罢南康郡为虔州，以虔化水为名。”^④《明一统志》也记载道：“虔化水在宁都县境，旧虔州、虔化县皆以此为名。”^⑤可见，“虔州”名称的最初设置，并非如董德元所说“非佳名”、“应杀虔之义”，而是“虔化水”的缘故。

另外，因“赣水”名“赣县”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中书后省言“虔州本汉赣县，有贡水出自新乐山，至县郭东北与章水合流，名曰赣江。”《宋会要辑稿》的这段记载有其出处。南朝宋刘澄之提出：“（赣）县东南有章水，西有贡水，县治二水之间，二水合‘赣’字，因以名县焉。”^⑥唐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也提出：“贡水西南自南康县来，章水东南自雩都县来，二水至州北合而为一，通谓之赣水，因为县名。”^⑦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引述《图经》说道：“章贡二水合流为赣，其间置邑，因为赣县。”^⑧另据《章贡志》记载：贡水（又称贡江）即东江也，章水（又称章江）即西江也，两水之会为赣水（又称赣江）。^⑨苏轼《东坡居士过龙光，求大竹作肩舆，得两竿。南华珪首座，方受请为此山长老。乃留一偈院中，须其至，授之，以为他时语录中第一间》曰：“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⑩诗中提到的“西江”，就是指章水。

北宋欧阳忞不认同赣县因“赣水”而得名的说法，他在《舆地广记》一书中考证道：“有赣水，东源出雩都，曰湖汉水；西源出南野，曰彭水，二水皆北流，合于赣县，总为豫章水，北流入大江。后人因‘赣’字以湖汉水为‘贡水’，彭水为‘章水’。而刘澄之遂以为章、贡合流，因以名县，盖失之矣。”^⑪其实，北魏郦道元早在《水经注》中就指出了刘澄之的说法“是为谬也”，“刘氏专以字说水，而不知远失其实矣”。^⑫

西汉时，在赣南设置赣县、雩都和南野（又称南埜）3县，隶属豫章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赣（县），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雩都，湖汉水东至彭泽入江，行千九百八十

里。”“南野，彭水东入湖汉。”^⑬由此可知，郦道元和欧阳忞所言非虚。贡水在汉代叫湖汉水，章水叫彭水，两水合流叫豫章水。所以，赣县并非因“赣水”而得名。不过，豫章郡的设置可能是因为“豫章水”的缘故。据《水经注》记载：“《后汉》郡国志曰：‘赣有豫章水。’雷次宗云：‘似因此水为其地名，虽十川均流，而此源最远，故独受名焉。’”^⑭

刘光熙在《赣人说“赣”》一文中另辟蹊径，认为“赣州的东河是当年闽粤贡使北去中原朝贡的必经之路，‘贡水’便因此而得名……前秦时期，赣、贡二字本是音、意不分的通假字，贡江就是赣江，贡山便是赣山。这就是章贡两江合流后，为什么读‘gàn’不读‘zhāng’的缘由。综上所述，‘赣’字的读音，当先因水而事，再因事而名。”^⑮此说有点牵强。据《山海经》记载，“赣水出聂都东山，东北注江入彭泽西。”晋人郭璞对此解释道：“今赣水出南康（郡）南野县西北，音感。”^⑯“聂都东山”位于今天的崇义县，在赣南的西南部。这就说明晚至晋代，时人认为“赣水”的源头来自“章江”，而不是“贡江”。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山海经》中的“赣水”，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为实指，即“赣江”之意；其二为泛称，可理解为“赣地区的水”，类似于“瑞金的绵江”、“宁都的琴江”。结合《汉书·地理志》中“豫章水”、“湖汉水”和“彭水”的记载来看，《山海经》的“赣水”应为泛称，即作“赣地区的水”来理解。这样才能合理的解释“赣水出聂都东山”的观点，因为不管名称如何发生变化，赣江都是由章、贡两江汇流而成。

赣县得名的具体原因不详，很可能与“赣巨人”有关。据《山海经》记载“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唇蔽其面，因即逃也。”晋人郭璞在《山海经·枭阳国》中解释道：“《海内经》谓之‘赣巨人’。今交州、南康郡深山中皆有此物也。长丈许，脚跟反向，健走，被发，好笑；雌者能作汁，酒（酒）中人即病；土俗呼为山都。南康（郡）今有赣水，以有此人因以名水。”^⑰由此类推，因为先有“赣巨人”，因人名县，后有“赣县”的得名。

二、苏轼第一次游历赣南的时间

据孔凡礼《苏轼年谱》记载：苏轼“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八月）九日，评孔融（文举）、陶潜（渊明）诗”；“宿万安县造口”。⑩造口也叫皂口。据《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一《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调下笺注：“造口，在今江西万安县西南六十里，有皂口溪，水自此入赣江。皂口即造口也。”⑪

万安县造口离虔州城非常近，据《鸡肋编》记载：“吉州万安县至虔州，陆路二百六十里，由赣水经十八滩三百八十里，去虔州六十里始出赣石。”⑫另据《万安县志》记载：“赣州二百里，至岑县，又一百里至万安。其间滩有十八，旧皆属虔州。宋熙宁中，割地立县。”⑬为避免十八滩的危险江段，赣南还开辟了两条至吉安的线路。一条是由贡江通往赣江的水运航线。该条水运航线的大致路线是：人或货物沿贡江水系抵达兴国县永丰乡濠溪村的对陂头后，卸货陆行至兴国洙榜的社背口码头复登船，再顺江经赣县的鹭溪、吉安万安县的良口进入赣江。⑭另一条是由赣县储潭走陆路至万安造口。人或货物由虔州城乘船经赣江至赣县储潭卸货上岸后，陆行约三十里至吉州造口再登船，顺赣江而下至鄱阳湖。⑮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隆祐太后在吉州舍舟而陆，“以农夫肩舆而行”⑯至虔州，走的就是这条线路。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杨万里赴任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时，也是选择了该线路，“只言章贡近，犹自两三程”。⑰据许怀林考证：“杨万里自泰和出发，至万安走陆路，骑马上皂口驿，换轿过皂口岭，然后进入赣州地界。”⑱

苏轼由造口至虔州城，走的是水路。据苏轼《与黄元翁一首》记载：“某启。垂老投荒，众所鄙远，见孙提点言，独有存恤孤旅之意，感激不已。到治下当作陆行，必留数日欵（款）见也。”⑲另据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东坡至赣，留数日，将发舟，一夕江水大涨，赣石无一见，越日而至庐陵。”⑳结合以上两条记载可知，苏轼九月九日“宿万安县造口”，那么九月十日即可抵达虔州城。

苏轼离开虔州城至南安军的时间不详，大

致应在八月下旬。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八月二十三日苏轼与阳孝本同谒虔州祥符宫。之后，苏轼还游玩了马祖岩、崇庆院等名胜古迹。苏轼在《题虔州祥符宫乞籤》一文中写道：“绍圣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东坡居士南迁至虔，与王岩翁同谒祥符宫。”⑳文中提到的“王岩翁”，疑刊刻错误，应为“玉岩翁”，即阳孝本（字行先，号玉岩居士，1039~1112）。苏轼曾为阳孝本作《玉岩隐居阳行先真赞》，赞文为：“道不二，德不孤。无人所有，有人所无。世之所争者五，天啬其三，而畀其二。是以日计之不足，岁计之有余也。”⑳《泊宅编》也有相关记载：“阳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学博行高。东坡谪惠州，过而爱之，号曰玉岩居士，仍为作真赞。”⑳另据清同治《南安府志补正》记载：“阳孝本隐居赣县通天岩，林颜尝题其岩曰‘玉岩’。”⑳林颜，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任虔州知州，有《赋赠玉岩》⑳诗留传于世。赣州市通天岩现今仍保存有“林颜题诗”和“林颜赠玉岩诗”的摩崖题刻⑳，也可证明阳孝本为“玉岩翁”。

《苏轼年谱》记载：“离虔州，过上犹，传赋诗。”⑳据此，苏轼从虔州至南安军为陆行。途中，苏轼还在南康的田氏水阁拜访了田闢，并将当地的鸡笼山改名为独秀峰。⑳苏轼第一次在南安军逗留的时间很短（十天左右），并于九月初离开南安军过大庾岭至南雄州。南宋庄绰在《鸡肋编》中指出：“南雄州在大庾岭下才数十里，与江南未相远也。”⑳后来，苏轼又经南雄州过大庾岭至英州，并于“九月十二日，与子过同游寿圣寺”。⑳另外，苏轼所作的《过大庾岭》诗题于龙泉钟上，⑳这也从侧面论证了苏轼于九月初就离开了南安军。

总之，从绍圣元年（1094）八月十日至九月初，苏轼第一次游历赣南的时间为二十几天，不足一个月。而且，苏轼这次是在赴贬所途中，也不宜逗留较长时间。此次游历赣南，苏轼留有5首诗。据《苏轼诗集》收录，苏轼在虔州城所作的诗有4首，分别为《郁孤台》、《廉泉》、《尘外亭》和《天竺寺并引》；在南安军所作的诗为《过大庾岭》。

三、苏轼第二次游历赣南的时间

据《苏轼年谱》记载，建中靖国元年（1101）一月四日，苏轼“发南雄州，至大庾岭，抵龙光寺，留诗珪首座。赠岭上老人诗。”“至岭巅，次前所题龙泉钟韵，寓召用之望。过岭，作诗。”一月五日，“至南安，书《石钟山记》之末。”^④苏轼在《跋石钟山记后》中也写道：“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五日，自海南还，过南安，司法掾吴君示旧所作《石钟山记》，复书其末。”^⑤

大庾岭（又名梅岭）是南雄州与南安军的分界线，而大庾岭道则是两州交往的便利通道。据《舆地纪胜》记载，大庾岭上有梅关，“以分江、广之境”。^⑥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江西提刑蔡挺和广东转运使蔡抗相与协议，对大庾岭道进行修整。“以砖甃其道，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南北三十里，若行堂宇间，每数里置亭以憩客。”^⑦同时，又“课民植松夹道，以休行者”。^⑧南宋张九成《横浦集》中的记载更为详细：“宋嘉祐间，蔡挺提刑江西，其弟抗漕广东，乃商度工用陶土为甓，各甃其境。北路广八尺，长一百九丈，南路广一丈二尺，长三百十五丈，复夹道种松，以休行旅，遂成车马之途。”^⑨由此可知，苏轼第二次进入南安军是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一月四日。而苏轼离开南安军的时间不详，大致在1月下旬。据《苏轼年谱》记载：一月“下旬，抵虔州。”^⑩可见，由一月四日至一月下旬，苏轼第二次在南安军逗留的时间为二十天左右。

建中靖国元年（1101）一月下旬，苏轼抵虔州。因“须水度赣（指赣江）”，苏轼这次在虔州城逗留的时间比较长。苏轼在《与宋汉杰二首》的第一首中写道：“某只候水来即行矣。”^⑪又在《与朱行中十首》的第五首中写道：“某蒙庇粗遣，已达虔州，少留，须水度赣，更半月行也。”^⑫又在《与南华明老三首》的第二首中写道：“久留赣上待水，犹更旬浃。”^⑬又在《与钱济明十六首》的第十首中写道：“某已到虔州，二月十间方离此。”^⑭后在《答苏伯固四首》的第二首中写道：“某留虔州已四十日，虽得舟，犹在赣外。”^⑮不过，苏轼当时并未成行。据《苏轼年谱》记载：建中靖国元年（1101）

三月二十一日，苏轼还在虔州城“跋秦观《好事近》（山路雨添花），赠供奉官依沔。”^⑯苏轼在《书秦少游词后》中亦记载道：“供奉官依君沔居湖南，喜从迁客游，尤为吕元钧所称。又能诵少游事甚详，为余道此词，至流涕，乃录本使藏之。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二十一日。”^⑰

虽然苏轼离开虔州城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三月末。苏轼在《与朱行中十首》的第六首中写道：“某滞留赣上，以待春水至，此月末乃发。”^⑱在第十首中写道：“某已得两舟，尚在赣石之下，若月末不至，当乘小舟往就之。”^⑲三月末，苏轼与刘安世（字器之）一起启程北归。在启程北归前，苏轼与孙勣（字志举、志同）“为舟次执别”。^⑳执别前，苏轼曾在《与孙志同三首》的第一首中写道：“某启。衰朽困穷，故人不遗，远辱临访，旅泊两月，勤厚至矣。明旦决行，料公必欲追饯。”^㉑当行至吉州永和时，苏轼欲游清都观，刘安世遂解舟先行。苏轼后经吉州至南昌，并于“四月甲午（初四日），舣舟吴城山顺济龙王祠下”。^㉒可见，由一月下旬至三月末，苏轼第二次在虔州城逗留的时间为两个多月。

总之，建中靖国元年（1101）一月四日至三月下旬，苏轼第二次游历赣南的时间为二个多月，不足三个月。此次游历赣南，苏轼留有33首诗。据《苏轼诗集》收录，苏轼在南安军所作的诗有8首，分别为：《赠岭上老人》、《赠岭上梅》、《余昔过岭而南，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过而北，次前韵》、《过岭二首》、《北归度岭寄子由》、《雅安人日次旧韵二首》、《留题显圣寺》、《予初谪岭南，过田氏水阁，东南一峰，丰下锐上，俚人谓之鸡笼山，予更名独秀峰。今复过之，戏留一绝》；在虔州城所作的诗有25首，分别为：《郁孤台》、《虔守霍大夫、监郡许朝奉见和，复次前韵》、《赠虔州术士谢晋臣》、《虔州景德寺荣师湛然堂诗》、《次韵阳行先》、《乞数珠赠南禅湜老》、《再用数珠韵赠湜老》、《和犹子迟赠孙志举》、《南禅长老和诗不已，故作〈六虫篇〉答之》、《明日，南禅和诗不到，故重赋数珠篇以督之，二首》、《用前韵再和霍大夫》、《用前韵再和许朝奉》、《用前韵再和孙志举》、《崔文学甲携文见过，萧然有出尘之姿，问之，则孙介夫之甥也。故复用前韵，赋一篇，

示志举》、《画车二首》、《寄题潭州徐氏春晖亭》、《次韵江晦叔二首》、《次韵江晦叔兼呈器之》、《寒食与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和代器之》、《绝句》、《器之好谈禅，不喜游山，山中筭出，戏语器之可同参玉版长老，作此诗》、《王子直去岁送子由北归，往返百舍，今又相逢赣上，戏用旧韵，作诗留别》、《戏赠虔州慈云寺鉴老》、《虔州吕倚承事，年八十三，读书作诗不已，好收今古帖，贫甚，至食不足》。

四、小结

综上所述，苏轼一生曾两次途经赣南，第一次是在绍圣元年，第二次是在建中靖国元年。苏轼第一次游历赣南，是从八月十日至九月初，时间为二十几天，不足一个月。苏轼第二次游历赣南，是从一月四日至三月末，时间为二个多月，不足三个月。总之，苏轼两次游历赣南的时间总共为三个多月，不超过四个月。

苏轼两次游历赣南，虽然时间短暂（不足四个月），但上至官僚名流，下至乡贤士绅，他都有所交往。在携游唱酬中，苏轼游览赣南的美景佳胜，题诗寄慨，遗留38首诗。苏轼第一次游历赣南时，因是赴贬所途中，行色匆匆，留有5首诗。苏轼第二次游历赣南时，因是在虔州城“须水度赣”，作诗较多，留有33首诗。林晓平在《苏东坡与赣南客家文化》一文中则提出：“在两次途经并逗留赣南期间，苏轼以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热情，参观了赣南的许多山川胜景、文物古迹，访问了一些赣南客家名士，并挥毫写下了近百篇诗、词、赞、记等。”^③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816页《苏轼传》，第10817页《苏轼传》，第10160页《杨允恭传》，第2094、2189~2091页《地理志一》、《地理志四》，第574~577页《高宗本纪》，第8636页《哲宗昭慈圣献孟皇后传》，第10575页《蔡挺传》。

^⑦ 林语堂著、张振玉译《苏东坡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页。

^⑧ 《太平寰宇记》和《舆地纪胜》作高珪，《方舆胜览》和《古今图书集成》作高琰。

^{⑨⑩} 乐史撰《宋本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卷一百八《江南西道六·虔州》，第158页，第162页，第159页。

^⑪ 赣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赣州

市况》，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第2页。

^⑫ 江西省赣州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江西省赣州市地名志》，1988年版，第418页。

^⑬ 何薳撰、张明华点校《春渚纪闻》，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2页。

^{⑭⑮} 林晓平《苏东坡与赣南客家文化》，《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⑯ 赣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赣州》（赣州文史·8），1994年版，第211页。

^⑰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418页《方域六》之二五至二六。

^{⑱⑲}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75页第六册卷三四一，第8725页第一三册卷七四八。

^{⑲⑳⑳⑳}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38~2439页，第2423~2424页，第2053页转引自《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注，第2428页《予初谪岭南……戏留一绝》，第2057页转引自《过大庾岭》注，第2056~2057页。

^㉑ 赣州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同治《赣州府志》，1986年重印本，第2238页卷七十四《艺文志·诗词附》。

^㉒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837页第六二册卷三二五六。

^㉓ 转引自刘埙撰《隐居通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35页。

^{㉔㉕} 文天祥著《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34页，第384页。

^{㉖㉗}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2页、第673页。

^{㉘㉙} 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6、105、107页。

^{㉚㉛} 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53页卷二十《江西路·赣州》。

^{㉕㉖} 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五十八《赣州府·山川》。

^{㉗㉘㉙} 郦道元撰《水经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三十九《赣水》。

^{㉚㉛} 王象之撰《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417~1418页卷三十二《江南西路·赣州·景物上》，第1538页卷三十六《江南西路·南安军·景物上》。

^{㉕㉖㉗} 欧阳忞著，李勇先、王小红校注《舆地广记》，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19页。

^{㉘㉙㉚}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93页卷二十八《地理志·八》。

^{㉛㉕㉖} 刘光照著《赣州客家人文探微》，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第18页，第18、20页。

^{㉗㉘㉙㉚} 郭璞撰《山海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十三《海内东经》，卷十《海内南经》、卷十八《海内经》。

（下转第49页）

苏轼官职漫谈（下）

赖正和

内容提要 本文以苏轼一生所担任的官职为主线，以漫谈的形式，对苏轼历任官职的性质、职能、源流和相关的社会形势等方面进行了考察。

关键词 苏轼 官职 漫谈

二十一

元祐元年（1086）九月十二日，苏轼被提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

翰林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汉文学家扬雄的《长杨赋》中，李善解释为“文翰之多若林也”。

最早设立翰林院的是唐玄宗，他把为宫廷服务的各类人才安置其中。后来他从翰林院分出学士院，把长于诗文的学者集中到学士院里，称他们为翰林学士，叫他们做皇帝的文学侍从，备顾问，拟文稿，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地位很高。但当时的翰林学士并不是正式官职，他们既无办公的官署，又无固定的俸禄。中唐以后，翰林学士被加上知制诰头衔，取得为皇帝起草各种诏令的资格，才算是实官。

宋代，把翰林院和学士院合并为翰林学士院，与三省和枢密院并列，地位很高，翰林学士也成为正三品实官。

朝廷任命苏轼为翰林学士的时候，苏轼接连向皇帝和太皇太后上了《辞免翰林学士第一状》和《辞免翰林学士第二状》。他在第一状中说，不是高才、重德、雅望者不能选作翰林学士，而自己在这三方面都不及他人，希望皇帝和太皇太后收回诰命。他在第二状中又说，他不能接受翰林学士的任命，不光是因为自己学问荒唐，文词鄙浅，还因为有功劳的旧臣尚多，他不能后来居上，加之他和兄弟苏辙同被重用①，有连带起用之嫌。所以，他不能接受诰命。后来，皇帝和太皇太后派人直接召他进翰林学士院，他才不得不接受。

苏轼担任翰林学士，从正四品提升为正三品。

苏轼任起居舍人时，穿着绿色官服在延和殿侍奉皇帝②，皇帝当即赐予绯色官服。现在他进入翰林学士院，皇帝特赐紫色三品官服两套，金腰带一条，金镀银鞍辔马一匹。可见，在宋代，翰林学士的地位、声望都非常之高。

二十二

知制诰的知，依然是主持的意思；制，是帝王的命令；诰，是帝王授官、封赠的命令。制和诰连起来，意义不变，指帝王的诏令。知制诰的职责，就是负责撰拟皇帝的诏令。

知制诰这个官称始于唐代，宋代沿置。

前面说过，为皇帝起草诏命的是中书舍人，但常常以其他官员代行中书舍人的职责，称“某官知制诰”，如“礼部郎中知制诰”等。翰林学士中实际担负起草诏令者，则称“翰林学士知制诰”。

中书舍人、某官知制诰和翰林学士知制诰都为皇帝起草诏令，那么有没有分工呢？当然有。

首先他们有内外之别——中书舍人和某官知制诰及其所掌之诏令称外制；翰林学士知制诰及其所掌之诏令称内制。外制和内制合称两制。从内、外两字来看，可知翰林学士知制诰常在宫内干活，接触皇帝的时候更多些，所撰写的诏令是皇帝的直接意思，也由宫内直接发出。

其次，中书舍人和某官知制诰所撰拟的是中书门下正规机构的诏令；翰林学士知制诰撰拟的是皇帝临时发出的特殊诏令。由此可以窥知，中书舍人和某官知制诰偏重于为中央政权工作，翰林学士知制诰偏重于直接为皇帝服务。

二十三

元祐二年（1087，苏轼52岁）八月一日，苏轼受命兼任侍读。

侍读不是伴读。旧时代，幼年的皇帝或富贵之家的子弟读书，觉得孤单，于是找人陪伴着读书，这叫伴读。侍读则专指教帝王读书论学的官员，也就是帝王的老师。

开元三年（715）七月，唐明皇下诏书说：“每读史籍有阙，宜选耆儒博硕一人，每日侍读。”于是，马怀素等人轮流入宫侍读。这就是侍读之始。

开元十三年（725），唐王朝正式设置集贤院侍讲学士与侍读直学士，其职责是讨论文史，整理经籍，备皇帝顾问。

宋代，在真宗咸平二年（999），就正式设置翰林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以后沿置。

苏轼得知要兼任侍读学士，便上了《辞免侍读状》，说，入侍迩英殿（皇帝读书的地方），责任重大，不光是要帮助皇帝学习章句，更要紧的是随时做皇帝顾问。我学术浅陋，不是当侍读的料。希望皇帝和太皇太后追回新命，任用能者。皇帝和太皇太后当然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他在答谢书中说，我任知制诰，已有儒者的极高荣誉，现在又让我兼任侍读，置身于侍臣的最高位。我想我确实与之不相称，惭愧得汗水直流。他表示要鞠躬尽瘁，当好侍读。

据史料记载，苏轼给哲宗小皇帝讲治乱兴衰、邪正得失，都要反复开导，希望皇帝有所觉悟。皇帝虽然恭默不语，但总是点头，于是苏轼非常高兴。有一天，皇帝宴请苏轼，又赐予御书诗一首。苏轼为此专门上了谢表，在称赞皇帝一番之后，表示要把御书诗刻在石头上，让更多的人欣赏，要把原件留给子孙，让子孙世世忠于王朝。由此看，这时苏轼与哲宗的关系还挺不错的。但是，哲宗亲政以后，却叫苏轼吃尽了苦头。

二十四

就在受命担任侍读的当月二十二日，苏轼又受命担任实录院修撰。同时受命担任实录院修撰的还有吏部尚书苏颂和兵部侍郎赵彥若。这个职务，应该是他们的兼职。以尚书、侍郎这样的高官来兼，可见实录院修撰非同小可。

宋代比较重视修史。实录是记载一朝皇帝功过政绩的“编年附传”的实录体史书。比如仁宗皇帝有《仁宗实录》，英宗皇帝有《英宗实录》。实录院就是担负编纂这种史书的专门机构。一般是下一朝编纂上一朝皇帝的实录，编纂好后，实录院就不再继续设置，所以实录院的官员大多是兼职的。

编纂实录的资料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其

一，这个皇帝在位期间的全部诏令、大臣的奏疏；其二，经初步整理过的初级史书《起居注》和《时政记》以及二级史书《日历》（由门下省编纂的史书）；其三，各地的地方志、墓志、行状等。所以，修撰实录是件庞杂的工作。

苏轼参与修撰的实录，是《神宗实录》。《神宗实录》从元祐元年（1086）开始编纂，至元祐六年（1091）基本成书，可元祐七年还在继续修补。其间多人参与修撰。两宋共有翰林学士358人，参加过修史的只有80人，占总人数的22.5%。苏轼就是其中之一。

苏轼参与修撰的《神宗实录》，在哲宗亲政后的绍圣年间又重修，对原书内容“多所增损，务要附会一时绍圣议论，深诋元祐史官之非。其间语言无不过当失实”。

元祐六年（1091），苏轼在担任翰林学士承旨期间，还兼任过提举黄本。黄本指国史，是由官方在《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等史书基础上撰写的国家正史。因系用雌黄书写，故有黄本之称。提举，意为主管专门事务。提举黄本，就是主管国史修撰工作。

二十五

元祐三年（1088，苏轼53岁）正月十七日，朝廷命苏轼权知贡举。

贡，即贡士。贡士，指古代诸侯向天子举荐人才，也指被举荐的人。举，就是举荐。贡举，就是地方官向君主举荐人才。

《礼记·射义》：“诸侯岁献，贡士与天子。”这表明周代是由下向上举荐人才的。汉代仍然如此，取名叫“察举”。魏文帝将察举制度化，制定了“九品中正制”，由朝廷派员到地方上考察、选拔人才。这就把由下向上举荐人才变成了由上到下选拔人才。隋文帝则实行科举取士的制度，让读书人可以公平竞争。科举，就是由朝廷设置各种考试科目，定期举行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录取授官。从此，科举制度沿用了一千三百年。尽管选拔人才的方式方法改变了，但是人们依然把它叫做贡举，也没有把知贡举叫做知科举。

苏轼知贡举，就是主持元祐三年的科举考试。在宋代，一般是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所以，知贡举是朝廷临时委派的官职，这届科举考试结束，知贡举就交差。担任知贡举的官员，都是当时文坛上的顶尖人物。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的那次科举考试，知贡举的就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

按规定，参与科举考试工作的所有官员，

从接受任务到录取放榜的几十天，都要锁入贡院，不准回家，不准与贡院外面的任何人接触、联系。目的是要防止徇私舞弊。正月二十一日，苏轼就进入贡院，三月中旬省试（指礼部考试，即苏轼主持的这次考试）放榜后，他才走出贡院。

这次考试前，数千里大雪，道路艰塞，到京的考生不到三分之二。苏轼认为，如果按时考试，那些孤寒的考生将失去这次考试机会，便请求朝廷将考试时间推迟半月。

考试的时候，为防作弊，考场门口设有监门官，考场里派有巡铺官监察考场。巡铺官郑永崇指认两个考生作弊，将两个考生押出考场。经苏轼派人核查，郑永崇指认不当。苏轼便请求朝廷调走郑永崇等人。有巡铺官发现作弊的考生，按规定把考生押出考场，可巡铺官陈慥指挥三五十名兵士齐声唱叫，使在院官吏公人无不惊骇，使在场考生无不恐惧。苏轼认为陈慥的做法摧辱考生，伤动士心，损坏国体，也请求朝廷处理。

由此看来，苏轼非常关怀、爱护考生。

二十六

元祐四年（1089，苏轼54岁）三月，因苏轼数次请求离开中央去做地方官，朝廷便任命他为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

龙图阁是宋真宗为纪念父亲宋太宗，于咸平（998~1003）初年专门修建的宫殿，用以收藏太宗的御书、御制文集和各种典籍、图画、宝瑞之物。有了龙图阁，就要配置相应的官员，于是就有龙图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不过，在宋代，什么阁什么殿的学士、直学士、待制，都没有具体的职掌，就是说不具体掌管什么事，而是皇帝的侍从，备皇帝顾问。而且都是荣誉性职衔，常常用来给大臣加官，表示皇帝给予恩宠，使大臣增加荣誉，厚重身价。元丰改革官制后，龙图阁学士就作为皇帝侍从官补外（去做地方官）的加恩之官。所以，这次苏轼去杭州做官，朝廷就给他加了龙图阁学士职衔。

元祐七年（1092，苏轼五十七岁）十一月二十三日，朝廷给苏轼加端明殿学士职衔。端明殿学士与龙图阁学士同属荣誉性职衔，但它们又有不同之处。

在北宋，有观文殿、资正殿、端明殿、保和殿，有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这些殿、阁，都可以配置学士、直学

士，他们也都没有具体职掌。不过，殿学士资望极高，实为宰相、执政官离任外调所带职衔；而阁学士在元丰改制后是侍从官补外的加官。显然，殿学士比阁学士要高级一些。

殿、阁学士都是荣誉性加官职衔，而翰林学士则是实职。这是两者不同之处。

苏轼一生最荣耀的职衔就是端明殿学士。所以，苏辙为他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特地把“端明”二字加了进去。

二十七

前面说过，路是北宋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至道三年（997），宋太宗把全国划分为十五路；仁宗初年，全国分为十八路；元丰八年（1085）全国再分为二十三路。原先的两浙路也就分为东路和西路。两浙西路含杭州、嘉兴等八个府、州、军，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省北部。两浙东路含绍兴、衢州等七个府、州，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省南部。

从字面上看就知道，兵马钤辖是军事系统的官职。

北宋建立后，为革五季之患，夺取了诸镇节度使所掌兵权，分命文臣出守各郡，号为“权知军州事”，兵、民之政都归其总理。因此，在一些重要之郡，命文臣带本路兵马钤辖；次要之郡，命文臣带本路兵马都监。杭州当然是重要之郡，所以知杭州军州事的苏轼，自然就带两浙西路兵马钤辖。

钤辖，本意为管束。兵马钤辖的职责，就是管束本路兵马，组织军人搞好防卫、屯戍、警捕、营房守御等。当然，这些并不是兵马钤辖一个人的事——担任副钤辖的武官及下属军事官员，要做大量的实际工作。兵马钤辖仅是知州的兼职。苏轼的兵马钤辖前面的“充”字，以及上文用到的“带”字，就是兼职的意思。不过，充还含有特派之意。

苏轼在知杭州的两年中，给朝廷上了二十一份奏状，罢任后又以前知杭州的名义上了两份奏状。在这二十三份奏状中，他仅在《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上署了两浙西路兵马钤辖这个官职。这，有点耐人寻味。

二十八

元祐六年（1091，苏轼56岁）正月二十六日，朝廷任命苏轼为吏部尚书。吏部尚书属从二品。

东汉时始置吏曹（曹，古代分科办事的官

署)，魏晋以后改称吏部，隋唐时列为尚书省所辖六部之首，其长官也比其他五部长官的地位高些。吏部掌文官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勋封等事务。唐代前期，吏部还主持科举考试。因当时科举考试在吏部举行，故称省试。开元二十四年（736），科举考试转给礼部管辖，仍称省试。吏部下辖四个司：吏部司（吏部四司中的头司）、司封司、司勋司、考功司。吏部的长官叫吏部尚书，主持吏部政务，副长官称侍郎。宋朝皇帝另设审官院（主管中下级文官的考课、选派）等机构，有意分割吏部的职权。元丰改革官制，才把分割出去的权力收归吏部。

尚书一词，出现于战国时期。尚，就是掌。尚书，就是掌书。秦朝就设尚书一职，掌殿内外文书。汉武帝设尚书五人，分官署办事，主掌文书奏章。东汉进而设尚书台，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变成事实上的行政中枢机构。隋代改尚书台为尚书省，下分六部，分掌政务。尚书一词就这样一步步演变而来，同时也成为六部长官之称。

委任苏轼为吏部尚书的告命还没有到达苏轼手中，朝廷又让苏轼改任他官。

二十九

苏轼还没有罢杭州任，朝廷又于二月初四日，改命苏轼为翰林学士承旨。

为什么不到十天，朝廷又更改了苏轼的任命呢？这是因为这时候任命苏辙为守尚书右丞（副丞相），是执政之一，为了回避亲嫌，不得不让苏轼离开吏部，再去当皇帝的侍从官。为此，苏辙上《辞尚书右丞札子四首》。他在第二首札子中说，自己的艺业能够成立，是靠兄轼之力，先前我与兄轼同列侍从，已有愧于心，今又超迁为执政，使自外召还的兄轼不能担任吏部尚书，而改任翰林学士承旨。兄轼之为人、文学和政事都远远超过我，我请求取消我的这个任命。可是，皇帝和太皇太后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唐肃宗时，从翰林学士中选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独当密命。唐宪宗就正式设置翰林学士承旨一职，为翰林学士的首领。从此，翰林学士承旨不再单纯起草诏命，而是在禁中职掌机密，故被称为“内相”。

宋代翰林学士承旨的职权不如唐代翰林学士承旨的职权大，但仍然是翰林学士院的主官，别称“翰长”，仍然是从翰林学士中选择年深德高者出任。但不常设。

苏轼出知杭州前就多次请求外任，这次要

他回朝任职，他是大大的不愿意。

他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一连上了三封《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状》和一封《杭州召还乞郡状》。可是，皇帝和太皇太后不允许。结果拖到五月二十九日，他才接受翰林学士承旨的告命；六月初一才进翰林学士院上班。

这时的翰林学士承旨，属从二品。

六月初四，苏轼又受命兼侍读。

三十

元祐六年（1091）八月初五日，朝廷任命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军州事。颍州即今安徽阜阳。

元祐七年（1092，苏轼57岁）二月，朝廷任命苏轼为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州事。淮南东路含扬州、泰州等十个州、两个军、三十八个县。扬州，即今江苏扬州。

同年八月二十二日，朝廷任命苏轼为龙图阁学士、守兵部尚书、兼侍读、差充南郊卤簿使。

兵部尚书是兵部的长官。

有的作品说苏轼担任兵部尚书，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还写苏轼指挥军队打了大胜仗。这是作者不了解宋代兵部是怎么样的机构，也不了解兵部尚书有多大的职权，而按自己的想象来写的。

因为宋朝是后周武臣赵匡胤夺取后周天下而建立的，所以宋朝皇帝老是提防着大臣仿效赵匡胤，因而采取各种措施分割大臣的权力。在军事方面，宋朝皇帝把唐和五代出纳帝命的枢密院，改为与中书省并称为“两府”的中央军事机关，掌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掌管中下级将官的调配和禁兵的招募、阅试、选补、屯戍、赏罚等等事务，其他军国大事也由枢密院禀奏皇帝处理。因此，兵部失去了原有的好些职能，只掌管兵卫、武选、车辇、甲械、厩牧之政令，掌管天下郡县地图、卤簿、民兵、弓手、厢军、蕃兵、校试武艺等等事宜。由此可见，兵部主要掌管军事后勤和非正规军（禁兵）方面的事务。兵部下设四司：兵部（兵部四司中的头司）、职方（主管地图）、驾部和库部。

由兵部的职能可知兵部尚书的职权。

须注意，苏轼的兵部尚书是带守字的。元丰改革官制时规定，凡官员的寄禄官低于职事官一品者，带守字。

兵部尚书属从二品。

三十一

南郊卤簿使这个官称中的南郊，不是指城市南面的郊区，而是指皇家的重大祭祀活动。

我国古代长期处于农耕社会，人民的生活、国家的财政都基本上靠农业收成。农业收成好不好，一看土地肥沃不肥沃，二看是否风调雨顺，三看农民是否勤劳耕种。为了得到好收成，人们总是祈求皇天后土保佑，连皇帝也不例外。所以，自远古起，帝王就有祭祀天地的规矩（当然帝王还有其他的祈求）。到了宋代，皇帝每三年到南郊举行一次祭天活动。所以这个官称中的“南郊”，是指皇帝的祭天活动。

卤簿一词，一般解释为皇帝出行的仪仗队，其实不止于此。卤在古代是大盾的意思，大盾起防护、保卫作用；簿就是册簿。卤簿，指规定防护、保卫、仪仗诸事项的典籍。卤簿并非帝王专有，按唐制，后、妃、太子、王公及四品以上官员都有卤簿，不过规模、等级不一样。

掌管卤簿是兵部的职责之一。在南郊祭天时任兵部尚书的官员，就要兼任南郊卤簿使。元祐七年皇帝要去南郊祭天，朝廷就命苏轼守兵部尚书、差充南郊卤簿使。差充，含有特派之意。南郊卤簿使实际上是南郊祭祀活动的总指挥，但属于临时差遣，祭祀活动结束就下课。

宋代的卤簿分四等，皇帝南郊祭天所用的是第一等卤簿。从纪实性很强的《宋大驾卤簿图》来看，南郊卤簿实是皇家威严的展示。该图所画官兵 5481 人，车辇 61 乘，马 2873 匹，牛 36 头，大象 6 只，乐器 1701 件，兵仗 1548 件，各种旗幡数百面。这么多人、车、马、牛、象，在皇家的装饰华丽的大型车辇前后，按预先规定的路线、位置、距离有序地行进。行进中的每一组（或排）官兵穿着同样的战衣、背着相同规格的弩机（或相同规格的其他兵器）、骑着同一种颜色的马，整齐划一，步伐有致，令观者无不震撼。

担任南郊卤簿使的苏轼在元祐七年的十一月中旬，组织、指挥了这么宏大而又复杂的南郊祭天活动，可给他训练、排演几千官兵、几千马匹和近两千人乐队的时间，却只有两个月。苏轼真的具有超凡的指挥天才。

三十二

元祐七年（1092）十一月二十三日，苏轼请求去越州工作，皇帝和太皇太后却任命他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

礼部尚书也是从二品。

元祐八年（1093，苏轼 58 岁）六月二十六日，诏命苏轼知定州军州事。苏轼于翌年四月在《北岳祈雨祝文》中自署职衔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定州路③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事及管内劝农使④、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

定州，即今河北定州。定州路含定州、深州、祁州等八个州。当年定州北面就是契丹，定州实为北宋的屏障。皇帝曾答复苏轼说，“中山巨屏，实难其帅”（中山即定州），朕是想借卿（指苏轼）之重来守它。

北宋皇帝害怕地方大员独掌大权、割据一方，因此不在路这级设置总揽全权的官署和官员，而设置几个互不统率的机构分担路这级的政务——转运使司主管财赋、漕运；提点刑狱司主管刑狱；提举常平司主管粮仓、役法、水利等；安抚使司（俗称帅司）主管兵政。这四个司不仅并立，甚至其官署也不驻同一个地方。

安抚使是安抚使司的长官。唐代被派去巡视经受战乱、天灾的地区以安定社会的大臣，称安抚使。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始于一些地区设置安抚使或经略安抚使。以后又在河北、陕西、两广等路常设安抚使司。安抚使掌管一路的兵、民之政，权力很大。

北宋在路这一级设置了两个军事统率机构，一叫马步军都总管司，其长官称马步军都总管；二叫兵马钤辖司，其长官就是苏轼知杭州时兼任过的兵马钤辖。这两个司的职能没有多大区别，平时互不统辖，战时前者“节制”后者，故马步军都总管的地位比兵马钤辖要高些。

按北宋的规矩，定州、瀛州、大名府、京兆府的知州、知府都要兼任所在路的安抚使和马步军都总管。所以，苏轼的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是按规矩兼任的。

三十三

劝农使的劝，是鼓励的意思。

中国长期以农业为社会主业。远在秦代，就设有劝农之官。汉代则置大农丞十三人，分赴各郡鼓励农桑。这些劝农官员在农事季节便巡行于乡间，宣讲官方的农桑政策，鼓励、督促农户耕种和栽桑养蚕。西晋的文学家束晳还曾写过一篇《劝农赋》曰：“惟百里之置吏，各区别而异曹；考治民之贱职，美莫乎于劝农。”可以说，各朝各代都曾设置劝农之官。

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时，曾派新进官员

充任劝农使，到全国各地视察农田、水利、赋税、劳役，名为劝农，实是扰民。苏轼在通判杭州时，就曾写诗批评这种做法。他在《山村五绝》之二写道：“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令黄犊⑤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在《鸦种麦行》写道：“农夫罗拜鸦飞起，劝农使者来行水。”⑥这些诗句，都是批评当时劝农使扰民的。他认为，只要农业政策对头，农民自会发挥耕种的积极性，何须派劝农使去扰民呢！

北宋王朝规定，各路转运使、副使和州、府长官，都要兼任劝农使。所以，苏轼是按规定兼任本辖区（即管内）劝农使的。

三十四

赐紫金鱼袋是动宾词组——赐，是赐予；紫，指紫色官服；金鱼袋，是高级官员的佩饰物。

苏轼这时的寄禄官仍然是左朝奉郎，属正六品。按这个品级，他只能穿绯色官服。但他任翰林学士已是正三品，任礼部尚书已是从二品。所以，皇帝赐他穿紫色官服，这就是赐紫。元祐时期，皇帝多次特赐他衣一对、金腰带一条、金镀银鞍辔马一匹。这时候赐给他的衣，就是紫色官服。

下面主要说一说金鱼袋。

唐初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必须随身佩带鱼符。鱼符有符契的作用，也是一种高贵的装饰物。其质地分玉、金、铜——太子佩带玉鱼符，亲王佩带金鱼符，庶官佩带铜鱼符。鱼符都要装在小袋子里，这小袋子叫鱼袋。三品以上佩带的鱼袋用金加以装饰，叫金鱼袋；四、五品佩带的鱼袋用银加以装饰，叫银鱼袋。由此可知，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官服、佩带金鱼袋，四、五品官员穿绯色官服、佩带银鱼袋。

宋代保持唐代的做法，也让高级官员佩带鱼袋。不过，鱼袋里不再放鱼符了（据说填入木桩），鱼袋仅成为官员身份的一种标志。同时还把品级放宽了一点——四品以上官员都佩带金鱼袋（元丰改革官制后，四品以上官员都穿紫色官服，与金鱼袋匹配），五、六品官员都佩带银鱼袋（元丰改革官制后，五、六品官员都穿绯色官服，与银鱼袋匹配）。

由此可知，赐紫金鱼袋不是正而八经的官称，官员们习惯把它放进职衔中，以示荣耀而已，苏轼也不例外。

三十五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苏轼59岁）四月十一日，朝廷决定罢免苏轼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的职衔，保留左朝奉郎，改知英州（今广东英德）。因此，苏轼就要从北宋领土大陆的最北边赶往最南边。刚过了两天，即同月十三日，朝廷又把苏轼的寄禄官降为左承议郎。左承议郎比左朝奉郎降低一个品级。

苏轼还在赴英州途中，朝廷于六月初五又诏令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⑦、惠州（今广东惠州）安置。这个诏令是林希遵照宰相章惇的旨意撰写的，言辞非常刻毒：“元丰间，有司奏轼罪恶甚众，论法当死……忘国大恩，敢以怨报。若讥朕过失，何所不容；仍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今言者谓轼指斥宗庙，罪大罚轻。国有常刑，非朕可赦。宥尔万死，窜之遐服。虽轼辩足惑众，文足饰非，自绝君亲，又将奚怒。保尔余息，毋重后悔。”说去说来，无非还是乌台诗案强加给苏轼的那些罪名。

宁远军是与州同级的行政区，属军事要地，其治所在容州（今广西容县）。

节度使在唐代是一方大员，掌一方之军、政、财权。北宋的节度使则无职掌，可以说是一种虚衔。至于节度副使，在元丰改革官制后，与防御副使、团练副使、行军司马、州别驾等九种官称一起，列为闲散不管事的官职，被称为散官（此散官与元丰以前的散官概念完全不同）。像苏轼这样被贬降的节度副使，比一般的节度副使更惨——他从正三品一下子降到从八品（节度副使属从八品），等于从天上跌到了地下，摔得很惨；他这个节度副使不仅不管事，还被明确规定不得签书公事；他不能任意择地居住，而被放到广东惠州看管起来；他不能领取节度副使的全额俸禄，而只能领取一半。

三十六

绍圣四年（1097，苏轼62岁）闰二月十九日，朝廷诏令苏轼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

琼州即今海南海口。昌化军是与州同级的行政区，熙宁六年之前就叫儋州（即今海南儋州）。朝廷贬降苏轼为琼州别驾，却把他放到儋州去看管起来。

汉代就有别驾这个官职，是州长官刺史的佐官。因其地位较高，出巡的时候不与刺史同

乘一车，而要另乘一车，故名别驾。魏晋南北朝各代，均置别驾，在州府中总理众务，所以有人说，别驾之任“居刺史之半”。隋代改别驾为长史。唐代时而称别驾，时而称长史。宋代设置通判，通判的地位类似于别驾，后世便以别驾习称通判。那么，宋代有没有正式的别驾这个官职呢？有。不过，已不再像汉、晋时候那么有职有权。甚至在元丰改革官制后，别驾被纳入散官之列。苏轼因是罪臣而被贬降为别驾的，又比一般别驾的地位低许多。

州别驾属正九品。苏轼从节度副使贬降为州别驾，又降了一个品级。

移昌化军安置的移字不容忽视。移，表明是从限制居住的甲地转移到限制居住的乙地。在古代，改变罪人、罪臣的居住地，常用移或量移。移或量移与迁徙，虽然都是改变居住地，但被移或量移者不是自由之身，而迁徙者一般都是自由之身。当年苏轼贬谪黄州，是御史台派人押着他去的；这次贬谪儋州，他接到告命的第三天，就与从宜兴奔来才团聚两个多月的儿孙们诀别启程。这表明沦为罪臣的苏轼，是没有人身自由的。

三十七

元符三年（1100，苏轼65岁）二月，苏轼恩移廉州安置。廉州即今广西合浦。

这年正月十二日，哲宗皇帝死了，宋徽宗即位，赦天下，因此苏轼被恩移廉州安置。廉州在大陆，没有儋州那么苦寒。宋徽宗这时没有变动苏轼的官职，仅仅把苏轼从儋州移到廉州，这也要称恩移。

同年八月下旬，苏轼得到授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的告命。舒州即今安徽安庆；永州即今湖南零陵。苏轼的官职升了一个品级，限制居住地的条件也更好一些。

同年十月月初一，朝廷授苏轼为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州军任便居住。苏轼由此重新获得朝奉郎这个寄禄官称，表明朝廷会重新按朝奉郎品级给他发放俸禄；提举成都府玉局观是挂名的职衔，并不要他去成都府玉局观上班；朝廷更不再把他置于限定的居住地加以看管了。

提举某某宫观属于祠禄官。祠禄官是宋代专为年老不能担任实职或因其他原因不能、不宜执掌军政事务的官员设置的。朝廷对于这类官员，“罢之伤恩，留之不宜”，于是就安排他们为祠禄官，让他们依旧领取奉禄，而又不让他们管事。有一点须注意：祠禄官还不算退休，

只能算“靠边站”。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66岁）夏秋之间，苏轼病重，上表请老，才以本官致仕。致仕，才是退休。

成都府玉局观是位于成都城南柳堤的道教观（一说是在成都城北柳堤，二十世纪中叶尚存），传说是俗称张仙的张道陵得道之地。入宋以后，民间有祭祀张仙能得子的迷信说法。苏洵二十二岁时（1030），于重阳节游成都府玉局观，用玉环换得一张张仙画像回家，敬香几年，果得轼、辙二子。如今已过去整整七十年，朝廷却叫苏轼提举玉局观，而这又是苏轼一生最后的官职。所以有人说苏轼的人生从玉局观始，至玉局观终。

元丰末年（1085），苏轼作《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观将老焉》，有诗句“莫欺老病未归身，玉局他年第几人。”这时，苏轼肯定不知道他会是提举成都府玉局观的第几人。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作《过岭二首》，其一有诗句“剑关西望七千里，乘兴真为玉局游”。他这是渴望回到家乡蜀地重游玉局观，谁知他至死也就挂了个提举成都府玉局观的虚名。

三十八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说：苏轼“封武功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

武功县开国伯是爵位称号。爵位是古代帝王分等级授予贵族和高官的与食禄相关的称号。在周代，就有爵号公、侯、伯、子、男。随后各代都有爵号，但名称、等级不断变化。到了宋代，爵号从高到低有以下十二种：王、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苏轼是开国伯，虽不在公、侯之列，但也算不错了，因为只有贵族和高官才能获得爵位。

爵号中的开国二字，带有尊宠之意，用以表示是给有功之臣新封赐的爵号，不是承袭先人的爵号。

古代帝王规定各等爵位享有大小不等的食邑。食邑就是有爵位者的世禄封地。食邑大小不等，其人户也就有多有少。帝王封给食邑时，也规定了各等爵位各应收取多少人户的租税。但到后来，规定的户数往往不能兑现，所以就有名义上封多少户（表示地位）、而实封多少户的做法。比如，唐末的郡王，按规定其食邑是五千户，却只封给八百户，而实封只有二百户。这就是说，该有五千户食邑的郡王，到头来只是名义上封给他八百户，而实际上他只能收取二百户的租税。

以前，受封爵位者派人去食邑直接收取租税；后来改由政府征收租税，由政府发给他适量的丝绢。到了宋代，连实封也跟画饼差不多。据南宋人赵升记载，“旧制每实封一户，随月俸给二十五文。”可见在宋代，原先的食邑制度已不复存在了。

苏辙只说苏轼食邑九百户（这是开国伯应有的食邑户数），却没有提实封的户数。这就意味着苏轼的食邑完全是虚的，只表示他拥有过的这样的爵位。

既然苏轼的食邑是虚的，武功县就仅仅是按惯例加在爵号前的地名而已。

注释

① 元丰八年（1085）八月，朝廷任命苏辙为秘书省校书郎，元祐元年（1086）八月，苏辙权中书舍人。

② 《苏轼诗集》卷二十六《诰案》说，已是起居舍人（从六品）的苏轼还穿着绿色官服（七品官服）在延和殿侍奉皇帝，与所任官品不符，“必别有因依，今则不可尽通其故矣”。

^③ 《苏轼诗集》卷三十六、三十七《诰案》均记为“河北西路”。

④ 查各种版本的《北岳祈雨祝文》，都署为“知定州军州及管内劝农使”，而孔凡礼《苏轼年谱》第1122页记为“知定州军州及管内劝农事”。

⑤ 汉代渤海太守龚遂在劝耕路上遇见佩带刀剑的农民，便问他们：“为何带牛佩犊？”意思是说你们应该卖了刀剑买牛买犊来耕田，不该把买牛买犊的钱拿去买刀剑来佩带。

⑥ 行水，是古耕礼。

⑦ 责授苏轼为宁远军节度副使，见于绍圣元年六月初五日《苏轼散官惠州安置制》。《苏轼诗集》卷三十七《诰案》云：“六月，自金陵赴当涂，累贬建昌军司马”；卷三十八《诰案》又云：“八月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轼文集》第2072页《书六赋后》（苏轼于六月二十五日书）亦云：“舟行已至姑熟，而予道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笔者想，这几则记载都是说同年六月里苏轼贬官的事，而朝廷诏令当不会弄错苏轼责授的官职，也许是苏轼在途中得到的消息不够确实，《诰案》所记又是根据苏轼所说。再者，司马是正九品，节度副使是从八品。绍圣朝廷不会先把苏轼贬为正九品，然后又把他升为从八品。故，本文不取累贬建昌军司马一说。

(赖正和,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原编审、

(上接第 41 页)

⑪⑫⑬⑭⑮ 孔凡礼撰《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66~1167页，第1170页，第1173页，第1375~1376页，第1378页，第1382页，第1388页。

④ 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7页。

① 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55页《步过分水岭》。

^⑧ 许怀林著《江西通史·南宋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5页。

^⑤ 曾敏行撰《独醒杂志》，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7页。

⑤ 方勺撰，许沛藻、杨立扬点校《泊宅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

④ 赣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同治《南安府志补正》, 1987年重印本, 第1130页卷九《艺文·诗》。

⑤ 江西赣州政协文史委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⑥ 王巩撰《闻见近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李云彪，四川大学硕士、赣南师范学院科技学院文法系助教）

道眼妙观，游戏翰墨

——苏轼诗境的禅学之维

赵德坤

内容提要 苏轼诗中广引佛禅语汇，分别源于佛教经典和禅宗语录；他还将云门宗重要禅法——活句纳入诗歌语境，从而使诗歌创作与文字禅水乳交融，达成禅境与诗境的会通；诗人坎坷跌宕的人生经历和深湛理性的佛学修养，锻铸了洞达人生与超越苦难的生命智慧，最终实现了禅境、诗境与人生境界的贯通与合一，进而形成其个性鲜明的诗学观念。

关键词 禅语 活句 禅境与诗境 道眼妙观

在苏轼的诗作中，我们会发现其语言层面的一个突出特征，丰富多彩的佛禅语汇，或明或暗的嵌入具体的语境中。这些来自佛教经典、僧史僧传与禅宗语录的特殊用语，为苏轼诗歌营构了颇具张力的意义生态场域。不仅如此，北宋云门宗重要禅法——活句，也被苏轼创造性地纳入其诗歌意境的脉络。这样，在文字禅盛行的佛学文化背景之下，苏轼的诗歌意境很多时候与禅境水乳交融。这种境界是诗的境界、禅的境界与人生境界的贯通与叠合。它来自诗人坎坷跌宕的人生经历和深湛理性的佛学修养，来自诗人洞达人生三昧和超越生命苦难的智慧。进而，这种诗歌创作实践也影响到苏轼的诗学观念。本文试图循此思路，对苏轼诗歌境界予以禅学审视。

一、苏轼诗中的佛禅语汇

苏轼所生活的北宋中后期，是文人士林盛行居士禅的时代，恰与当时丛林以云门宗为主流的文字禅相呼应。文人士大夫研读佛典，悟

道参禅，一如丛林佛子旁涉经济，习诗论艺，蔚成一时风气。而将禅语与禅意带入诗歌创作，更是普遍现象。从苏轼诗文可知，诗人一生过眼佛教典籍多种，诸如《圆觉经》、《金刚经》、《华严经》、《楞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金光明经》、《坛经》等，同时也广泛涉猎唐宋以来的僧史僧传和禅宗语录。其诗歌中灵活化入禅语者，不下二百篇。兹结合其作品予以分析。

首先，苏轼诗作中常出现佛典语汇。①如：
人生如朝露，白发日夜催。
弃置当何言，万劫终飞灰。
——《登常山绝顶广丽亭》

佛教经典对生命个体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做了冷峻的剖析和彻底地消解。《大方广佛华严经不思议佛境界分》卷一云：“一切诸法，如露，如燄，如幻，如阳焰，如镜像。”②《维摩诘经》如是说：“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炎，从渴爱生；是身如芭蕉，中无有坚；是身如幻，从颠倒起；是身如梦，为虚妄见；是身如影，从业缘现；是身如响，属诸因缘；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是身如电，念念不住。”③苏轼此诗从佛典获得洞见人生真相的智慧，感知生命的短促与虚幻。与之相类者还有：“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身。”（《次韵王廷老退居见寄》）“聚散细思都是梦，身名渐觉两非亲。”（《至济南，李公择以诗相迎，次其韵二首》其二）“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等等。苏轼由生命的短暂，进而认识到生命存在的暂时性，因而产生“人生如梦”、“人生如寄”的体悟。周裕锴先

生说：“纵观苏轼的全部诗歌，视人生如梦幻泡影露电空花浮云的诗句，几乎近百处。”^④而这种觉知，既源于其漂泊如转蓬的人生遭际，也应从佛典获得过启示“三界幻居，犹如寄止”。^⑤

如果说，从佛教的人生观出发，苏轼看到了个体生命的虚幻不真，频生“吾生如寄耳”之感喟，那么，他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也在其诗中通过佛典语汇很鲜明地表达出来。如：

1. 久知世界一泡影，大小真伪何足评。
- 《轼近以月石砚屏献子功中书……》
2. 早知身寄一沤中，晚节犹惊落木风。
- 《次韵林子中、王彦祖唱酬》

视世界为“泡影”、“一沤”的思想观念，也直接源于佛教经典。《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⑥《华严经》、《首楞严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都有相类说法。《首楞严经》云：“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国土，知觉乃众生。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⑦可见，在苏轼诗作中，源于佛学经典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是一致的，即暂时有限与虚空不真。

其次，苏轼诗作中也常出现僧史僧传与禅宗语录中的话头、公案和语词。兹举数例如下：

1. 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
- 《次韵子由寄题孔平仲草庵》
2. 若问西来师祖意，竹西歌吹是扬州。
- 《别择公》
3. 若说峨眉眼前是，故乡何处不堪回。
- 《次韵徐积》
4. 还从旧社得心印，似省前生觅手书。
- 《去杭州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
5. 不知庾岭三年别，收得曹溪一滴无。
- 《程德孺惠海中柏石，兼辱佳篇，辄复和谢》
6. 知是丹霞烧佛手，先声应已慑群夷。
- 《送钱承制赴广西路分都监》
7. 净眼见桃花，纷纷堕红雨。
萧然振衣袂，笑问散花女。
我观解语花，粉色如黄土。
一言破千偈，况尔初不语。
可怜一转话，他日如何举。

——《次韵正辅表兄江行见桃花》

8. 研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
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

——《东坡居士过龙光，求大竹作肩舆，得两竿。南华珪首座，方受请为此山长老。乃留一偈院中，须其至，授之，以为他时语录中第一问》

例一之“安心”，首先源于印传佛典，后常出现于中国禅宗文献。如：“光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师曰：‘诸佛法印匪从人得。’光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师曰：‘将心来与汝安。’曰：‘觅心了不可得。’师曰：‘我与汝安心竟。’”^⑧例二之“西来师祖意”，则是唐宋以来中国丛林恒久参究的话头。如：“赵州行脚时参师，遇师洗脚次，州便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恰值老僧洗脚。’”^⑨例三虽未见禅语，但却既是对禅宗公案的熔冶，又蕴含南北一如的禅学观念。此句显然从如下公案化出：“雪峰谓众曰：‘诸上座，到望州亭与上座相见了，到乌石岭与上座相见了，到僧堂前与上座相见了。’师举问鹅湖曰：‘僧堂前相见即且置，只如望州亭、乌石岭什么处是相见。’”^⑩例四之“心印”，《佛学大辞典》云：“禅之本意，不立文字，不依言语，直以心为印，故曰心印。心者佛心。印者印可印定之义。此印能印可或印定佛法之实义也。”而后句“前生觅手书”亦来自禅籍：“张方平……庆历中，尝为滁州守。游琅琊山，抵藏院，偶见《楞伽经》，取视之。忽感悟前身事，入手协然，如获旧物，开卷未终，夙障冰解。细视笔画，手迹宛然，读至‘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华’，遂明已见。”^⑪例五之“曹溪”本指南宗禅之祖庭，六祖慧能开坛说法之地，苏轼诗中多次出现，意谓禅学精神或禅宗奥义。例六之“丹霞烧佛”，是一桩著名公案：“邓州丹霞天然禅师……唐元和中至洛京龙门香山，与伏牛和尚为莫逆之友。后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师取木佛焚之。人或讥之，师曰：‘吾烧取舍利。’人曰：‘木头何有？’师曰：‘若尔者何责我乎？’”^⑫后为中国禅林时常参究：“僧问：‘丹霞烧木佛，意旨如何？’师云：‘招因带果。’”^⑬例七之“散花女”亦自佛典来：“花于虚空中，迟速下不同。虚空诸天女，散花满地中。”^⑭而在在中国禅宗语境中，就发生

了演化：“法融禅师者……年十九，学通经史，寻阅大部般若，晓达真空。忽一日叹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观出世舟航。’遂隐茅山投师落发。后入牛头山幽栖寺北岩之石室，有百鸟衔华之异。”^⑤“转话”即“转语”，意谓“参禅参到进退维谷处，请人代下一语，以为拨转，而得转身自在，乃至于转迷为悟。”（参见陈义孝编《佛学常见辞汇》）

综上，苏诗中的禅语运用，形式灵活，出处多途，有明用，有转化。而其共同的意义指向，就是以禅宗智慧观照当下生存之无奈，从而获得精神压力的缓解，达成暂时的心灵自由。

二、苏轼诗中的“活句”

苏轼诗作中，不仅广用佛禅语汇，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制了独具特色的诗句——活句。“活句”本为禅语，出自云门文偃法嗣洞山守初禅师：“上堂云：‘语中有语名为死句，语中无语名为活句。’诸禅德，作么生是活句？到者里实难得人。”他还说：“言无展事，语不投机。承言者丧，滞句者迷。”^⑩洞山初禅师继承了云门文偃的险峻禅风，反对学人在言句上滞留，遣除其对语言的执着，因此常以不可思议的语句回答僧徒的参问，这样的语句就是活句，它以语言形式拒斥语言本身，从而将学僧逼入进退失据、无以容身之境，要么立地成佛，要么陷入迷途。日本学者土屋太佑说：“就‘活句’的思想而言……可以说是云门宗的宗风。”^⑪

那么，活句究竟是怎样的语言形式呢？《人天眼目》记载了云门宗极具代表性的案例：“云门宗旨，绝断众流，不容拟议，凡圣无路，情解不通。僧问：‘如何是雪岭泥牛吼？’师云：‘天地黑。’‘如何是云门木马嘶？’云：‘山河走。’‘如何是学人自己？’云：‘游山玩水。’问：‘机缘尽时如何？’云：‘与我拈却佛殿来，与汝商量。’‘如何是透法身句？’‘云北斗里藏身。’‘如何是教外别传？’云：‘对众问将来。’大约云门宗风，孤危耸峻，人难凑泊，非上上根，孰能窥其彷彿哉！”^⑫而《云门要诀》进一步总结云：“韶阳一派，出于德峤之源。初见睦州，推出秦时之钻；寄声象骨，脱却项上之枷。使南鳌鼻撞向面前，打东鲤鱼，雨倾盆下。称

提三句关键，拈掇一字机锋。藏身北斗星中，独步东山水上。端明顾鉴，不犯毫芒，格外纵擒，言前定夺，直是剑锋有路，铁壁无门。打翻路布葛藤，剪却常情见解，烈焰宁容凑泊，迅雷不及思量。”^⑬可见作为云门宗重要禅法的“活句”，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诸如“云门三句语”、“云门一字关”等，其共同特点就是“孤危耸峻”、“情解不通”。

本为云门宗重要禅法的“活句”，在北宋文字禅盛行的文化背景之下，经由文人居士的诗歌艺术实践，这种独具特色的禅语便转化为诗语，悄然进入诗歌艺术领域。苏轼的作品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诗禅双运的语言形式。兹举数例如下：

1. 聚散细思都是梦，身名渐觉两非亲。
相从继烛何须问，蝙蝠飞时日正晨。
——《至济南，李公择以诗相迎，次其韵二首》其二
2. 若问西来师祖意，竹西歌吹是扬州。
——《别择公》
3. 乐全老子今禅伯，掣电机锋不容拟。
心通岂复问云何，印可聊须答如是。
相逢为我话留滞，桃花春涨孤舟起。
——《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
4. 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
禅老复何为，笑指孤烟生。
——《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其一
5. 圣谛第一义，对面谁不识。
师来亦何事，孤月挂空碧。
——《送小本禅师赴法云》

我之所以认为这些下划线的例句是活句，理由如下：首先，从语言形式上看，这些语句前面都有一个问句，这些语句似乎是对其前置问句的回答；其次，从内在意义联系来看，前后两句，发生了意义断裂，从而失却了逻辑性的必然关联；再次，有些例句，直接将禅宗活句移植过来，如例二。而这一些特点恰与禅宗语境的活句十分吻合。而作为诗语的活句，又有着不同于禅宗意义的活句之处：首先，这些诗句一般都是由鲜明意象构成某种诗境；其次，这些诗句一般都在一首作品的结尾；再次，这些被称作活句的诗句，虽然与前面的诗句发生了语脉和义脉的断裂，但是它是有意义的，并

且，由于这样的诗句的存在，整首诗的意境变得更加空灵、深远而悠长。

从苏轼作品中活句的用例看，除了具有以上特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出现这些活句的作品，一般多为与诗人过从甚密、感情笃厚的兄弟、朋友和僧人的唱酬赠答，所抒情感，都是无需遮掩发自肺腑的内心剖白，坦率而真诚。而其情感指向，则要么感喟人生如梦而欲说还休，要么参透人生真相而聊作放达。总之，这些活句的出现，究其实质反映出苏轼以佛禅之道眼，观照其多舛的人生境遇，谛视当下无奈的纷繁世相，为缓解压力，调整自我、自他之关系，所作的心灵体操，虽然其深层的蕴含难免沉重，但诗人选择了洒脱超然的表现形式。

三、苏轼诗中的禅境

由于大量佛禅语汇与活句的运用，苏轼的诗歌较为明晰地呈现了诗人的佛学见解，展示了多层次的禅修境界，进而营构杳渺淡远的诗歌意境，藉此直达其进退裕如、高远旷迈的人生境界。

从禅宗哲学思想的角度，习禅者一般要经过这样的几个心理认识阶段：自性固有、精神迷失、修行悟道和回归自我。苏轼在其作品中，大致呈现了除了前者之外的三个方面。兹结合其具体作品逐一分析。

首先，苏轼从禅学的角度审视人生，认识到由于太多的欲望，遮住了心灵，使人陷入迷惘之途。如《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大朴初散失浑沌，六凿相攘更胜败。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君知五蕴皆是贼，人生一病今先差。但恐此心终未了，不见不闻还是碍。”这里，苏轼从自己的人生体验中，真切地感受到色、受、想、行、识五蕴是遮覆心灵的云，是戕害自性的贼。而且其对人的浸熏常常深入骨髓，难以根除。

其次，在苏轼的作品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基于“人生如寄”、“人生如梦”的清醒认识，诗人对习禅之法的探求，对修心息心、获致解脱的渴望。如：

1. 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

——《次韵子由寄题孔平仲草庵》

2. 盛衰岂我意，离合非所碍。

何以解我忧，粗了一事大。

——《初别子由至奉新作》

3. 愿求南宗一勺水，往与屈、贾湔余哀。

——《西山诗和者三十余人，再用前韵为谢》

4. 小阁低窗卧宴温，了然非默亦非言。

维摩示病吾真病，谁识东坡不二门。

——《臂痛谒告，作三绝句示四君子》其三

5. 电眸虎齿霹雳舌，为余吹散千峰云。

南行万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为谢》

6. 过眼荣枯电与风，久长那得似花红。

上人宴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

——《吉祥寺僧求阁名》

置身于现实中的诗人，面对荆棘丛生的仕途，心中充满人间世的忧虑和悲哀。在诗人看来，所谓盛衰、离合，都不值得计较，最让他耿耿于怀的是，如何获得安心之法，借南宗禅之圣水，荡涤精神之哀伤，凭高僧大德之点拨，扫除心灵之疑云，最终了却一大事因缘，获得人生之大解脱。

再次，我们可以看到苏轼从禅宗获得智慧，体认到人生与世界真相之后，所表现出的从容淡定和触处即真的人生境界。如：

1. 多生宿业尽，一气中夜存。

旦随老鸦起，饥食扶桑暾。

光圆摩尼珠，照耀玻璃盆。

来从佛印可，稍觉魔忙奔。

闲看树转午，坐到钟鸣昏。

敛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温。

——《入寺》

2. 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再三馀。

——《二月十九日，携白酒、鲈鱼过詹使君，食槐叶冷淘》

3. 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

——《文登蓬莱阁下，石壁千丈，为海浪所战，时有碎裂，淘洒岁久，皆圆熟可爱，土人谓此弹子涡也。取数百枚，以养石菖蒲，且作诗遗垂慈堂老人》

4. 茶笋尽禅味，松杉真法音。
——《参寥上人初得智果院，会者十六人，分韵赋诗，轼得心字》
5. 道眼转丹青，常于寂处鸣。
早知雨是水，不作两般声。
——《次周焘韵》
6.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
夜来四万八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赠东林总长老》
7. 那能废诗酒，亦未妨禅寂。
——《次韵王巩南迁初归二首》二首之一

苏轼一生广交僧友，在其诗作中出现的僧人法号不下百人，而与其交往笃厚者，诸如道潜参寥、云居了元、长芦闻复、圆通居讷、大小二本、广慧清顺等，均属云门宗僧。因此可以说，苏轼对禅宗思想的接受，主要来自云门宗。苏轼之所以更为亲近云门宗僧，笔者认为原因有三，其一，北宋仁宗至神宗时期，云门宗势力很盛，与文人士大夫关系密切，从洛阳、汴梁到江淮流域，名寺大刹的住持僧，多为云门宗人；其二，当时云门宗兴盛的原因，在于宗门中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与文学修养，是文字禅的主要倡导者和践行者；其三，云门宗的思想与苏轼真率自然的人生态度和天才纵逸、不受羁勒的禀赋气质不谋而合。后者显然是最重要的原因。（关于云门宗对苏轼发生影响的思想因素，容笔者下文详论。）从上引诸例句可知，苏轼认为，人生的自由境界，不在彼岸，不在梦中，不须玄想，毋庸追求，它就在当下。且随鸦鸣而起，饥随日升而食，此即“饥来吃饭，困来打眠”之意。诗人不仅从茶笋之味、松杉之声，体悟到禅的真谛，而且于潺潺溪声、苍苍山色感知真如之境。在诗人看来，人生的大自在就在“醉饱高眠”之际，就在檐滴雨漏之间，就在诗酒畅情的日常生活之中。

苏轼通过诗歌，表达禅学见解，借以消解人生的苦难。因此，我们毋宁说东坡居士的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不啻为参禅悟道的修行。此即为文字禅。不过作为文人士大夫，苏轼的文字禅不同于丛林高僧的文字禅，它既有禅境的静默，又有诗境的温度，更有人生境界的审美、生机和旷远。它是禅境、诗境与人生境界的叠合与融通。

四、苏轼诗境论的禅学审视

苏轼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积累并总结出丰富的文学思想，其中一些重要观点是在禅学浸熏之下提出的。下面择要予以分疏。

首先是苏轼关于创作心理的“空静”观。他在《送参寥师》中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释氏要览》“兰若”条云：“梵云，阿兰若，或云阿练若。《四分律》云：‘空静处。’”②陈义孝编《佛学常见辞汇》释“空”云：“因缘和合而生的一切事物，究竟而无实体，叫做‘空’，也是假和不实的意思。”《释氏要览》“静”词条云：“《能断金刚论》云，定名静以得禅者说名寂静。寂静有二种，一心寂静，二身寂静。今以四句料简，一、有身欲寂静，而心不寂静，谓贪欲比丘林下坐禅；二、有心寂静而身不寂静，谓无贪瞋比丘亲近王臣；三、有身心俱寂静，谓诸圣人；四、身心俱不寂静，谓凡夫。”③简言之，佛学语境中的“空静”，实指僧徒禅修中的心理调试过程和心理状态，它是体悟佛性所在的重要前提。苏轼将此思想运用到其诗学观点的表达上，从而实现了禅修与诗艺的衔接。在苏轼看来，以空静之心，妙观大千，涵咏万有，方得诗语之妙。从而将趋于静寂之禅心，转化为灵动审美之诗思。与之相类的诗语还有：“是身如虚空，万物皆我储。”（《赠袁陟》）“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其一）等等。

其次是苏轼关于意象选择的自然论。无论谈诗抑或论文，苏轼都崇尚自然，反对雕琢。其《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苏轼认为，诗画一样，不在徒尚形似，而重写形传神，最终复归自然。这里就存在一个关键问题，选取什么意象进入诗境和画幅，才能实现以“一点红”寄寓“无边春”。爬梳纷纭物象，探取悠悠神韵，陶铸典型意象，从而达成简约自然、神完气足的艺术

效果。其实，苏轼的这种观点是受到了禅宗所谓能所俱泯、梵我一如的不二观念的影响。这种思想在其诗作中多有精彩呈现，诸如“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文登蓬莱阁下，石壁千丈，为海浪所战，时有碎裂，淘洒岁久，皆圆熟可爱，土人谓此弹子涡也。取数百枚以养石菖蒲，且作诗遗垂慈堂老人》）“东南山水相招呼，万象入我摩尼珠。”（《次韵吴传正枯木歌》）“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东坡居士过龙光，求大竹作肩舆，得两竿。南华珪首座，方受请为此山长老。乃留一偈院中，须其至，授之，以为他时语录中第一问》）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其“随物赋形”、“与物曲折”、“行云流水”、“行止自然”等观念，是其崇尚自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种观念无疑也反映出禅宗思想尤其是云门宗思想的影响。云门宗祖师文偃说：“上堂。”大众集定，乃以拄杖指云：“乾坤大地，微尘诸佛，总在里许。”“汝等诸人，傍家行脚，皆是河南海北来，各各尽有生缘所在。还自知得么？试出来举看，老汉与汝证明。有么？有么？汝若不知，老汉瞒汝去也。汝欲得识么？生缘若在向北，北有赵州和尚、五台文殊，总在这里；生缘若在向南，南有雪峰卧龙、西院鼓山，总在这里。汝欲得识么？向这里识取。若不见，莫掠虚。”②文偃禅师在其法语中，不厌其烦的强调“总在这里”，其用意很显然，就是告诫僧徒，放下包袱，不要执着，解脱临时，当下证入。这种思想为后继者所传承。如仁宗时期云门宗四世雪窦重显说：“若论本分相见，不必高升宝座。乃以手指一划云，诸人随山僧手看，无量诸佛国土一时现前，各各仔细观瞻。其或涯际未知，不免拖泥带水。”③所谓“无量诸佛国土一时现前”，就是“总在这里”的翻版，表达了“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华严无碍思想。基于此，北宋云门宗僧尤其雪窦重显一脉，常以形象鲜明、意境优美的山水诗，作为禅说的方式，形成颇受文人亲睐的文字禅风。苏轼曾说：“高怀却有云门兴，好句真传雪窦风。”（《再和并答杨次公》）因此，苏轼不仅在创作上表现出取法自然而洒脱率真的特点，而且在诗境理论上主张摆脱羁绊、神与物游，生成“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

最后是苏轼诗歌境界的“至味”说。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一文中说：

余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④

苏轼认为，诗书一律，妙在远韵，美在至味，而发于简古，寄于澹泊。奏弦外之音，孕言外之意，生唱叹之致。他还说：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⑤

好的诗歌，贵乎枯淡，形似质木无文，实则简澹丰美。将两则材料比并而观，就能看出苏轼“至味”说的基本内涵：以平淡简远之笔，写冲容深至之意。这种刊落铅华、至味无味的诗歌境界，只有苏轼这种经历过跌宕起伏的人生淬炼的学者型诗人，在佛禅思想的启悟之下，才可达到。他用“如人食蜜，中边皆甜”的佛语，指陈这种审美境界，道出了能所俱泯、触处皆真的实质，这是诗的境界，更是苏轼“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⑥的人生境界。

综上，通过对苏轼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的禅学分析，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其诗歌艺术的语言特征和内在肌理，而且我们也能够分明感受到，诗人以佛禅慧眼妙观世界与人生，从而获得戏谑人生苦难、经营现实生存的勇气、超然

与务实。如果说其富有佛禅韵味的诗作，是其深得游戏三昧的文字禅，诗人由此进入审美之境与自由之境；那么，其受佛学思想影响的诗学理论，则将艺术与人生打成一片，最终指向平淡而山高水深、宁静而花朗月明的生命境界。

注释：

① 此文所援引的苏轼诗歌均出自：苏轼著，傅成、穆侍校点《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大正藏》卷一〇，提云般若译《大方广佛华严经不可思议佛境界分》卷一，第908页。

③ 《大正藏》卷一四，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卷一，第539页。

④ 《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第71页周裕锴《梦幻与真如》。

⑤ 《大正藏》卷三八，顶法师撰《大般涅槃经疏》卷四，第62页。

⑥ 《大正藏》卷三三，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批注》，第238页。

⑦ 《大正藏》卷一九，般刺蜜帝译《首楞严经》卷六，第130页。

⑧ ⑨ ⑩ 《大正藏》卷五一，道原编《景德传灯录》卷三第219页，卷一九《漳州保福院从展禅师》第354页，卷一四第310页，卷四第226~227页。

⑪ 《大正藏》卷四七，慧然集《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第504页。

⑫ 《正新纂续藏经》第八十六册朱时恩辑，《居士分灯录》卷上，第590页。

⑬ 《正新纂续藏经》第七八册，李遵勖编《天圣广灯录》卷二八《杭州南山资国圆进山主》，第565页。

⑭ 《大正藏》卷四，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卷一二。

⑮ 萧寔父、吕有祥、蔡兆华点校，赜藏主编集《古尊宿语录》卷三八，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09~710页。

⑯ 土屋太祐著《北宋禅宗思想及其渊源》，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26页。

⑰ ⑱ 《大正藏》卷四八，智昭编《人天眼目》卷二《云门门庭》，第313页。

⑲ ⑳ 《大正藏》卷五四，释道诚集《释氏要览》，卷一第263页，卷三第297页。

㉑ 《大正藏》卷四七，守坚集《云门匡真禅师广录》卷一，第549页。

㉒ 《大正藏》卷四七，惟盖竺编《明觉禅师语录》卷一，第673页。

㉓ ㉔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24~2125、2109~2110页。

㉕ 《正新纂续藏经》第八十册，普济著《五灯会元》卷五《药山惟俨禅师》第109页。

(赵德坤，四川大学文学博士，宜宾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书名：诗人与造物——苏轼论考
作者：[日]山本和义著 张剑译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5月第1版

开本：32开
页数：324页
定价：38元

苏辙寄寓佛禅的思想略探（上）

达亮

内容提要 苏辙是宋代学者中公开承认对佛道思想认同与吸收的典型代表。他浸淫于佛禅，试图借佛家出世以避迁谪之祸；他注重实践，学修一体，身体力行，在感悟与体验佛理禅悦的同时，亦在诗词文赋中留下不少禅悦之痕，是佛教的宣讲者和实践者。

关键词 苏辙 《坛经》 佛禅 诗词

唐宋时期，对中国士大夫影响最大的是佛教，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苏辙等大文学家的创作无一不受到般若和禅宗的影响。中国佛教从来具有入世精神。宋代佛教高僧更以他们渊博的学识和为法献身的精神，结合时代特点弘扬佛法，争取了大批士大夫成为护法居士。那些高层的弘法者如富弼、文彦博、欧阳修、韩琦、杨亿、张商英等等，不可能摒弃他们的社会身份和责任，因而形成一种士大夫兼修世间、出世间法的现象。北宋君臣之间，信佛好道，几乎人人未能免俗。一向自诩文士的司马光，经常斋僧、诵经、追荐祖先；一贯恪守儒教，“素不信释氏之说”的欧阳修也因一场大病“自是遂信佛法”，并自号“六一居士”；哲学界称之为具有唯物主义观点的宰相王安石“舍宅为寺”等等。由于士大夫、文人好禅，可以说，其时宰官身着官服，实是禅的行者，还有禅僧文学素养精湛，亦如是身着僧服的士人才子，于是禅师与文人士子之间你来我往，彼此相得益彰，增添了许多禅门的佳话。在当时的士大夫文人学士之间，写诗、写偈颂来论赞佛道，简直是一种自诩高雅的时尚。

苏辙生活在“士大夫禅学化”、“禅学士大夫化”的北宋时代。苏辙从小生长在佛教信仰浓厚的家庭，父苏洵广结名僧，母程氏与兄苏轼亦笃信佛教。他早年受佛教家庭的

熏陶及天府佛国地理因缘的影响，信佛尤笃，“兄自觉谈佛不如弟”，①是虔诚的佛教徒。至于苏辙皈依释氏佛禅的年代，大概在熙宁、元丰遭贬之后。苏辙从三十多岁就研读佛经，四十一岁贬居筠州后更对世间人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迁谪之后，参访寺院常常带有对生命的深刻反思及体悟，他在《书楞严经后》云：“予自十年来，于佛法渐有所悟。”参寺访僧，谈禅论佛，遣忧解怀，让苏辙的生命有所寄托。加上对佛禅思想的深度契合，体证在生活上，使苏辙葆有超旷的情怀，并安然度过常人所不能忍的逆境。

苏辙一生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直视释氏为唯一归宿。苏辙为上蓝顺禅师弟子，上蓝顺为临济宗，为南岳下十二世，黄龙慧南之高弟。《五灯会元》卷十八谓苏辙为顺老法嗣：“参政苏辙居士，字子由……左迁瑞州榷筦之任。是时，洪州上蓝顺禅师与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访焉，相得欢甚。公咨以心法，顺示鼻因缘。已而有省，作偈呈曰。”苏辙一听，言下大悟。遂作偈呈顺禅师。偈云：“中年闻道觉前非，邂逅仍逢老顺师。搐鼻径参真面目，掉头不受别鉗锤。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盐我是谁。惭愧东轩残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饴。”②苏辙处在禅宗振兴之盛世，喜欢驻足于寺院。加上一生迁谪多州，“身行万里半天下”，③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诸佛寺。苏辙又与惟简宝月、佛印了元、黄檗道全、真净克文（黄龙慧南禅师法嗣真净克文，真净禅师与景福顺禅师是同门师兄，均是黄龙慧南禅师的入室弟）、寿圣省聪、诗僧道潜（云门宗大觉怀琏的弟子，云门宗下五世，“晚参云门禅”④）、净因怀琏、梵臻长老、圆通知慎、清隐惟湜、龙井辩才、南华辩老等禅师多有往还，苏辙同苏轼一样，

专爱游览名寺古刹，结交寺院僧人，“喜与僧游，每居寺中数月不返”，^⑤不仅广与禅师交游，而且还同他们谈论佛典，为他们语录作序，书写碑文、铭文、祭文，佛禅因缘颇深。

北宋中后期是中国文学家学佛的高峰期，杰出的文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公开自己学佛（禅）的经历。再者，熙宁以来斗争激化，禅宗势力藉此不断壮大，司马光所谓“近来朝野客，无座不谈禅”^⑥就成了当时的一道风景线。苏轼推荐秦观给王安石时说秦观“博综史传，通晓佛书”，^⑦学佛似乎也成了一种学问的资本。苏辙亦然，“绩溪仙翁若秋鹤，有喙不向腥羶啄……亲携杖拂呵禅祖，自伐松根出灵药。世人真自为公忙，公宁有意人间乐。”^⑧再者，苏辙又说：“夫多病则与学道者宜，多难则与学禅者宜。”^⑨北宋中后期激烈的党争是士大夫们“多难”的客观原因。其实，苏辙正是道出了宋代士大夫们学佛的内在动因。

苏辙对南宗禅的理论探究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他在《栾城三集》卷九《书传灯录后》将他读灯录的感想记录下来：

予久习佛乘，知是出世第一妙理，然终未了所从入路。顷居淮西，观《楞严经》，见如来诸大弟子多从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虽凡夫可以直造佛地。心知此事，数年于兹矣，而道久不进。去年冬，读《传灯录》，究观祖师悟入之理，心有所契，手必录之，置之坐隅。盖自达磨以来，付法必有偈。偈中每有下种生花之语。至六祖得衣法南迈，有明上坐者，追至岭上，知衣不可取，悔过求法。祖诲之曰：“汝谛观察，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阿那个是明上坐本来面目。”明即时大悟，遍体流汗，曰：“顷在黄梅随众，实不省自己本来面目，今蒙指示入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祖知明已悟，教之善自护持而已。及内侍薛简问祖心要，祖亦曰：“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简亦豁然大悟。予释卷叹曰：祖师入处傥在是耶？既见本来面目，心能不忘，护持

不舍，则所谓下种也耶？譬诸草木种子，若置之虚空不投地中，虽经百千岁，何缘得生？若种之地中，润之以雨露，曠（hàn）之以风日，则开花结子，数日可待。六祖常谓大众：“汝等诸人，自心是佛，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因教之以一相一行三昧曰：“若人于一切处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就其实。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兹沾洽，悉得发生。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决证妙果。一相一行三昧，则治地法也。”予至此复叹曰：“祖师之言备矣！而人自不知，虽知未必能行，如予盖知而未能行者也。”昔李习之（翹）尝问戒、定、慧于药山（惟俨）。药山曰：“公欲保任此事，须于高高山顶坐，深深海底行，如闺阁中物舍不得，便为渗洒。”予欲书此言于绅，庶几不忘也。^⑩

元符二年（1099）夏六月，苏辙晚年自海康再谪贬龙川。索然无事，他读《乐天文集》，书后以见己意。既佩服白居易的“优游终老”，又鄙其嗟叹穷老投荒之未能解脱。苏辙又论及佛经中动息真妄之说，作《书乐天集后二首》寄给苏轼。

元符二年……秋八月……庐于城东圣寿僧舍，闭门索然，无以终日……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故其还朝为从官，小不合，即舍去，分司东洛，优游终老。盖唐世士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其一

《圆觉经》云：“动念息念，皆归迷闷。”世间诸修行人，不堕动念中，即堕息念中矣。欲两不堕，必先辨真妄……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则未尝息念而念自静矣；如此乃为真定。真定既立，则真惠自生。定惠圆满，而众善自至……

《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既不住六尘，亦不住静，六尘日夜游于六根，而两不相染。此乐天所谓“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尝告大弟子：假使坐而不动，除得妄起心。此法同无情，即能障道。道须流通，何以却住心？心不住即流通，住即被缚。故五祖告牛头（法融）亦云：“妄念既不起，真心任遍知。”……佛祖旧说。符合如此。而乐天八渐偈，亦似见此事。故书其后，寄予瞻兄。○一一其二：

苏辙在他的《栾城集》中，也以对《周易》的阐述来理解惠能的“不思善，不思恶”。苏辙《书传灯录后》说：

仰山尝谓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作么生！”对曰：“正恁么时，是某甲放身命处。”仰山曰：“何不问老僧？”曰：“恁么时不见有和尚。”仰山曰：“扶吾教不起。”或曰：“不思善，不思恶，此六祖所谓本来面目，而仰山少之何也？”颖滨老曰：“在《周易》有之：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无思无为者，其体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其用也。得其体未得其用，故仰山以为未足耳。长沙岑和尚尝遣僧问同参会老曰：和尚见南泉后如何？会默然。僧曰：未见南泉时如何？会曰：不可更别有也。僧回以告，岑有偈曰：百尺竿头坐底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盖亦贵其用耳。”

○

仰山认为不思善恶尚未到修行的最高境界，苏辙表示认同，并解释说，寂然不动与感而遂通为体用关系，只谈无思无为寂然不动，而不及感而遂通之用，则无思无为本体亦无从表征。既求得体，更求致用，这是苏氏哲学体用观的特色。

以上所论及的宋人对六祖惠能和《坛经》的接受，主要着眼于理性层次的分析。宋人当然有在感情和感悟层次上对于六祖惠能和《坛经》的接受。他们在这方面和唐代文人一样，有向往、崇信与追求。

以禅论诗 以禅喻诗

自从禅宗六祖惠能之禅流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刘禹锡）以来，禅似乎成了惠能一家的专用名词。禅理、禅趣、禅味、禅机，以及祖师禅、分灯禅，说的都是以惠能为代表的南宗禅。《坛经》中所体现出惠能禅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以心传心，强调内心自证自悟的方式，以及随缘任运，无诤无求，宁静淡泊，自然洒脱，自由无碍的空灵解脱之禅境，可以说是许多文学艺术家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或艺术评价的内在尺度，于是文学艺术等作品就成为表现这种禅悟、禅境的形式，由此《坛经》对中国文学、艺术、书法、绘画等也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力。首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诗歌的影响。在唐代的文学当中，有一个引入瞩目的现象就是禅诗的盛行。所谓禅诗，主要是指表达禅宗理趣、意境或所谓禅悟的诗歌作品。无论是禅门的禅师还是文人士大夫，他们以禅入诗，或以诗入禅，为璀璨的唐诗注入了新的意蕴。苏辙是宋代学者中公开承认对佛道思想认同与吸收的典型代表。对于佛禅，他有着深刻的理解，并沉溺于中，又“如王介甫父子、苏子瞻兄弟、黄鲁直、陈天已、张天觉（张商英）之徒，愿为外护，皆以翰墨为佛事，未必不自书发之。”○苏辙在感悟与体验佛理禅悦的同时，亦在诗中留下不少禅悦之痕。

如果说，“外儒内禅”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治国的一般方式，那么，外服儒行，内心私淑庄、玄、佛、禅则是知识分子应对之策。苏辙受佛教家庭及地理因缘的影响，加之他宦海浮沉的浸淫，参禅学佛在他生活中势必不可或缺。苏辙诗歌颇受六祖惠能南禅之影响，其诗具有“以禅入诗，或以诗入禅”的思想特色。苏辙给其兄苏轼恭贺新居的诗中，以“心是南宗无尽灯”（《和子瞻新居欲成二首》）而共勉。苏轼在给朋友的谢诗中，又以“收得曹溪一滴无”（《程德孺惠海中石兼辱佳篇辄复和谢》）而相问，可是在情感上，南宗禅已得到了较普遍的接受。他的《次韵子瞻凌虚台》、《赠净因臻长老》、

《过兴教赠钊上人》、《试院唱酬十一首·次韵吕君兴善寺静轩》（“年过四十始知非”）等都属于参禅学佛类作品。如《见儿侄唱酬次韵五首》，其四云：“身病要须闲，闲极自成趣。空虚虽近道，懒拙初非悟。偶将今生脚，远着古人履。大小适相同，本来无别处。”^①此诗不是佛禅名词的堆砌和义理的演绎，而是有着诗人独特的见解。苏辙的赠诗一般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惊人的夸张，冲和静澹，自然素相，但其诗大多有感而发，在晓畅的句格中，寓俯仰感喟之致，实在不乏饶有韵味的佳篇。

元丰六年（1083）苏辙生病时，曾感喟：“四大俱非五蕴空，身心河岳尽消镕。病根何处容他住，日夜还将药石攻。”^②纵使“道人嫌服药，心息自相安”^③，“是病皆空岂有方”。^④“年老百病生，风痺已三作……下种本无种，服药亦非药”^⑤，但是“调心开贝叶，救病读难经”。^⑥“闭门不出十年久”^⑦是因为他“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自许平生初不错，人言毕竟两皆空。空中有实何人见？实际心知与佛同。烦恼消除病亦去，闭门便了此生中”。^⑧“自顷闭门今十载，此生毕竟得如愚”。^⑨“十年学趺坐，从此罢雀跃。闭目时自观，寸田饱耕凿”。^⑩禅宗没有任何形式的教条，也没有至高无上的神，它实际上是一种观察、生活、行为的方式。其实，苏辙也是吸收了这种观察、生活、行为的方式，达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知欲访僧同寂寂，应怜病懒畏烛烛。”^⑪“遍入僧房花照眼”，^⑫“此心初无住，每与物皆禅”。^⑬“苏黄门子由南迁既还，居许下，多杜门不通宾客。有乡人自蜀来见之，伺候于门，弥旬不得通。”^⑭苏辙躲入“遗老斋”修炼佛禅，将尘事喧嚣阻止于斋门之外，实际也就是从心头割舍，此与欧阳修置五物与己身合而为六有异曲同工之妙。类似的愿望和行为是士人多曾有过的，若苏轼“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钺）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⑮若王安石，“新筑草堂于半山，引八功德水作小港，其上垒石作桥”。^⑯世事纷扰，生活之艰辛，仕宦之不幸，姑且搁置一旁，过几

日渔翁钓叟、世外桃园般的生活，正如建中靖国元年（1101）有诗云：“晚岁有余乐，天教一向闲。嵩阳百口住，岭外七年还。卜宅先邻晏，携瓢欲饮颜。吴僧来不久，相约叩禅关。”^⑰“嵩阳百口住”、“卜宅”，当时初至颍昌，安顿家小，可谓“携瓢欲饮颜”。“吴僧来不久”，此吴僧即诗僧道潜；“相约叩禅关”即苏辙与道潜就禅修方面的问题相互交流及参悟。苏辙又有诗句云：“已因无食聊从仕，深悟劳生不问禅。未至莫忧明日事，偷闲且就此宵眠。”^⑱“渐解平生缚，初安半夜禅”，^⑲“心是道士，身是农夫”，身亦躲，心亦藏，也正如诗的题目《自写真赞》，既是愿望，也是一种真实生活的写照。

苏辙《题李公麟山庄图》二十首写禅境，是以“继摩诘辋川之作云”，^⑳最能代表他学禅的心得。如《墨禅堂》：“此心初无住，每与物皆禅。如何一丸墨，舒卷化山川。”^㉑这是《题李公麟山庄图》二十首的第二首，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居士，舒城（今安徽）人，家事业儒。神宗熙宁三年（1070）进士，官至御史检法朝奉郎。哲宗元符三年（1100）因病辞官归隐，居龙眠山庄，终于崇宁五年（1106）。学佛悟道，深得微旨，喜与禅僧交游。他所作《龙眠山庄图》共描绘了十六处景致，另有四处未曾画出，但做了记载。苏轼为此画卷作记，并要苏辙效法王维的辋川诗，赋诗二十首以志其胜。“墨禅堂”为李公麟的画室名。即用笔墨绘画阐释佛理禅旨。李公麟好古博学，精鉴赏，喜收藏，在诗文书画各方面卓然不凡。

《宋史》说他“襟度超轶，名士交誉之”，交誉之名士中，就有王安石、米芾、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他们常在一起谈禅说道，切磋艺术。苏辙也借题龙眠山庄之景，表达对李公麟的敬意，以及论述自己对禅的理解。“无住”，亦称“不住”，事物不会凝注于自身不变的性质，人的认识也不应以固定的概念当作事物固有的本质。《坛经》宣称“以无住为本”，认为“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可使思想不受束缚，得到解脱。首句称画家李公麟初心当是“无住”的，意谓超然物外的。第二句“每与物皆禅”，寓指他的“墨禅”所

画之“物”甚多，好似与“无住”相背。其实不然，“每与物皆禅”正是禅的家常境界和自然境界。在禅宗看来，大自然的一切都是佛的真理和自然的显现。因此要领悟佛法，就必须观照“每与物”，即自然界的一切，“念念不住而无缚”就是至妙的禅境。“丸”，圆形物的量词。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二：“诸祈祷者，持一百钱，一双笔，一丸墨，置石室中。前请乞。”^⑩苏辙在起首两句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论述后，引出后面两句，称自己明白了李公麟能用“一丸墨”“化”出秀美壮观的“山川”图卷，可谓“舒卷”自然，光彩动人。实寓这正是“墨”与“禅”巧妙结合的缘故。李公麟擅长画山水花鸟，尤精鞍马，其中佛画亦不算少。“又画《自在观音》，跏趺合爪，而具自在之相，曰：‘世以破坐为自在，自在在心，不在相也。’”^⑪同样阐述了“墨”与“禅”的奥妙关系。此诗短小活泼，别具匠心，颇多情韵。

(未完待续)

注释

① 《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7页《与子由六首》。

② 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76页。

^③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91~292页《龟山》。

④ 陈师道撰，任渊注、冒广生补笺、昌怀辛整理《后山诗注补笺》，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2页《寄参寥》。

⑤ 比丘明复编《中国佛学人名辞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50页。

⑥ 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卷十五《戏呈晓夫》。

⑦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444 页《与王荆公二首》(其二)。

^⑧ 张耒撰，孙通海、传信点校《张耒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444页《闻苏先生除校书郎》。

1231~1232页；第1114~1116页《书白乐天集后二首》，第1234页，第923页，第232页，《问黄蘖长老疾》，第1176页《九月阴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诸子三首》（其二），第265页《病退》，第1197页《风痺三作》，第224页《次前韵》，第1197页《游西湖》，第1201~1202页《省事》，第1196页《白须》，第1197页《风痺三作》，第241页《次韵王适上元夜二首》，第243页《次韵王适一百五日太平寺看花二绝》，第313页《题李公麟山庄图·墨禅堂》，第907页《次前韵示杨明二首》（其一），第80页《次韵子瞻雨中督役夜宿水陆寺诗二首》。

① 契嵩《镡津文集》，《四部丛刊》本，卷末李之全《重刻镡津文集疏并序》。

② 颜中其《苏东坡轶事汇编》，岳麓书社 1984 年版，第 358 页《却扫编》。

⑧ 龙榆生编选《唐宋名家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哨遍》词自序。

黄庭坚全集·正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卷十四《菩萨蛮》题下小引。
⑮ 干宝编撰、王绍楹校注《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2页。

⑩ 于安澜编《画史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12页诗“元仙”。

(达亮, 本名郭德民, 《广东佛教》副主编)

《龙川略志》译评

胡先酉

龙川略志引

予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二年之间，水陆几万里，老幼百数十指，衣食仅自致也。平生家无尤物，有书数百卷，尽付之他人。既之龙川，虽僧庐道室，法皆不许入。衰橐中之余五十千以易民居，大小十间，补苴弊漏，粗芘风雨。北垣有隙地可以毓蔬，有井可以灌，乃与子远荷锄其间。既数月，韭、葱、葵、芥，得雨坌出，可菹可芼，萧然无所复事矣。然此郡人物衰少，无可晤语者。有黄氏老，宦学家也，有书不能读。时假其一二，将以寓目，然老衰昏眩，亦莫能久读。乃杜门闭目，追思平昔，恍然如记所梦，虽十得一二，而或详或略，盖亦无足记也。远执笔在傍，使书之于纸，凡四十事，十卷，命之《龙川略志》。

译文：

我从筠州迁徙到雷州，从雷州迁徙到循州，两年间，水路陆路行了将近万里。一家老小十几口人，衣食勉强可以自己解决。平生家里没有珍贵的物品，仅有的几百卷书，也全都交给了别人。到了龙川后，按照朝廷的法规，即使是僧道的寺庙，也不准许我入住。我用包囊中余下的五十千钱来换得一所民房，有大小房屋十间。我把破漏之处修补修补，也就勉强可以遮风挡雨了。房屋的北墙处有一块空地可以种菜，有口井可以浇灌，于是我与儿子苏远在这块地上挥锄挖土，播下菜种。几个月后，韭菜、青葱、冬葵、芥菜等各种菜蔬，在雨水的浇灌下旺盛地并排生长出来。长出的蔬菜不仅足够全家食用，吃不完的还可用来制作酸菜、腌菜。

这样一来，不用我再把时间和精力花在种菜上，我就有些寂寞而无所事事了。可这个地方人物稀少，找不到能交谈之人。有位姓黄的老人，是个官学人家，家中有书，他年纪大了很少读。我有时去跟他借点来看看，但我也因老眼昏花，不能久读。于是只好关门家中，闭上双眼，追想过去。往事依稀，恍然如梦，好多事情都已模糊了。虽然还记得起一小部分，但也是有的详细有的简略，大概也没有什么值得记的。儿子苏远在旁边执笔，我让他写在纸上，总共记有四十件事，编辑成十卷，取名为《龙川略志》。

简评：

《龙川略志引》(以下简称《引》)是苏辙为其在龙川写的一部笔记《龙川略志》所作的序言，“引”即“序”，它讲述了苏辙贬徙至龙川后的生活情况和写作《龙川略志》的缘起。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崩，宋哲宗亲政，次年，受高太后信任的苏轼、苏辙兄弟先后被贬出朝廷。苏辙贬居筠州(今江西高安)，绍圣四年(1097)，由筠州贬徙雷州(今广东海康)，元符元年(1098)，又由雷州贬至循州(今广东龙川)，这就是苏辙在《引》的开头说的“予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二年之间，水陆几万里”这一情况。苏辙在《引》的前半部分谈了自己一家老幼来到龙川后的衣食住行生活：衣食勉强可以自己解决；无房可住，只好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买得一所破旧的民房，并自己动手修补破漏，以避风雨；又同小儿子苏远开荒种地，收获的蔬菜食用有余。整个描述，凸显了苏辙身处逆境却无所畏惧、不等不靠，用自己的力量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的自强奋进精神，文中“补苴弊漏，粗芘风雨”“韭、葱、葵、芥，得雨坌出，可菹可芼”等句，充分表

现出了作者身处逆境却能乐观潇洒、等闲面对的人生态度，着实令人钦佩。

《引》的后半部分则讲述了自己写作《龙川略志》的缘起。一是由于自己和儿子开荒种植的蔬菜已食用有余，不需要自己再去做这样的事，自己便有些无所事事而显得寂寞冷落（“萧然无所复事矣”）；二是龙川这个地方“人物衰少”，找不到交谈之人（“无可晤语者”）；三是自己“老衰昏眩”，跟别人借几本书来“寓目”，却也不能久读。所以，在上述三种百无聊赖的情况下，只好“杜门闭目，追思平昔”，并把那些“十得一二”“或详或略，盖亦无足记”的往事，让儿子苏远执笔记下来，写成了这部《龙川略志》。总之，归结起来，苏辙在告诉读者，自己的这部笔记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写作目的，仅仅只是自己为打发光阴的无事找事随意消遣而已。为了强调这点，苏辙在《引》中用“盖亦无足记也”来表明自己这部笔记所写的是些不值得记的事。

但果真如此吗？非也。

凡是读过《龙川略志》的人，都会明显感觉到这部作品或含蓄委婉，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人生态度、政治主张。《龙川略志》共十卷，记往事三十九条，其中除《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一则是二事合为一条外，其余皆是一则记一事，共记四十件事。十卷中卷三至卷九主要是间接追论朝廷政事，讲述自己及朝中大臣于熙宁、元丰、元祐年间在诸如新法、税赋、刑法、选吏、外交、治河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上所持的观点主张以及这些观点主张的来由依据等“平昔”之事，而卷一、卷二、卷十总共仅十一条，虽然谈道家烧金、炼丹及养生、医术乃至鬼神等事，但内中仍含蓄委婉地表达了作者做官为人的观点态度。所以可以确定的说，苏辙《龙川略志》写作缘起的真正动机绝不是为打发时光的随意消遣之作，而是作者要借所记之事来表达自己的政见主张和人生态度。苏辙之所以在《引》中把自己的真实动机隐藏起来，并在编辑这部笔记时将讲述道家烧金、炼丹及养生、医术乃至鬼神等内容放在开头与结尾，这些都是因为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作为一个贬谪的罪臣，为了避免再遭因言得罪而不得已的一种掩饰而已，凡是读

过《龙川略志》的读者，想来都是会体谅作者这一良苦用心的。

龙川略志第一

梦中见老子言杨绾好杀高郢严震皆不杀

予幼居乡间，从子瞻读书天庆观。治平初，在京师梦入三清殿，殿上老子像高三二尺，状甚异，能与人言，问者非一也。予亦谒而问焉，谓予曰：“子知杨绾乎？”曰：“唐之贤相也。”“子知高郢、严震乎？”曰：“郢文臣，震功臣也。”“三人孰贤？”曰：“郢、震虽贤，其不及绾远矣。”曰：“此人皆终尚书仆射，然绾不至上寿，而郢、震皆耆艾乃死，子知其说乎？”曰：“不知也。”曰：“绾好杀生，而郢、震皆不杀，此其所以异也。子其志之！”予梦中固不详三人之然否也，起阅《唐书》，三人官秩、寿考皆信，独不见好杀与否耳。

译文：

小时在家乡，我跟随兄长子瞻在天庆观读书。治平（宋英宗年号）初年，我在京城梦见进了天庆观三清殿。殿上塑的老子像有两三尺高，样子很奇怪，能够同人讲话，问他的人不止一个。我也上去向老子拜问，老子对我说：“你知道杨绾吗？”我回答说：“杨绾是唐朝的一位贤明宰相。”老子又问我：“你知道高郢、严震吗？”我说：“高郢是唐朝的文臣，严震是唐朝的功臣。”老子接着问我：“这三个人谁贤德？”我说：“高郢、严震虽然贤德，但远远赶不上杨绾。”老子听了我的回答，却不以为然地说：“他们三人虽然都在宰相的位置上离开人世，但是杨绾未到高寿，而高郢、严震则都是很老了才死，你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我说：“不知道。”老子说：“杨绾喜好杀生，而高郢、严震都不这样，这就是他们三个人寿命不同的原因。你好好记着！”我在梦中的确不具体了解这三个人的情况是否如老子说的那样，梦醒后，

我起来翻阅《唐书》，从《唐书》写的内容看，这三个人的官位、寿命都与老子说的相符，只是没有关于他们谁喜好、谁不喜好杀生的记载罢了。

烧金方术不可授人

予兄子瞻尝从事扶风，开元寺多古画，而子瞻少好画，往往匹马入寺，循壁终日。有二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访否？”子瞻欣然从之。僧曰：“贫道平生好药术，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为精金。老僧当传人而患无可传者，知公可传，故欲一见。”子瞻曰：“吾不好此术，虽得之，将不能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为，公若不为，正当传矣。”是时，陈希亮少卿守扶风，平生溺于黄白，尝于此僧求方，而僧不与。子瞻曰：“陈卿求而不与，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贫道非不悦陈卿，畏其得方不能不为耳。贫道昔尝以方授人矣，有为之即死者，有遭丧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轻以授人。”即出一卷书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则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轻作，但勿轻以授人。如陈卿，慎勿传也。”子瞻许诺。归视其方，每淡金一两，视其分量不足一分，试以丹砂一钱益之，杂诸药入甘锅中煅之，熔即倾出，金砂俱不耗，但其色深浅班班相杂，当再烹之，色匀乃止。后偶见陈卿，语及此僧，遽应之曰：“近得其方矣。”陈卿惊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轻传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陈固请不已，不得已与之。陈试之良验，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负此僧耳，公慎为之。”陈姑应曰：“诺！”未几坐受邻郡公使酒，以赃败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后谪居黄州，陈公子慥在黄，子瞻问曰：“少卿昔竟尝为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阳，无以买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痛而没，乃知僧言诚不妄也。后十余年，谪居筠州。有蜀僧仪介者，师事克文禅师。文之所至，辄为修造，所费不赀，而莫知钱所从来。文秘其术，问之，不以告人。介与省聪禅师善，密为聪道其

方，大类扶风开元僧所传。然介未尝以一钱私自利，故能保其术而无患。

译文：

我的兄长子瞻曾在扶风（今陕西凤翔）为官，扶风的开元寺里有很多古画，子瞻从小就喜好画，常常独自骑马来到寺中，顺着画壁欣赏古画，一看就是一天。有二位老僧出来向子瞻拜请道：“我们的小院就在近旁，能去看看吗？”子瞻很高兴地跟随他们去到小院。老僧对子瞻说：“我平生喜好炼药术，我有一个能用朱砂将成色很差的金子化炼为成色很好的金子的药方。我应当将这方子传给人却又担心找不到可传之人，我觉得你可以传，所以想见一见你。”子瞻对老僧说：“我不喜好这种炼金术，即使传给我，我也不会拿来炼金。”老僧说：“对这个炼金方子，知道是可以的，但不可以拿来实施，你如果不拿来炼金，那就正应该传给你了。”这时，陈希亮少卿（少卿，官名，陈希亮曾任大理寺少卿）任扶风太守，陈太守平生喜好黄金白银，曾经向开元寺的老僧求取炼金药方，可老僧没有给他。子瞻对老僧说：“陈太守给你要这方子你不给他，我不要你却给我，为什么呢？”老僧回答说：“我不是不喜欢陈太守，我只是害怕他拿到这方子就会去实施罢了。我过去曾把这方子传授给人，可拿这方子去炼金的，有的是马上就死了，有的是家里人死了，有的是丢官了，所以不敢轻易将它传授人。”老僧说完，当即拿出一卷书给子瞻，并对子瞻说：“这里面都是有名的方子，其中有一则就是化金方。我知道你一定不肯轻易拿它实施，只是请你不要随便将它传授人。像陈太守那样的人，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传授给他。”子瞻答应了。回到家中后，子瞻看了这个方子，方子说，用一两成色很淡的金子，这金子里含金的成分只有纯金的十分之一，然后加上一钱朱砂，再加上各种药一齐放入坩埚中煅烧，等它们熔化就马上倾倒出来，金子丹砂全都没有损耗，只是颜色深深浅浅斑斑驳驳夹杂在一起，接着再将它们放在坩埚里熔炼，直到金子的颜色均匀了才算完成。后来子瞻与陈太守相见，偶然谈到开元寺的老僧有炼金方子的事，仓促之中子瞻说：“我近来得到这个方子了。”陈太守吃惊地

问子瞻：“你从哪里得到这个方子？”子瞻详细告诉陈太守是怎样得到这个方子的，并向他说明老僧不想轻易将方子传授人的想法，所以没有拿方子给陈太守看。可陈太守却一而再再而三要子瞻的方子，子瞻不得已只好给他。陈太守拿去一试，的确灵验。子瞻十分后悔地对陈太守说：“我没有可惜把这个方子给了你，我只是感到对不起老僧罢了，希望你在做这件事时千万要小心。”陈太守姑且答应说：“行！”此后不久，陈太守因收受相邻州郡送来的酒而犯法，以收取不正当财物的罪名被免了官，离开了扶风。子瞻怀疑他是因为使用了化金方子才落得这样的下场，自己为此深深感到悔恨。后来子瞻谪居黄州，陈希亮的儿子陈慥也在黄州，子瞻问陈慥说：“少卿先生过去究竟用没用这个方子来炼金？”陈慥回答说：“我父亲丢官以后到了洛阳，无钱买房，于是就大肆地用这方子炼金。”然而陈希亮最终却因得了手指上生疮的病而死去，这才知道老僧说的话确实不是虚妄的。以后十多年，我谪居到筠州。有个蜀中的僧人叫仪介，他是克文禅师的徒弟。克文禅师走到哪里，就为那里修造寺庙，每次修造花费巨大，可是没有谁知道克文禅师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克文禅师对自己的方术十分保密，问他，他不会回答。仪介和尚同省聪禅师关系很好，便悄悄向省聪禅师说了他的师父克文禅师的秘方，从仪介说的内容看，克文禅师的方子与扶风开元寺老僧所传的方子基本相同。但是仪介和尚因为不曾拿一分钱来为自己所用，所以才能够保存着这个方子并且自己也没有什么祸患。

养生金丹诀

予治平末溯峡还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阴真君长生金丹诀》石本相示，予问之曰：“子知金丹诀否？”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过此，必以问之，庶有知之者。”予佳其意，试问以修炼事，对曰：“养生有内外。精气，内也，非金石所能坚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气所能变化。欲事内，必调养精气，极而后内丹成，内丹成，则不能死矣。然隐居人间久之，或托尸假而去，求变化轻举，不可得也。”

盖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气所能易也。惟外丹成，然后可以点瓦砾，化皮骨，飞行无碍矣。然内丹未成，内无以受之，则服外丹者多死，譬积枯草败絮而置火其下，无不焚者。”予甚善其说，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脏皆化为黄金者。又有服玉泉，死于盛夏，而尸不败坏者，皆无内丹以主之也。子之说信然哉。”后十余岁，官于南京，张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陕人也，为公养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费数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药成，可服矣。”予谓公何以知其药成也。公曰：“《抱朴子》言：药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间者，药真成也。今吾药如是，以是知其成无疑矣。”予为公道仙都所闻，谓公曰：“公自知内丹成，则此药可服，若犹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

译文：

我治平末年坐船溯长江三峡回蜀的途中，在丰都的仙都山下泊船时，有个道士拿一本《阴真君长生金丹诀》石刻本给我看，我问他：“你知道金丹诀吗？”道士回答说：“不知道。但是凡是有士大夫经过这里，我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可能会碰上有知道的。”我对道士的回答很赞赏，试着问他关于烧炼养生金丹的事，道士回答说：“养生要分内外。人的精气，是内在的，金石不能将它凝固；人的四肢、百骸，是外在的，精气不能使它们产生变化。要想炼好内丹，必须要调养精气，精气调养到了极点后内丹才算炼成，内丹炼成后，人就不会死了。但是由于这炼丹之人在人世间隐居的时间较长，所以他想凭借留下尸骸，自己成仙飞升离开人世，却是无法成功。人的四肢本来是外物组合而成，人的精气是不能将它们改变的。只有炼成了外丹，然后才可以点化瓦砾、皮囊、骨骸，身轻如燕，飞行也毫无阻碍了。但是如果你只是炼成了外丹，内丹还没有炼成，你的内在就无法承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去服用外丹，大多会死，这就像把枯草败絮堆积在火下面，没有不焚烧的。”我很赞同道士的这一番说法，并告诉他说：“过去就有人服用金丹却因为承受

不了跳到井里淹死的，死后他的五脏都变成了黄金。又还有人服用了玉泉，却死在盛夏大热之时，他的尸体一点也没有腐烂，这些都是由于没有炼成内丹的缘故。你刚才的说法的确是可信的。”这以后十多年，我在南京（今河南商丘）为官，张安道公家里有一个道人，是陕西人，他替张公炼养金丹。他的方法是用紫金与丹砂来炼，花费的钱有上百千，一周年后才炼成。张公高兴地告诉我说：“我的丹药炼成了，我可以服用了。”我问张公为什么知道丹药炼成了。张公说：“《抱朴子》上说，丹药炼成后，用手去握着它，它就像泥土一样从手指间挤漏出来，这表明丹药是真的炼成了。现在我的丹药就是这样，因此我知道我的丹药确实炼成而无可怀疑了。”我听了张公的这番话后，便把十多年前仙都山道士告诉我的那番话说给张公听，并对张公说：“你如果确信你自己的内丹已经炼成，那么，这丹药就可以服用，如果还没有炼成，最好等等看，你觉得怎样？”张公听了后，笑了一笑说：“我姑且等等吧。”

慎勿以刑加道人

予在王公君覩大名幕府，尝有丐者，以大扇伤一妇人而盗其首饰，于法为强盗，当死。予讯之，盗曰：“我乃学道者，且善相手，魏人多知我，我非盗也。”问之众人，信然。然盗状明白，不可讳。予言之君覩，君覩曰：“道人勿加以刑。使来，吾自讯之。”即曰：“此风狂人也，释之。”予退问丐者所从来，曰：“我利州山峡民家子也。少病癩，父母弃我山中，三日哭不绝声，岭上有一人循微径而下，顾怜我。我告之故，曰：‘吾家在谷中，汝苟能从我，为我拾薪汲水足矣。’即起从之。因教导引行气，数年，癩疾良愈。复谓我：‘汝宿业厚，当终身勤苦，乃免于病。此非汝所居，出山行乞，勿与平人齿。若美衣甘食，则病复作矣。然汝无以免饥寒者，诲汝相手，可以自养，有余，即以与人，勿畜也。’我游四方久矣，未尝敢违其言也。”予以告君覩，君覩善待之。因为与言：“吾昔登科，谒退傅张公，公曰：‘君异日必贵，有道人犯法，

慎勿刑也。’吾请其故。公曰：‘吾少为射洪令，县方捕劫盗，弓手于山中执一人，不知所从来，曰：‘此劫者也。’吾视其人非凶人也，命脱械释之。官吏皆争，吾告之曰：‘果劫也，吾任其咎。’其人既得释，乃前问曰：‘公何以知我非劫也？’吾告之曰：‘吾视汝非劫者耳。’曰：‘公真不可得。我诚非劫，而迹似之。然我本学道，有师在山后，其徒仅十人，使我出市药，不幸而执。今归告师，三日复出见公矣。’如期即至，曰：‘我师奇公不凡，使我召公入山学道。’吾笑曰：‘吾有官守妻子，未暇从汝师。’其人曰：‘我师固知公未能也。有药在此，可日服一丸，药尽，我复来见公。’药可数合许，贮以小盒，如其言服之。药尽，其人复至，问药安在。曰：‘服之尽矣。’其人惊曰：‘此药有毒，他人服之必病，今不能病公。公真奇人也，今世必享上寿，贵极人臣，若求白日上升，则来世矣。’吾自此未尝以刑加一道人。”君覩孰视予曰：“君亦贵人也，勿忘张公之言。”予应之曰：“诺。”后二十余年，予为户部侍郎，税居张公旧第之西偏，见公诸孙，道公将薨之岁，有道人叩门，公见之曰：“此射洪故人也。”与之饮终日。留药遗公，退如逆旅，蝉蜕而去。服其药，则射洪所服药皆下，命埋之第中三清堂后。沐浴，盛服，卧帐中，使妓奏琵琶，移时不止。发帐视之，公则蜕矣。

译文：

王君覩公知大名府时，我在他的手下做掌管勘问刑狱的推官。曾经有个乞丐，用大扇打伤了一个妇人，还盗走这个妇人的首饰，按照刑律，这个乞丐的行为应定性为强盗，属于死罪。我审问他，他说：“我是学道的，并且会看手相，大名府这一带的人（大名府在汉末为曹魏封地，故当地人又称魏人）大多了解我，我不是盗贼。”我问周围的人，大家都说是这样的。然而此人盗窃妇人首饰的行为十分清楚，不能避讳。我就把这事报告给王君覩知府，君覩对我说：“对道人千万不要用刑。带他来，我亲自审问他。”紧接着君覩又说：“这是一个疯癫的

人，放了他。”我从君覩那里回来后，把这个乞丐找来，询问他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本是利州（今四川广元）山峡中老百姓家的儿子，小时得了麻风病，父母把我丢弃在山里，我哭了三天。这时，山岭上有一个人顺着山上的小路走下来，发现了我，问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便把自己得病而被父母丢弃的事告诉了他，他听后很同情我，对我说：‘我的家在山谷中，你如果能跟随我，只替我拾柴打水就可以了。’我马上起来跟随着他到了他家中，同他一起生活。于是他教我学习导引行气的炼身之法，几年过后，我的麻风病也痊愈了。他又对我说：‘你前一世的罪孽深重，这一世应当一辈子勤劳吃苦，才能不得病。我这里不是你长久居住的地方，你出山去行乞，千万不要把自己等同于一般人。如果你穿得好吃得，那么，你的麻风病就会复发了。然而你现在还没有能解决自己衣食生活的谋生手段，我教你怎样看手相，你学会了可以用它来挣钱养活自己，如果挣的钱有多余，就把这钱给别人，千万不要存起来。’我出山后云游四方很久了，从不曾违背他给我说的话。”我把道人说的这番话告诉君覩，君覩也好好地看待他。君覩趁此给我说道：“我过去科考进士及第，去拜见恩师张退傅公时，张公对我说：

‘你以后一定会显贵，如果有道人犯法，你千万要谨慎对待，不要用刑。’我听后觉得奇怪，便向张公请教这其中的缘故。张公告诉我说：

‘我年轻时任射洪县令，该县正到处搜捕窃贼强盗，捕快们在山里抓着了一个人，却不知他是从哪里来的。手下人向我报告说：‘这个人是窃贼。’我看他不像是个凶恶之人，便命手下人给他解开镣铐释放了他。县里的其他官吏都不同意放他，我对他们说：‘如果这个人真的是盗贼，我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过错。’这个人被释放后，就走上前来问我：‘你为什么知道我不是窃贼呢？’我对他说：‘我只是看你不像窃贼罢了。’他听后对我说：‘你真了不起。我确实不是窃贼，仅仅是行迹有些像窃贼罢了。但是我本是学道的人，我的师傅在山后面，我师傅的徒儿仅有十人，师傅派我出山买药，不幸却被抓了。我现在回去告诉师傅，三天后再出山来拜见你。’三天后，这个人如期来到我这里，对我说：‘我师傅觉得你很不平凡，让我来召你进

山学道。’我听后笑了笑对他说：‘我有官员职责和妻子儿女，哪里有空去跟随你的师傅。’这个人说：‘我师傅本也知道你不可能放下现在的一切来学道。我这里给你带来了一些丹药，你可以一天服用一丸，药吃完了，我再来看你。’这药大约有几合（合，音 gě，容量单位，一升的十分之一），我用小盒将它们储藏起来，按他的话服用。药吃完了，这个人又来到我这里，问我药在哪里。我说：‘吃完了。’他吃惊地说：‘这药有毒，别的人吃了必定会得重病，现在你吃了却平安无恙。你真是个奇人，这一世必定高寿，并且贵极人臣，但如果要想成仙上天，则只有来世了。’我从此便不曾对任何一个道人用刑。”君覩说完后，仔细看了看我，对我说：“你也是个贵人，千万不要忘了张公的话。”我回答说：“好。”二十多年后，我在京城担任户部侍郎，我租赁居住的房子在张公旧宅西边一个偏僻的地方，我见到了张公的几个孙子，他们告诉我说，张公将要辞世之年，有个道人来敲门，张公开门一看到他，便说：“这是射洪的老朋友。”张公同他喝了一天的酒，告辞时他留下些丹药送给张公。他回到旅店后，像蝉蜕皮一样，留下一堆衣服躯壳离开了。张公服了他的丹药后，则几十年前在射洪服的丹药全都下了下来。张公命人将下下来的丹药埋到宅邸中的三清堂后面，然后自己沐浴，穿上华丽的服装，卧躺在帐中，叫乐妓奏弹琵琶。一个时辰过去了乐声都没有停止，家里人打开帐子一看，张公则是留下一堆衣服躯壳离开了。

简评：

《龙川略志第一》共四则，记了四件事，其中有关道家的三件，僧家的一件。咋看起来，记的都是都与僧道有关的梦幻之境、烧金方术、养生金丹，显得有些荒诞离奇，但如果你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这些荒诞离奇的事都与官员有关，而且这些官员还大多是位高权重（杨绾、高郢、严震均是唐朝的宰执，而涉及本朝的陈希亮，字公弼，时任扶风太守，王拱辰，字君覩，为大名府知府，张方平，字安道，在神宗朝官居宰相，张士逊，别号退傅，更是在真宗、仁宗二朝三次拜相），那就有些耐人寻味，值得探究了。

四件事中,《梦中见老子言杨绾好杀高郢严震皆不杀》、《慎勿以刑加道人》都与官员如何对待人民的生死、刑狱有关,《烧金方术不可授人》与官员对待金钱财物有关,而《养生金丹诀》也与官员如何修炼自身内在的精气神不无关系,可以说,苏辙通过这几件事,含蓄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在官员该怎样对待人民生死、对待金钱财物、对待自身修炼等问题上的观点看法,真值得细品。

手中握有掌管百姓的生死大权的官员,该如何来对待百姓的生死呢?苏辙在《梦中见老子言杨绾好杀高郢严震皆不杀》、《慎勿以刑加道人》中,用看似荒诞却又含义鲜明的人和事,对这个问题作了具体回答。他先在《梦中见老子言杨绾好杀高郢严震皆不杀》中描写了一个梦境,将唐朝的三个大官拿来比较,委婉地表达了官员应善待苍生而不应好杀的观点。苏辙借梦中的老子之口说,杨绾、高郢、严震都是唐代的高官,在他们三人谁“贤”这点上,老子不同意苏辙认为“郢、震虽贤,其不及绾远矣”的看法,反而指出杨绾远不如高、严二人“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绾好杀生”,“而郢、震皆不杀”,杨绾的寿命之所以远不及高郢、严震二人长,就是因为杨绾“好杀”的缘故。关于杨绾是否“好杀”这点,苏辙用梦醒起来“阅《唐书》,三人官秩、寿考皆信,独不见好杀与否耳”这样的话来含蓄地表达对老子说法的赞同。他说,《唐书》中尽管没有关于杨、高、严三人是否好杀这方面的记载,但里面说的有关杨、高,严三人官阶的大小、寿命的长短均与老子所说相符,言下之意,老子的说法是可信的。苏辙还借梦中老子对他说的“子其志之”的话,来表达自己要把善待苍生、反对“好杀生”的做官准则铭记在心的思想。如果说,在《梦中见老子言杨绾好杀高郢严震皆不杀》中里关于杨、高、严三人“好杀与否”是似乎还无确切的证据的话,那苏辙在《慎勿以刑加道人》这一篇文章里则以两位本朝官员的慎用刑罚的事,来表述了不滥杀无辜的正确性。这两位官员一是时任大名府知府的王君观,一是年轻时任射洪县令的北宋名臣张士逊,这两位官员均是“勿以刑加道人”。乍看起来,“勿以刑加道人”似乎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

公正,两位官员也似乎有枉法的嫌疑,但如果读者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在“勿以刑加道人”的前面,还有一个“慎”字,而两位官员在不对“道人”加刑上,无一不是围绕着这个“慎”字在执法的。我们先来看王君观不“加刑”的那位道人,该道人本是“盗状明白”,可他是不是真正的盗贼呢?从道人的自述与他平日的一贯行为以及“众人”的证言这三方面综合起来看,道人应该不是盗贼,而他所谓清楚明白的“盗状”,应该是在偶发精神失控的情况下所为,这就是王君观所说的“此风狂人也”。按照古今中外的律法,精神失常者的行为,一般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王君观正是依照恩师张退傅公“慎勿以刑加道人”的教诲对“盗状明白”的道人全部情况作了综合研判后才释放了道人,因此可以认定王君观的做法不仅是不枉法,而且还是官员以忠厚待民的体现。如果说王君观不“加刑”的那位道人还算是“盗状明白”的话,那张退傅公释放的那位道人连“盗状”都没有,更不该“加刑”了。这个道人只是在射洪县大面积搜捕盗贼的情况下,仅仅因为“不知所从来”,当地人不认识他,就觉得他形迹可疑,而把他看成盗贼抓了起来。张公通过对“弓手”抓道人时的情况汇报的判断,再加上对“其人非凶人”的观察,力排“官吏皆争”,以“果劫也,吾任其咎”的敢担当责任感,释放了无辜被抓的道人,张公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一个官员在刑狱上对百姓的慎重与忠厚。为了凸显官员应善待苍生而不应好杀这一观点,苏辙在两则文章中都用了对比的手法,“好杀生”的杨绾与“皆不杀”的高郢、严震的对比,“果劫也,吾任其咎”的张退傅公与“皆争”的官吏的对比,这种对比手法的运用,使文章的主题得以更鲜明的表达。苏辙的官员应善待苍生而不应好杀这一观点是他一贯坚持的,他在年轻时参加科考所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就肯定了“古之君子立于天下”,对民所采取的“罪疑者从轻,功疑者从重,皆顺天下之所欲从”的忠厚待民之举,对“圣人”在对待“天下之人”所采取的“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无刑,刑之而伤于仁;幸而有功,可以赏,可以无赏,无赏而害于信”的仁爱做法十分推崇。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苏辙用《老子言杨绾好杀高郢严震皆不杀》、《慎勿以刑加道人》这两篇文章来表达自己对官员该怎样对待人民生死、对待金钱财物、对待自身修炼等问题上的观点看法,真值得细品。

震皆不杀》《慎勿以刑加道人》来表达他官员应善待苍生而不应好杀的观点，其写作目的是清楚明白的。虽然文章里面有“好杀”就寿命短，“不杀”就寿命长的因果报应迷信说法，为今人所不认同，但对近千年前处于封建迷信时代的苏辙拿今人的思想去衡量，那也是有失公允的，更何况苏辙肯定的那几位官员的确寿命长

（高郢 72 岁，严震 77 岁，王君贶 74 岁，都过了古稀之年，张退傅更为了得，竟活了 86 岁，到了耄耋之年），因此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用“好人命长”这一带有因果报应迷信色彩的说教来表达主题，也是无可厚非的。

在钱财面前，官员是廉洁自律还是贪财自利，苏辙在《烧金方术不可授人》一文中也用一个带有因果报应迷信色彩的故事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溺于黄白”的扶风太守陈希亮好不容易才得了一个“烧金方术”，这“烧金方术”虽然给他带来了金钱，使他能买房置屋，可真正的结果则是一因收受相邻州郡送来的酒而犯法，以收取不正当财物的罪名被免了官，二因大肆用“烧金方术”来炼金，得了手指生“痈”的重病而丢了性命。陈希亮太守可悲的结局似乎正应了开元寺老僧的“有为之即死者，有遭丧者，有失官者”的话，不过，这看似报应的故事却表明了作者提倡官员廉洁自律、反对官员贪财自利的做官准则。为了突出这一观点，苏辙在文中还将自己的哥哥苏轼与陈希亮作了对比，树立起一个廉洁自律官员的典范。文章的末尾写克文禅师及其徒儿仪介和尚用“烧金方术”炼金却安然无恙的事虽然不关涉官员，但针对陈希亮的结局来看，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对比。这里需指出的是，苏辙及其兄长苏轼在他们的为官生涯中，一直秉持廉洁自律的做官准则，无论是在朝中官居高位还是在地方做一把手，都从未有过贪财自利的劣迹。这一点连他们的政敌也十分清楚，所以他们在攻击弹劾苏轼苏辙兄弟所列出的所谓“罪状”中，几乎不关涉钱财经济方面。说“几乎”，意味着他们并非从未干过，熙宁四年（1071），在苏轼连上两篇《上神宗皇帝书》全面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后，引起了变法派的不满。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奏苏轼，说他在苏洵去世，扶丧返川时，曾在舟中贩运私盐谋利，并追捕当时船工进行

拷问，最终却一无所得。这是苏轼一生中所遭受的无数次诬陷的第一次，也是遭受在经济钱财被诬的唯一一次。从此以后，苏轼苏辙兄弟的政敌也变得“聪明”了，他们知道，对廉洁自律的兄弟俩，要想在经济钱财方面找突破口，那是徒劳的，所以他们以后攻击苏轼苏辙兄弟再也不关涉钱财经济了。

《龙川略志第一》中还有一篇《养生金丹诀》讲的是道家炼丹的事，虽与做官的职责品行关系不大，但仙都山道士那番关于内丹外丹的见解以及苏辙与张方平一席谈话，也似乎含有官员应着重修炼自身的精气（“内丹”）的意味。

综上所述，《龙川略志第一》里虽然讲的都是僧道的一些“烧金”、炼丹、因果报应等近乎荒诞的事，但却从中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苏辙在官员应秉持什么样的官品人品方面的观点与看法，这些观点和看法对于当今社会也是很有益处的。

注释

引文皆出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四册），语文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83~489 页。

（胡先酉，眉山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激情澎湃，求实求真

——《漫话苏东坡》序

张志烈

一个多月前，赖正和先生从眉山给我打电话，说他的新作《漫话苏东坡》即将出版，希望我为他这本书作序。正和先生非常了解我的困顿处境，他要我考虑后再回答。自从五年前我老伴患癌症做手术后，长期缠绵病榻，又加上多种相关病症，所以照顾她的日常生活和服侍医药成为我的主要工作。我那时写的诗中有一首是这样的：“芸窗万卷尽丢抛，书架层层列药包。匍匐虔诚求国手，心随方裹共煎熬。”其后，我自己也查出好几种病。子女不在身边，翁妪相守，病人护理病人。现实的具体困难使我不得不辞谢掉许多蒙邀请的活动和刊物约稿。那天和正和先生通电话后，我的确思考了两天。这时，我内心深处好像总冒出一种声音在提醒我：“几十年读三苏的书，几十年与眉山苏学界的朋友交往，几十年对眉山文脉的钦仰与崇敬，似应该克服困难，接受这学习和锻炼的机遇，振作精神，作‘铅刀一割’的努力才对……”这些话语翻来复去在我脑中浮现，我最终拿起电话，回复正和先生，希望在时间上给我以宽限。正和先生同意，事情就这么定了。

从1980年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在眉山成立起，我和四川大学的邱俊鹏先生、曾枣庄先生，就一直为学会的事“跑腿”。联络各地学者，筹组每次会议，经常要和眉山苏学界的朋友共事，在三十多年的交往切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眉山新一代文化人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就精神禀赋言，他们各有鲜明个性；就文章风格言，也各有卓异特色。但在我的感受中，他们还颇有突出的共性或精神印记，那就是由眉山古老地理历史文化的积淀濡染而来的东坡式的情韵。东坡故里的文化血脉好像在他们身上流动，他们对三苏遗产的钻研理解中都饱含着继承和发扬乡邦文化的激情。孔子早就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朱熹解释云：“里有仁厚之俗为美，择里而不居于是焉，则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为知矣。”当代国际上的传记学研究更明确认为：天才只

诞生于一种特定的环境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在美的事物包围中长大的。美的感知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环境、家庭和教育培养出来的。东坡故里蕴含和散射的全部的美，就是哺育当代眉山学人成长的无可替代的摇篮。

带着这种体会和情绪，这些天我在来往于医院和家门的时段外，在围着灶台和药罐转的间隙中，断断续续地拜读《漫话苏东坡》的成稿。在此过程中，获益良多，启迪广远。下面谨谈谈我读后的几点感受。

其一，鲜明的时代责任感和文化自觉性。

这是本书写作的深层动因。

中华传统文化孕育了苏轼，苏轼融汇传统而以自己丰富的实践在各个文化领域开拓创新，对中华文化做出巨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文化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折射出中国文化人的情感世界和事功世界，其光辉映照着千年文化天空。他所思考论述的问题，深刻地涉及广阔的社会人生，对于后世的人们如何面对生活、开创未来，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滋养和启示作用。在我们今天，结合国情世情，传播和弘扬东坡文化，这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育全民道德情操，提高群众文化知识和丰富人民精神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血脉要求畅通；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家园须当守护。深层次理解东坡精神的巨大时代价值和传承需求，使本书的叙述和论证中到处都充满感动，贯注激情，高扬执着，这一切又都体现出作者的时代责任感和文化自觉性。

我在《苏轼研究》上读到过正和先生和他的朋友柳絮先生的一段对话：

“您喜欢苏东坡的东西？”

“我是地道的眉山人，比眉山先贤苏东坡恰好小九百岁。小时候常随父兄拜谒眉山三苏祠，听讲三苏的故事，学读三苏祠

里的楹联和碑文，在稚嫩的心田里播下了崇敬三苏的种子。稍长，学了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对苏东坡的崇拜竟急剧升温。慢慢地，便产生了阅读苏东坡著作的渴望。参加工作后有了工资，见到有关苏东坡的书，就想买到手，你翻的这六七本就都是在五六十年代买到的。有空，就读它几页，这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

在朴实诚挚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燃烧半个多世纪的高尚心灵追求。

追求的极诣是悟现，所以在本书《苏东坡从政简谱》一文的末尾，才喷射出这样激情澎湃的心声：

光照千秋的文化艺术巨星和深受人民爱戴力主变革的政治家苏东坡，身后受到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千年颂扬，他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早已跨越时空，跨越地域，成为政治文化领域里的“世界千年英雄”和文化巨人，他超人的政治谋略和政绩才华，传世的诗词文赋和艺术作品，早已成为雄视百代、传承千载的世界文化遗产，与日月同辉。

其二，求实求真，探索创新，追随和实践东坡的治学精神。

东坡文化精神的根本所在，或者说苏轼的核心价值观，我曾粗略地用四句话来概括：爱国爱民、奋励当世的崇高理想；求实求真、探索创新的认识追求；信道直前、独立不惧的处世原则；坚守节操、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这四点之间又是有深刻的内在关联的。

做人、作事、治学，都讲求实事求是，说真话，凡事调查研究，独立思考，决不盲从，这是东坡认识追求上最大特点。“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

（《上曾丞相书》）这类言辞，东坡说过很多，而在政治实践上他先后与王安石、司马光的争论，也缘于这样的认识信念。《礼记·中庸》说：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东坡的这种求实求真的精神，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

本书的论述中，到处都体现出这种求实求真的治学精神。

下功夫踏实研读原著，深入钻研，求得对文本的正确理解，这是本书求实求真的一种体

现。如《苏东坡从政简谱》中“嘉祐六年”条下，讲苏轼参加制科考试时所进《策》、《论》和《御试制科策》、《思治论》等文章“集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和主张。这些主张的提出虽比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晚两年，但比王安石的主张更广泛、全面、系统、深刻。”下文就从原始材料中提炼出七点内容，概括精当，准确扼要。

又如在《也再探三苏故居》中，因有研究者举出苏轼《答任师中、家汉公》中“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两句，认为是写苏家自己半破茅庐的景况，正和先生遂将此二句前后诗句抄写出：

先君昔未仕，杜门皇祐初。
道德无贫贱，风采照乡闾。
何尝疏小人，小人自阔疏。
出门无所诣，老吏在郊墟。
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
高树红消梨，小池白芙蕖。
常呼赤脚婢，雨中撷园蔬。

然后通过逐句分析，指出这十四句诗前后贯通一气，顺理成章。“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两句，分明是写在史经臣家所见，而决不是写苏家自己景况。同样在这篇文章中还举出对苏辙《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中《东湖》的部分诗句的理解。因有研究者认为其中的“朝往暮可还”是指苏家的山田和苏家居处的距离。文章也通过引出原文为证，清楚地说明这句诗乃是针对家乡附近的几处古迹景点而言，意谓早上出发去这些古迹景点游览，傍晚就可以回家。如果不是踏实细致地研读原始文本，就不可能获得这样正确的理解。

再比如有研究者说：“苏东坡总是称朝云为‘天女维摩’，以赞其圣洁。”本书《谈史请勿随意》一文中，引出《维摩经·观众生品》，苏轼词《殢人娇·赠朝云》、《三部月》（美人如月），苏轼诗《朝云诗》等，以实实在在的证据说明东坡是以维摩自比，而以散花天女喻王朝云。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都说明本书的研究总是追求立脚在对原始文本的准确把握基础上。

独立思考，决不盲从，这是本书求实求真精神的又一体现。比如，有的作品说苏轼担任兵部尚书，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还写苏轼指挥军队打了大胜仗。本书对此不以为然。在《苏东坡官职漫谈》（三十）中，先对宋代枢密院和兵部的职掌作了对比说明，然后指出“这是作者不了解宋代兵部是怎么样的机构，也不了解兵部尚书有多大的职权，而按自己的想法来写的。”正和先生研究问题的“较真”精神很使我

感动，因为这种“较真”是建筑在对历史事实的踏实钻研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对相关知识的掌握，那是没法“较”起来的。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宋代民谣对“六部”官员生活的描述：说吏部是“吏勋封考，三婆两嫂。”（吏部四司为：吏部、司勋、司封、考功）说户部是“户度金仓，细酒肥羊。”（户部四司为：户部、度支、金部、仓部）而说到兵部，却是“兵职驾库，咬姜呷醋。”（兵部四司为：兵部、职方、驾部、库部）此类材料可为生动佐证，说明本书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是很有道理的。

又如有研究者的书中对苏轼在乌台诗案出狱的因由这样说：“当时早已退居江宁的王安石给神宗写信说：‘哪里有圣明的时代杀有才华的士大夫的？’王安石这句话起了很大的作用。”本书对于把周紫芝《诗渊跋》中所记不知王安石在何时、何地、对何人说的那么一句话，改成是王安石向神宗写信说的话，很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认真对待历史事实的研究态度。这种情况，在《文短错多》、《再与康震先生商榷》等文章中还举出不少。独立思考，不盲目附和，是本书论述中的突出特点。

其三，万斛泉源，随处涌出。

经过艰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对所研究的问题烂熟于心，于是遂在源泉丰厚的基础上，实中溢外，自然流露，活泼畅达。通观全书的文字表达，有三点给人印象深刻。

首先，是论事抓住要害，语言精扼简练。比如在《苏东坡爱民故事一组》的“主张富民”一段中论及苏王之争时说：“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理财’。什么叫理财？王安石主张的理财就是变着法子搜刮民间财富，以充实北宋王朝的财政收入，即所谓富国。富国，是王安石变法的总目标，也是变法的最终目的。”“苏东坡不能接受这样的变法，并且不顾死活地加以批评和反对……他站在老百姓一边，无法容忍王安石为了富国而推行的搜刮民财的一系列新法！”“他就是不肯放弃自己富民的主张和立场，违心地去迎合皇帝和执政大臣，以求仕途升迁。可见他爱民之深，护民之坚。”这些话抓住关键，一针见血，入骨三分。又如《从〈上皇帝书〉管窥苏辙的政治改革主张》中论到“三冗”问题时，指出苏辙说的“变法”与王安石说的“变法”是根本不同的：“说得通俗一点，苏辙主张统治者省着用、少花钱；王安石则主张从老百姓兜里多掏钱、快掏钱。两人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几句话，简单明快，凸显实质。

其次，叙述笔调中，饱含着深厚的感情。比如在《苏东坡与弟弟苏辙》中写到苏轼与苏

辙在藤州山谷间相遇，结伴同行。描述了“吃汤饼”的情景，叙写同行到雷州，弟弟又送哥哥到海边递角场，分析了苏轼诗《和陶止酒》展现弟兄情谊的语句，最后写道：“这次两弟兄相聚，是他们人生中最后一次聚会；这次两弟兄在递角场分别，亦是他们人生中最后一次别离。”语短情长，留给读者以无限的回味。又如在《苏东坡与继室王闰之》中写到元祐四年（1089）七月，王箴从眉山到杭州看望姐姐，“其时她正在吃饭，惊喜得把筷子都掉了，立即起身带领儿子到余杭门外去迎接。姐弟相见，抱头痛哭。当年她离开眉山的时候，王箴尚年幼，二十年后相见，自然是悲喜交集。姐姐、姐夫留王箴在杭州耍了半年，过了翌年的元宵节，才让他回老家去了。这次姐弟相见，是她离开眉山后唯一见到娘家亲人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笔笔饱蘸感情，深为动人。

再次，每篇文章之后，都有精要的点评或结论，颇有画龙点睛之妙。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莫不如是。这严谨的背后，展现的是作者对先贤、对读者、对自己的诚实和责任。这些结语，富于含蓄，启发深思。如《读苏洵〈上皇帝书〉窥探苏洵精神层面一角》的最后一段：

“从表面上看，苏洵《上皇帝书》只是在议论朝政得失的基础上提出改革弊政的建议，但仔细读来，却可以窥见到苏洵的政治修养、国家观念、道德水准、人民情结、辩证思想、进取意识等精神层面上的诸多积极因素。这些积极因素，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延续、发展的长河中冶炼出来的精神结晶，是炎黄子孙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古代文人刻苦修身养性所追求的高尚操守。苏洵身上的这些高尚操守，也非常值得今人学习、借鉴。”几句话，就和读者一起，把思考扩展得更高更远。

以上，仅是我粗读了《漫话苏东坡》书稿后一些浮光掠影的肤浅感受，不揣冒昧写出来，敬请读者和正和先生提正。几年前，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就说：苏轼是“说不完、说不完、说不透——永远的苏东坡。”我完全赞同此言。

“苏海”汪洋，学无止境，在学习、研究、弘扬三苏文化的前进道路上，还有许许多多有待我们去艰苦探索的难题。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我们唯一应该的选择。我在非常兴奋地祝贺本书出版之际，谨以此意与正和先生并广大苏学爱好者共勉。

是为序。

2013年10月25日于川大花园

（张志烈，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

苏学通两岸，东坡若比邻

李 新

2010年10月，湖北黄冈召开首届“东坡文化国际论坛”，遍邀两岸三地乃至国际“苏学”研究学者参会。笔者当时尚在河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攻读博士，亦有幸受邀参会。

根据会议安排，“苏学”专家住在黄冈“博林福”宾馆，我的对门，是来自台湾台北县（现改为新北市）的江澄格教授。江教授时年78岁，鹤发童颜、文质彬彬，和蔼可亲。我以当时所作的一首五律相赠：“黄冈称世久，赤壁著千秋。荆楚无双地，江阳第一州。东坡词赋壮，怀古巨篇留。吾辈多诗兴，而今漫步游。”他很开心，一开口就恭敬地称呼我这学界的晚辈为“李老师”，并赠我台湾出版的期刊《中国语文》二册。经过两天的相处后，他竟改称我为“李老弟”，使我受宠若惊，但亲切之感，亦不言而喻。

江教授祖籍四川，1949年之后移居台湾，主攻文字学，曾任加拿大温哥华文菁学院客座教授，著有《高阳评传》，在两岸畅销。两岸实现“三通”后，江教授又受聘为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客座教授，近年来曾在四川大学、复旦大学举办过多次语言文字教育讲座，旨在推广他的“从汉字源流重新整理汉字识、记体系的理念”。

利用参会期间的“地利”优势，我得以和老先生数度交流。他的一套文字学理论，与大陆高校中文系“古代汉语”课程讲述颇有不同。例如，当他给我讲解“自”字的由来时，只见他握紧左手，竖起大拇指，指了一下自己的鼻子，说：“这就是‘自’。”然后让我看他的手的形状：拇指挺直，四指弯曲并拢，俨然“自”字的形状。我不禁恍然大悟，但也禁不住开个玩笑：“这不是‘阿扁’吗？”（2005年，台湾地区民众组成“红衫军”，开展倒扁运动，其手势也是如此）他也开怀大笑。

我们亦就两岸民众对汉字的不同读音加以探讨。比如“遍”，大陆地区普通话读“变”，而台湾地区“国语”则读“片”；“垃圾”，大陆地区读成“拉基”，而台湾地区则读成“乐

瑟”。即便是翻译外文，也不尽相同，如“blog”，大陆音译为“博客”，台湾则译为“部落格”，亦别有趣味。江教授认为：“文字并不是记录语音的，而是表述思想的。”这一关于文字的理论在我看来甚是深入浅出，让我获益匪浅。江教授为人很坦诚，说他很愿意到基层地方院校传播他的文字教育理念，笔者供职于保定学院（以师范教育为特色），他表示可自费坐飞机从台湾直达石家庄，再转保定，不要任何报酬，“只要给些土特产纪念品就行”，让人十分感动……

三日相处，匆匆一别，但各自留下的美好印象早已令人难以忘却。海峡两岸人民，同属炎黄子孙，同根同源，文化和学术亦如此。随着今后两岸交流的进一步增进，我想，我和江教授一定会再次重逢，畅谈苏东坡、畅谈文字学的。谨以一首五律，增诸文末，以为纪念：

吾爱江夫子，谆谆诲汉文。

嘉名誉两岸，弘道乃孤身。

著述高阳传，精研国语魂。

黄州何有幸，三日竟为邻。

——《黄冈东坡论坛，喜逢台湾江澄格教授，有赠》

（李新，河北大学文学博士，保定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李新博士与江澄格教授合影

日本苏轼研究述略（十）

[日]池泽兹子

三、苏诗评注及其意义

含有苏诗的总集有《古文真宝前集》、《唐宋诗醇》、《联珠诗格》等。

《古文真宝前集》

关于《古文真宝前集抄》的刊行情况，请参看前面《古文真宝后集抄》。五山僧笑云清三的《古文真宝前集抄》的注释方法跟他的《后集抄》不同。《前集抄》不是收集几个人的注释，基本上是一个人的注释。苏诗的部分是以《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为基础，参考《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和各种诗话等资料来补充每个词的典故。有时候用日文讲解作者的意图，有关该诗事，诗的一段或诗全体的意思。久保天随在《博文馆汉文丛书》第11卷《古文真宝前集抄》“解题”（原文为日文，池泽译）中云：“前集好像是未定的稿本，往往缺少用日文的讲解，但他参考的资料比后人宇都宫由的《鳌头评注》更多……虽然没有完成，但是已经能够领会诗的要旨。”

在此介绍一下江户时代榎原篁洲著的《古文真宝前集谚解大成》。

榎原篁洲，名玄辅，字希翊，称小太郎，后通称元辅。号篁洲、惕惕子、勃窣散人。他是和泉（今大阪南部）人。本姓下山氏。少有奇气，后来晋京跟着木下顺庵学习。他立志要彻底钻研经义，不追随时代的潮流。后来他被推荐为纪藩的儒官。他是折衷学的学者，不好分清学派。他讲经典的时候，训诂用马郑旧说、义理用程朱性理。他还精通星历、长枪、射御、医道、占卦、茶香。宽永三年（1626）一月去世。他的著述很多，除了《古文真宝前集谚解大成》之外，还有《易学启蒙谚解大成》8卷、《老子经谚解大成》5卷、《大明律例译解》31卷、《唐律和字解》42卷、《书言俗解》6卷、《叠字训解》2卷、《印章备考附日本古印考》3卷、《续印章备考》1卷、《诗法授幼抄》3卷、《增续诗法授幼抄》1卷、《增补仄韵笺》2卷、《楷书源流》1卷、《越巷谈苑》1卷、《谈艺杂记》4卷、《越巷杂记》8卷、《艺窗醉塾》1卷、

《艺窗诗稿》2卷、《山谷诗集注抄》20卷、《篁洲诗集》1卷、《篁洲文集》10卷、《文法授幼抄》5卷、《篁洲杂记》12卷、《明律释解》36卷、《明律释解补遗》10卷。《古文真宝前集谚解大成》在江户时代初期的天和三年（1683）刊行。柳刚《古文真宝前集谚解大成序》云：

本邦之俗，惟取真宝为业，耆耋诵之，儿童习之。虽然，古文岂止于是哉？圣经尚矣，左国以下，秦、汉诸子，其书并在。又盖偏择曲品以录之，盖欲删其繁而括其要，偶失于隘陋耳。行于世之久，于后集诸家笺注，鳞沓鹊起，而前集尚未有详允辨之者也。榎原篁洲素好文章，读书之暇，会旧说之异同，苴诸家之罅漏，留意折中。参伍之未安，必芟其芜秽；引证之未核，必审其考据；积盈套帙，其书若干卷，名曰《谚解大成》。精密而不涉于支离，严简而不流于冗泛，其可传者庶乎无疑。

榎原篁洲在《跋》中，亲自说明写《古文真宝前集谚解大成》的情况：

前载短长古风之诗，后纂辞赋诸体之文，而于后集则儒家笺注、禅林抄解，时出间刊，比比相次，然精粗醇疵迭有之矣。至于石斋鹤氏《谚解大成》出，则诸说之冗疏，典据之罅漏，折中弥缝即无余蕴矣。以世但读前集者少也，其考事实、析理义，亦未备存矣。此艺圃之一恨也。余谫劣不自揣，窃效鹤氏《大成》为之注解，辨其体格，明其意旨，乃如纪事典故则旁摭史子小说，会萃衍绎，以为童蒙之羽翼，唯恐一斑之识，无有博闻广览之知，而注释不阐，考证多连。杀青既成，就求质正于省钦野先生。先生不以余无似弃斥之，而为指点繁简，磨砻瑕类者凡若干。于是余又反复研核，舛错尚饶，益自校讎，乃始卒业，因名曰《谚解大成》。至于金根之差，蹲鷗之谬，则俟博雅君子耳。时天和癸亥孟夏之日，篁洲榎原玄辅识。

从这些资料可以知道，读《古文真宝前集》的人比读《后集》的少，《前集》的注释本也没

有《后集》那么齐全。因此越原（即榎原，编者注）仿照鵝飼石斋的《古文真宝后集諺解大成》，收集各种资料著《古文真宝前集諺解大成》。

《古文真宝前集諺解大成》注释的特点之一是他参考的资料较多。以《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的注释为基础，参考《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和笑云清三的《古文真宝抄》，把两种注释的好处吸收进自己的书里。除了这些前人的苏轼注释之外，他还引用历史书、地理书、诗话、字书等等。比如，在《和韦苏州诗寄邓道士》诗的注释中，他用明人都穆的

《南濠诗话》解释“和”，用《大明一统志》解释“罗浮山”，用《晋书·葛洪传》解释“葛稚川”，用《字汇·增韵》解释“隸”，用《文选》解释“采薇”。在《司马温公独乐园》诗的注释中，用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解释“独乐园”，用《事物纪原》解释“国子监”，用《文选·西都赋》解释“冠盖”，用《孟子·梁惠王篇》解释“独乐”，用《论语·为政篇》解释“先生”。在《骊山》诗的注释中，用《新唐书·地理志》解释“骊山”，用《杨升庵文集》解释“八骏”等等。

特点之二是越原仔细斟酌前人的注释，如果前人注释中没有篇名的话，越原补上；如果前人注释中写错篇名的话，他改正。比如《和韦苏州诗寄邓道士》诗“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的“采薇客”，《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原文用伯夷、叔齐的故事来注释这个词。但越原对这个注释表示不满，说在这里应该用《文选》嵇叔夜《幽愤诗》（《王状元注》和笑云注为嵇康的《养生论》，是错误的）的“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来解释。有时他批评前人的注释，比如《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诗“花间置酒清香发”，原注引用李白诗“花下一壶酒，独酌无相亲”。越原说李白诗和苏轼原诗意义不同，不应该在这里引用。有时候前人的注释比较简单，他常据原典进行补充。

特点之三，越原多有独特的看法。比如《续丽人行》诗的“蹇驴破帽随金鞍”的“蹇驴”词，越原认为出自杜甫《赠韦左丞》“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另外，《和陶渊明拟古》诗的最后一句“问我何处来，我来无何有”，越原解释说：“此两个句子比较难懂，（玄）辅按‘来’的意思很轻。客人问的不是来历，客人问你平生的处心修道，何处有工夫？答曰，本无一物惹我心，只把心放在无何有之地，从容自乐，没有其他工夫。

如此解释的话比较易懂。如果客人只问身来由的话，这个句子的意思太褊浅。”在这个地方，越原的解释考虑得有点儿过分。现代注释者星川清孝不同意越原的看法。但从这儿可知越原不只是参考前人注，还提出自己的看法。

特点之四，除注释典故外，他还用平易日文解释诗的一段或全篇的意思。有时候参考笑云清三《古文真宝前集抄》的解释。比如《游三游洞》诗“不辞携被岩底眠。洞口云深夜无月”，越原的解释跟笑云比较相似。但全体来看，比五山僧的解释分量多，每个句子的解释比笑云的更详细。

《唐宋诗醇》

在《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中的《唐宋诗醇》有两本：

《（御选）唐宋诗醇》，原存18卷（李白、杜甫），清高宗编，嘉庆四年（1849）、文久二年（1862）刊。

《唐宋诗醇抄》6卷，长允文（梅外）评，长冰校，明治元年（1882）刊。

《连珠诗格》

据《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联珠诗格》刊行情况如下：

《（精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20卷，宋于济、蔡正孙编，宽永（1624～1643）刊（复古版）。

《（精刊唐宋千家）联珠诗格》20卷，同上编，大窪行（诗佛）校，文化元年（1804）刊。

《（精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20卷，同上编，文化七年（1810）刊。

《联珠诗格》3卷，四声傍训附，同上编，内山屋牧山校，弘化二年（1845）刊。

《（新刊唐宋千家）联珠诗格》2卷，同上编，安政三年（1856）刊。

另外在《国书总目录》里有《联珠诗格》的翻译或研究著作：

《联珠诗格释注》4卷，宋于济、蔡正孙编，柏舒亭翻译，享和元年（1801）序。

《联珠诗格名物图考》2卷，阿部喜任（栎斋），文政三年（1820）序。

（未完待续）

（池泽兹子，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苏东坡的政治人生（十五）

——苏东坡的“仕”途精神

雷金贵

五六 深得儒家思想衣钵真传

苏东坡卓越的文学艺术成就，源于他坎坷的仕途，仕途的不平，源于其深刻的思想，思想的深刻，源于其政治抱负。

人的思想，或者理想，或者抱负，不是生下来就有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苏东坡政治理想的理论依据，其实也是中国几千年的国家思想和道德的核心，即以孔子孟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

儒家的治国安邦，崇尚“礼乐”“仁义”，主张“德治”“仁政”，提倡“忠恕”“中庸”，坚持“民为邦之本”。这方面，尊敬的孔夫子有许多著名的语言，其哲人的光芒，至今还熠熠闪耀，无人超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孔子关于君王、国家与人民有一段形象而著名的话，曾被许多的人在不同的文章和场合引用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就把话说得更直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省刑罚，薄税敛”。

苏东坡是深得孔孟儒家思想衣钵真传的封建士大夫，忠君、爱国、忧民，是其“仕”途精神和“仕”业追求，他在应试文章《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表述了他后来一生坚持的治国安邦的政治主张，“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这是从儒家思想化茧而出的“仁政”思想。后来他参加制科考试作的一系列策、论，形成了他系

统的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政治主张，前面的文字里，我已经说过。

现在来看看苏东坡儒家思想的经典观点。

“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夫法者，末也。”“礼者，本也。”“夫礼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严君臣、笃父子、形孝悌而显仁义也。”

这样的观点，苏东坡在《道德》《刑政》中，表述得更加明白。这两篇文章，是在神宗皇帝即位之时，苏东坡代谏官吕公著写给年轻气盛的皇帝的，浓缩了苏东坡儒家核心的政治主张。

“人君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至诚者，在苏东坡看来，就是“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内自亲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丝毫伪也”。由此而至于“四海之内，亲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苏东坡的至仁者，既是“视臣如手足，视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时使，薄敛”。

为此苏东坡警告说：“祸莫逆于好用兵，怨莫大于好起狱，灾莫深于兴土功，毒莫深于夺民利。此四者，陷民之阱，而伐国之斧钺也。”“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民，国本摇也。”

不幸得很，苏东坡的警告，都演变成了现实，神宗皇帝不但没有拯救北宋王朝的日益衰微，反而加剧了北宋的积弱积贫，朝廷内外，派系争斗甚嚣尘上，奸邪小人日益权重，官场腐败愈演愈烈，百姓生活民不聊生，国防边境不得安宁，北宋根基更加摇摇欲坠。神宗朝四

十年后，北宋不但亡了国，而且徽宗、钦宗成了北去的俘虏。北宋，可谓耻辱至极。

五七 中庸不是“乡愿”

苏东坡一生的政治主张、政治思想、政治实践、政治活动，鲜明体现着儒家学说的“中庸”观，即儒家学说的矛盾观。这样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观的体现，一方面坚决反对因循守旧无所作为，一方面反对脱离实际盲目冒进。

中庸，不是庸俗的和稀泥，也不是庸俗的做老好人。

中者，不偏不倚，不过又无不及，也就是恰到好处地与客观事物相吻合。其实就是一个度的问题。庸者，用也。儒家的中庸，其实都是“用中”。就像煮饭，一定的米，用恰到好处的水和时间，水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多了煮成稀饭，少了会很硬；时间长了要煮得一塌糊涂，时间少了会煮成夹生饭。水的度，时间的度，掌握得适度了，你的饭就会煮得众人叫好。再比如炒菜放盐巴，盐是百味之首，但是放多了，就咸口了，放少了，就淡口了。厨师的水平，就在掌握用盐巴的度。儒家的中庸，不是无原则的调和对立的双方，他们把这种无原则的调和叫做“乡愿”，他们是坚决反对“乡愿”的。

苏东坡在进献给仁宗皇帝的二十五篇《进论》中，开篇就是《中庸论》，而且写了三篇。“不知中庸，则其道必穷”苏东坡说，轻率者，常犯“过”之错，就是急于求成，超越客观事物的发展；畏手畏脚者，常犯“不及”之错，就是裹脚不前，落后于客观事物的发展。苏东坡进一步说，出现这样的“过”和“不及”，然后又来矫正，如此反反复复，就一辈子都难以恰到好处地把握客观事物发展的最佳机遇，就是不能“用中”。而机遇，一辈子不可能天天都来眷顾你，就像足球场上，一场比赛，天赐良机或许就那么一次或者两次，你错失了，最终输掉了比赛，那是咎由自取的结果。

考察苏东坡一生的政治活动，都是在进行着“过”与“不及”的斗争，因而导致了他的仕途的沉浮。

五八 不是定论

把苏东坡一生的“政治”作一个总结的话，我是这样看的：

苏东坡为政的哲学和理论根据——儒家的“中庸”思想。

苏东坡为政的思想和情感依据——儒家的“仁政”思想。

苏东坡为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儒家的“民惟邦本”思想。

苏东坡因为有这样的为政，而且一生坚持这样的为政，所以他的为人、他的为官、他的为文，才留下那么多光耀千秋的典范，千百年来，被一代一代传承，而且成为一门学问，学术界称为“苏学”，研究者遍及世界，这称得上一个奇迹。

后记

1985年6月，我花费一元九角钱，买了一本《苏轼选集》，王水照先生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那年，我才21岁，在边远的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的边远的镇江庙中心校教书。《苏轼选集》是繁体字，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我，很受繁体字的考验，我又买了一本《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作工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书店里逛了那么久，从那么多书中，我就买了这本书。这或许就是一种感应。十二年后，我就到了东坡故里。其实，我的老家，距离东坡故里很近。但是，说老实话，我对苏东坡一点认识都没有。我买了《苏轼选集》，却只是浮在以文读文的表层。1997年，举家在眉山落脚，去过三苏祠，苏东坡的老宅，“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让我很震撼。两、三年之后，因为职业关系，我写了第一篇关于苏东坡的散文《东方坡地》，在报纸上发了，又拍成电视散文，全省的节目评优，获了奖。我不是炫耀，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被苏东坡吸引了。

但是依然仅仅处于文学的层面。

大概是四、五年前，我居住的小区里，好像是什么出版社摆了很多书在卖，很便宜的价

钱，有人说，那是出版社多印的书，拿出来拣几个钱是几个钱的。我买了一套《四库全书精华》（四册）、《二十五史精编》（六册）、《三言二拍》（三册），都是仿古籍样式的。在读到《四库全书·宋史·苏轼传》，我非常吃惊，我们津津乐道的文豪苏东坡，传记里写得很简略，大量的篇幅，写的是“政治的苏东坡”。我反反复复读了几遍，没有错，是写的“政治的苏东坡”。

再回想自己到过的杭州、苏州、蓬莱等地，苏东坡不是以文章而是以政绩、政声而活在这些地方的。

我觉得自己太肤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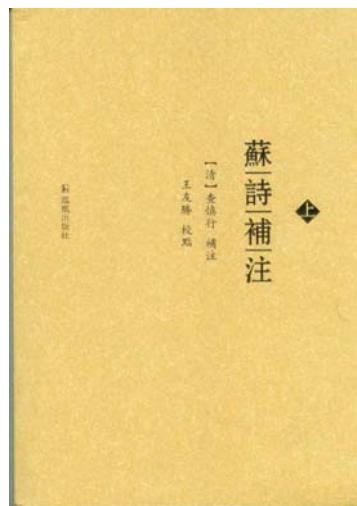
于是我重新阅读苏东坡，搜罗各种图书——有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也有民间编辑的资料集。我把苏东坡的诗文与年谱以及对应的宋史一起阅读，才真正悟出了苏东坡“行云流水，自然而然”作文背景。比如那首著名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现在，我们是把她作为所谓哲理诗来讲授的，是的，它的确包含了看问题、看事物不能以点代面、以偏概全，但是，深入到他的写作背景里——苏东坡从黄州释放出来，前往汝州，后来又被允许到常州养老，此诗写于这次行程之中，神宗皇帝力主的新法，十多年了，老百姓没有从新法中得到一点好处，日子过得越来越艰涩，但是皇帝和执政者，好像眼睛瞎了，看不到。所以我认为，它依然是苏东坡以诗歌的形式写给皇帝的劝谏书——你走出深宫来，你跳出新法来，考察新法，审视新法，你才看得清新法之害。或许，我这样的解读，会被鄙视为牵强附会，但是，我坚持自己的解读。

文学、政治、生活，是什么关系，苏东坡以其毕生之力，做出精彩的回答。苏东坡的答案，我们至今还在运用。好长的历史里，好像不像现在，有专业的作家，历史上的读书人，其实并不把作家作为追求或者职业，他们留下的文字，或为送别之作，或为唱和之作，或为应景之作，或为应酬之作，或为有感而发而不得不发之作。

把苏东坡的文字、苏东坡的仕途经历、北宋的历史，融合在一起阅读，真的很有意思。

衷心感谢我阅读、参考的关于苏东坡的书籍、资料的作者和编者，让我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苏东坡，我还摘用了有些书籍和资料上的文字，见过面的或者神交的作者、编者，真的，谢谢了。

（雷金贵，眉山电视台副台长）



书名：苏诗补注
作者：[清]查慎行补注 王友胜校点
出版：凤凰出版社 2013年9月第1版
开本：32开
页数：1554页
定价：180元（全三册）

苏轼葬郏不容置疑，苏学普及任重道远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一些报刊对苏轼葬郏提出质疑，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郏县苏轼研究会以不同形式回击这些不实的报道。

2013年4月18日《扬子晚报》发表《苏东坡坟墓就在安徽霍山》，指出“苏东坡墓不在河南，有‘苏氏宗谱’证明，苏东坡墓就在霍山”。2013年11月25日《华西都市报》刊发《眉山现北宋土豪墓，说不定和苏东坡沾亲带故》，质疑苏轼葬郏，一时间舆论哗然。

这样的作法引起了广大读者、苏学专家的强烈不满。中华苏姓文化研究会、苏轼遗址地苏轼研究会和社会热心人士纷纷致电、来函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处。

2013年11月13日，郏县苏轼研究会有关领导一行六人驱车前往安徽霍山实地考察，考察人员乔建功专门撰文《苏轼葬郏已定论，霍山岂会有真冢》，通过层层剖析，以文献资料为依据，驳斥了《扬子晚报》的不实报道。2014年1月13日，三苏文化高层论坛在平顶山学院举行，参加论坛的省市专家、学者认为，苏轼、苏辙葬郏毋庸置疑。

2013年12月2日，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

院邀请本院特约研究员、部分苏轼文化爱好者举行座谈会。眉山市三苏研究院方永江院长指出：“考古和社科研究都是极其严肃的事情，新闻媒体应该对此作客观报道。作风扎实、文风朴实，是其基本要求。”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苏轼葬郏板上钉钉。“即使不是苏东坡本人，也不排除是他的子孙后代”一说毫无根据。会后，由闻风执笔写成的《苏学史实的现实运用及启示——以苏轼葬郏研究为例》，受到眉山市政协主席王影聪的重视，批示：“某些媒体的炒作缺乏科学依据，甚至为了猎奇而瞎说！三苏文化研究院的专报以正视听，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我们应当主动站出来讲话，纠正歪曲历史事实的做法！”此文被2013年第4期《苏轼研究》刊发之后，2014年1月14日被中国社会科学网全文转载。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社科研究的生命。不调查、不求证，只为博人眼球、哗众取宠，不仅起不到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反而会误导读者、歪曲历史，对文化传承造成不良影响。

（小 编）

农工党中央、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 捐赠600万元援建三苏纪念馆

本刊讯（刘娟）12月19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社会服务部副部长、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常务理事张庆伟，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秘书长周庆年，农工党四川省委会副主委夏华祥一行莅临眉山市，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援建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纪念馆项目捐赠签约仪式，并捐款600万元援建三苏纪念馆。

眉山市委书记李静，眉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小可，眉山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黄玉蓉，市长助理万怡挺出席签约仪式。

三苏纪念馆是国内展示三苏文化最丰富、展陈面积最大、陈列方式最多、展出水平最高的纪念馆，是弘扬三苏文化的重要载体。

“4·20”芦山地震发生后，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三苏纪念馆中的文物古迹受到了不同程度毁损。农工党中央、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在对眉山三苏祠等文物古迹受损情况进行视察调研后，及时落实600万元专项资金援建三苏纪念馆。这一举措对三苏纪念馆的修缮和维护、对弘扬三苏文化意义重大。

（刘娟，《眉山日报》记者，转自2013年12月20日《眉山日报》）

《苏轼全集校注》获中国图书奖

本刊讯（袁丁）近日，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苏轼全集校注》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由四川大学几代学者耗时20余年编纂完成，共20册800余万字，是迄今为止最全、最新、最权威的苏轼全集校注本。

该书以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文集》、《苏轼诗集》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坡乐府笺》

为底本，对苏轼的诗、词、文进行了通收、通校、通注、通编、通评的“五通”工作，不仅补充了一些前人未曾发现的苏轼作品，对原本失校之处进行了重新校正，而且对苏轼绝大多数作品进行了编年，其中有相当多的作品属首次编年，在考订编年、征典释义等方面均取得新成果。

该书是一部对苏轼及苏集既具总结性又具开创性的大型著作，对学术发展、文化传承意义重大。

（据2014年1月8日光明网、《中华读书报》改写）

眉山将举办“东坡文化进校园”课堂教学展评活动

本刊讯（一流）2014年10月，将在眉山举办首届全国中小学“东坡文化进校园”课堂教学展评暨“本土文化与语文教育”高端论坛。

此次活动拟联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农村语文教育研究中心、眉山市教育局主办，眉山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眉山市中语会、眉山市小语会），“名师汇”组委会（《作文精选》杂志社）、台湾国际青少年交流协会承办，拟邀请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出版社参与，拟邀请《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语文教学通讯》、《基础教育论坛》、《四川教育》、《教育导报》等媒体参加。

此次活动内容有著名特级教师苏轼题材教学展示、全国苏轼题材教学评比、苏轼研究专题报告会、“本土文化与语文教育”高端论坛。

此次活动的特色：强化整合——加强本土

文化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教育教学改革以及三级课程建设的整合，努力达成地方文化的教材化和教学化。多元服务——以“东坡文化”研究、开发和利用为路径，全方位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教学改革、学校特色打造和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服务。高端引领——以“东坡文化”与语文教育的整合为突破口，以国内知名学者、机构为学术中坚力量，高层次开展苏轼文化、地方文化以及与社会发展、教育教学改革关系等研究活动，形成高端研究成果。

此次活动对于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东坡文化”名片，充分开发和利用“东坡文化”中的教育资源，深入发掘其中的现代教育意义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